七个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

主　编　崔建霞
副主编　翟杰全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七个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

主　编　崔建霞
副主编　翟杰全
参　编　（按章节顺序排名）
崔建霞　刘新刚　张亚彬　李常青
孙　利　张　峰　翟杰全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简 介

本书的主题是针对当前困扰人类特别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七个现实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同步问题、经济危机问题、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人自然而诗意地生存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多元化社会思潮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问题。本书的特点是将理论的前沿性和现实的重大性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哲学类、经济类、政治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专业人员，也可供党政干部、公务员阅读。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个怎么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崔建霞主编.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640-3079-7

Ⅰ.①七… Ⅱ.①崔… Ⅲ.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理论研究 Ⅳ.①A81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9700 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68914775(办公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 www. bitpress. com. 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4
字　　数／265 千字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责任校对／陈玉梅
定　　价／36.00 元　　责任印制／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七个怎么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的基本思路，是针对当前困扰人类特别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七个现实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包括生态危机、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同步、经济危机、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人自然而诗意地生存、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等问题。对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的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本书的七个问题可归纳为四条线索。

1. 人与自然

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席卷全球，直接危及人类和自然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各种“救世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建构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模式。沧海横流，大浪淘沙，在人们苦苦寻找新的批判工具以解释生态问题社会根源的十字街头，一直被国际学界忽视甚至否定的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特有的社会批判视角和辩证思维方法，此时受到东西方的普遍关注，基本肯定和积极评价成为一种思维潮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热再度抬头。在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西方学者发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内固有着生态观点，生态问题至少是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附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对绿色问题即环境生态问题的哲学思考显现出当代性的力量和魅力。由此，与马克思生态思想相关的词汇或思潮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成了“显学”，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但在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看来，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识是非常肤浅和零碎的，并没有系统和深刻地把握其根本。

与自然主义将人与万物平等看待、将人的主体性与特定的需求消解在与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之中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基础，不是自然相对于思维独立存在的自然本体论，而是以自然为前提、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本论。他们以人的视角为切入点，重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弘扬人的主体地位，强调打上人的目的和意志印记的自然对人的意义。但是，他们没有将人类和自然机械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主体和客体，而是采取了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反对人类绝对至上和对自然的破坏，强调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与和谐统一，主张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结合。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生态问题首先以自然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不是自然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的问题。生态危机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逐

利的固有逻辑，生态恶化是资本固有的逻辑结果。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所有者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对生存环境的污染及其对人体的危害，则是完全被忽视了。不计后果地滥用自然资源而不管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这就必然带来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和榨取，超出自然承载的边界，同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其后果就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产生。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变迁，即共产主义的到来才能实现。那时，去除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劳动者劳动终端产生巨大的剩余价值，而起点则表现为对自然资源掠夺的异化生产不存在了，异化生产必然产生异化自然的现象消失，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

2. 人与社会

（1）探讨社会发展实践中的和谐问题，解决单纯以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为发展诉求，导致世界各国普遍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难题。这一难题具体表现为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经济的畸形发展主要表现为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而忽视质的优化。与此同时，由于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贫富差距，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成为单纯的理性动物、经济动物，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日益加深，人们逐渐远离自己的精神家园，精神的迷失成了物欲社会中难以治疗的“顽疾”。这一现代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难题推动了关于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西方的新发展观、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发展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试图从人－文化－价值的视角进行新发展观的构建。其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认同。但是，深入其理论深处，我们会发现：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新的发展理论仍然不能跳出资本的固有逻辑所带来的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困境——发展的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的分离，其对发展的价值维度研究转向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断想。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破解还是必须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的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为基础，辩证地吸收当前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来进行构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当代是否能够得到全面展现的核心议题。

（2）探讨马克思经济危机思想对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特别是对我国预防经济危机发生的意义。自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后，经济危机就不断重复地发生，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西方学者对经济危机的发生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从经济制度内部和外部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运用现代大量的统计数据研究周期的时间，探讨应对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对经济危机进行解释。西方政府也试图利用各种手段消除经济危机的威

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改革予以调节，也曾一度出现了黄金增长时期，但从没有彻底消除经济危机的发生。马克思从商品的内在矛盾出发，认为经济危机在货币出现后就有产生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发生才具有客观必然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才能彻底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资本主义不断进行内部调整，也是试图缓解基本矛盾，但并没有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社会主义虽然没有经济危机产生的基础，但社会主义也难以逾越商品经济阶段，尤其是在我国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经济危机在我国依然有存在的可能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只要采取合理、适当的措施就能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

（3）建立我国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问题是效率和公平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分配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发展过程，分配制度的效率已经体现，但公平还存在一些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视角中，社会公平一直是他非常关注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不公平，所以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设计了能在初次分配中体现效率和公平统一的“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按劳分配制度，并预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增长和集体财富极大丰富，将出现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公平分配制度——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总原则是生产方式决定分配关系，一国的分配方式或分配制度应由该国的生产力水平，进而由该国的生产关系决定，特别是由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关系来决定，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据此，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中国，按劳分配不应是社会的唯一分配方式。改革开放前，我国曾一度把按劳分配变成平均分配，只讲公平没有效率。邓小平从分配制度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出发，提出先富与后富的分配理论，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中国经济自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的分配理论在原则上与马克思生产方式决定分配关系的分配理论本质合一。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经济形式的发展将我国分配制度调整为“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原则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再到现在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分配政策更多地转向公平，包括初次分配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

3. 人自身

物质财富在增加，但人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更多的幸福与愉悦。对物质的无限占有欲望、对自身职业发展的宏大规划，使人们的精神焦虑、生活失控般忙碌，从而身心俱疲。人被商品、金钱、权力所绑架、所奴役，仰望星空的惬意和休闲

成为一种可得却不能得的奢侈。怎样才能活得更像“人”？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才是最符合人性的？这一迫切而现实的追问，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即给出了答案：劳动与休闲。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界定和论述休闲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却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问题线索：其一，马克思是从人的生命活动出发，认为休闲活动体现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是人内在的价值追求尺度，是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表现。其二，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关系角度来说明休闲，认为拥有自由时间是实现休闲的基础。其三，马克思自始至终把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连在一起，认为休闲内在地包含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中，休闲活动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形态，是人类应该追求的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休闲的最高境界。

4. 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与传播

（1）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一定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是重要的社会意识现象。它以时代为背景，以社会为场所，以社会群体为主体，不同社会思潮并存、继起、冲撞和消长，构成一定时期社会思想变动的晴雨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不仅异常活跃，而且呈现出多样性，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拜金主义思潮、利己主义思潮等。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存在于主流意识和主流文化之外，反映着社会现实以及社会现状，同时又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尽管多种意识形态可能同时存在，但各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不能平分秋色，必然有主有次，必然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对于一个社会，既要允许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更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性。可以多元并存，但必须一元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引领”不是“代替”，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论及其实践的影响，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抵制和削弱错误思潮的影响，形成在多样化中确立主导地位，在多样化中寻求共识；以主导扩大共识，以共识巩固主导的格局。引领需要在理论层面引导群众全面认识社会思潮；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整合不同的社会思想，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在实践层面完善制度建设，构建引领的有效机制；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引领的良好环境；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2）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部分，基本任务是面向干部党员、青年学生、社会公众等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和中国化。近些年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普及工作遇到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从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与渠道的利用情况看，大众媒体传播不力、

教育传播效果不佳、组织传播手段不实已是不争的事实；从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方法与管理模式看，传播方式方法单一、管理模式僵硬滞后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一切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价值观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和示范，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信仰危机、道德失范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断改进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使其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是根据时代的发展提升传播理念、整合传播途径、创新传播策略、加强传播管理、强化传播支撑，适应时代要求建立一个以传播实效为目标的有效运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对上述四条线索的七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是艰苦的。基于个人不同的知识结构选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索，弥补个体知识背景和集体发展目标的错位，因而它带有拓荒性。虽艰难困苦，但每个人确立了一个理论研究基点，理出了一条线索，为走向深处建构了孵化器，因而这种研究又是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探索是虔诚而学习性的。在钻进马克思文本与之对话的思辨过程中，思维受到了深深的洗礼，精神经历了一次次震动。伟人自有成为伟人的伟大理由，马克思独特的社会批判精神、严密的逻辑思维、力透纸背的哲学深刻使这次研究的收获远远大于用其理论解构现实的初衷；这种探索又是愉快而美好的。跨越了诸多困难，经历了入门前茫无头绪的疑惑、叩门时以苦作舟的执著，得到了主体力量抗争后战胜自我的喜悦。

编 者

2010 年 2 月

目　录

第一章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 1
一、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生态理论 …… 1
（一）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有与无的争论 …… 1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认知与“建构” …… 4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 …… 11
（一）承认人在自然中的主导地位，反对无视人类主体性的极端自然主义和非功利主义 …… 11
（二）坚持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反对人类绝对至上的人道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 …… 15
（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想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结合 …… 20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 27
（一）“自然的人道主义”思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导引 …… 28
（二）“人的自然主义”思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 29
第二章　社会发展的和谐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发展难题的破解 …… 34
一、问题：现代社会发展难题与西方学者的发展新范式 …… 34
（一）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同步 …… 34
（二）西方学者对现代社会发展难题起因的分析 …… 36
（三）西方学者针对现代社会发展难题所提出的发展理论新范式 …… 40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 …… 45
（一）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转向与社会发展观的革命 …… 46
（二）资本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经济哲学视阈 …… 52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 58
（一）对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审视 …… 58
（二）问题破解：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 63
第三章　经济危机的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 70
一、经济危机的表现、新特点及西方政府的应对措施 …… 70

（一）经济危机及其表现 …… 70
（二）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 72
（三）西方政府的应对措施 …… 73
二、西方对经济危机本质的认识及存在的问题 …… 74
（一）西方学者对经济危机的解释 …… 74
（二）西方学者存在的问题 …… 77
三、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观点 …… 78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 79
（二）虚拟资本过度扩张是导致经济危机更大规模爆发的原因 …… 81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 82
（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使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 83
（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性及其双重影响 …… 86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 88
（一）中国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 …… 88
（二）正确认识我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 90
（三）我国如何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 …… 93
第四章　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 96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 …… 96
（一）效率的含义 …… 96
（二）公平的含义 …… 97
（三）效率和公平：欣喜与困惑 …… 97
二、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主要观点 …… 102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分配理论 …… 102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分配理论 …… 110
（三）毛泽东、邓小平及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分配理论 …… 112
三、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 120
（一）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为正确理解我国分配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 …… 120
（二）积极完善我国分配制度，实现分配公平 …… 124
第五章　人自然而诗意地生存的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休闲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 …… 128
一、问题的缘起 …… 128
二、何谓休闲 …… 130
（一）马克思的休闲思想 …… 130
（二）中国传统的休闲旨趣 …… 134

（三）休闲的多元化内涵 …… 138
三、休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140
（一）理论价值 …… 140
（二）现实意义 …… 141
四、发展休闲、引导休闲的途径 …… 142
（一）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143
（二）建立公平公正的休闲制度与休闲政策，营造良好的社会休闲环境 …… 143
（三）提倡休闲教育，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休闲观 …… 143
第六章 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问题怎么办
——一元化指导思想对多元化社会思潮的统领与应对 …… 145
一、社会思潮的本质及传播机制 …… 145
（一）社会思潮的内涵及特点 …… 145
（二）社会思潮的传播机制 …… 147
（三）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存在 …… 150
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多样性 …… 151
（一）当代值得关注的几种思潮 …… 151
（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基本态势 …… 159
（三）当前我国主要社会思潮呈现的突出特征 …… 160
三、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 162
（一）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 …… 162
（二）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 …… 164
（三）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 …… 167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问题怎么办
——直面挑战与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的构建 …… 173
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 173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 173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与发展 …… 175
（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176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性质及目标 …… 179
（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基本性质 …… 179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具体目标 …… 182
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内容与对象群体 …… 185
（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基本内容 …… 185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对象群体 …… 187
四、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 …… 191

（一）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 …… 191
（二）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工作 …… 199
参考文献 …… 204
后记 …… 209

第一章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当今世界，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如何不同，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直接危及人类和自然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直面这一事实，秉持合理的理念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阻止生态环境的恶化，便成为关系人类前途的重大全球课题。自 20 世纪后半叶始，国际上诞生了形形色色的“救世秘方”，从不同角度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模式。耐人寻味的是，已辞世 100 多年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批判视角和辩证思维方法受到东西方的普遍关注，人们翘盼能在其浩如烟海的思想中找到化解当代人与自然矛盾的“良药”。

一、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生态理论

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究竟有没有、有多少生态思想，其性质和意义如何这类问题，已基本形成肯定和积极的评价。全盘否定的现象逐渐退却，在否定中有肯定，在肯定中有否定或全盘肯定成为一种思维潮流。

（一）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有与无的争论

纵观历史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也即马克思主义有无生态理论的问题上，存在着三派意见。一是“马克思主义异端”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现有理论框架中无法解决生态学提出的新问题，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成分。二是“马克思主义正统”说，主张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成分，拒绝承认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三是折中的观点，即承认事实上生态学已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但同时也相信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既

有的答案。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看法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基本认同进而发展的复杂过程。长期以来，“空白论”、“过时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环境冲突的“灾祸论”等观点曾在很长时期内盛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绿色理论中，马克思常常被看做是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认为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并不包含生态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没有发言权。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变革可能具有指导意义，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革非但不具正面的积极意义，反而还有强烈的消极作用。他们把环境破坏及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归因于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主义过分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只把现实的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片面强调“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在实践上加速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加剧了生态恶化。帕斯莫尔认为“没有比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传统对生态学更加有害的思想了”。①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不相容，甚至具有冲突性，马克思本人也成了环境破坏的始作俑者。

对马克思的这种生态批判，通常秉持六个论据②。其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其著作的主体思想没有系统性的关联，它们只是作为“说明性旁白”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因此完全可以将其忽略掉。其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只是出现于他的早期著作中，在其后期著作中很少提及。其三，从根本上看，马克思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没有将其生态思想融入其价值理论之中，而最终还是持崇尚技术、反生态的“普罗米修主义”的观点。其四，作为这种“普罗米修主义”的观点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完全可以解决生态限制的问题，而作为“生产者联合体”的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则主要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逻辑，人类根本用不着“用一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也根本用不着提出什么“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其五，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对环境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是不感兴趣的，他根本就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基础。其六，马克思实际上是个“物种主义者”，也就是说他要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视前者优于后者。

经过数十年的激烈争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把眼光投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热再度抬头。这一方面受制于冷战思维的逐渐消失带来整个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思想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尤其是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批判工具去解释生态问题的社会根

① 冯雷．日本学者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

② 陈学明．寻找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评J·B·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内涵及当代价值的揭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5）．

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再认识，发现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关注人类社会显现出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撰写过专门的、系统的生态哲学巨著，没有从问题学的视角来讨论生态环境问题，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真理的光辉。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散落在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自然辩证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包含大量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已然形成。

由此，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究竟有没有生态理论的看法有了某种改变。在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西方学者发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内固有的生态观点被完全忽视了，于是，一个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也开始得以显露。一些学者认为生态问题至少是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附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重要问题，并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有关问题。意大利物理学家M·奎尼说，早在现代资产阶级生态意识产生之前，马克思“就已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1995年9月，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传出声音，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个生态学家，马克思指出了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认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通过劳动建立的。马克思的思想具备这样一个特点，“它们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却并非专属这个时代。相反，它们具有跨时代的征候。”①。“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异化状态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哲学准确预见了‘后现代’的某些特征，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从事批判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克思哲学。二者在当代‘相遇’了。”②其中生态思想就是二者在当代相遇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的思想（‘幽灵’）始终保持通向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域的出场路径”，“对新全球性问题的科学解答中再一次显现出当代性的力量”，马克思的思想对当代的“绿色问题即环境—生态问题的哲学思考就具有这样的魅力。”③ 于是，“很多即使原先最苛刻地批评马克思的人，近时均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补充论”，即强调马克思主义有生态思想，但却具有不完整性，需要用生态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补充和重建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课题。

一批有影响的左翼杂志，像《每月评论》、《新左派评论》发表这方面的文

①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57.
②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80.
③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83.

章。《科学与社会》（1996 年）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为题出了专刊，刊发桑德拉拉杰的《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伯克特的《价值、资本和自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含义》等文章。尤其重要的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专门杂志《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0 年创刊发行，许多学者就马克思是否对生态学思想的发展做出基础性贡献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此同时，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著作。除了在一些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和环境社会学的著作中用专门的章节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学科的关系外，还有一批专著问世，如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 年）、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 年）、伯克特的《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色和绿色的视野》（1999 年）、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2000 年）、科韦尔的《自然的敌人》（2000 年）等。通过这些研究，西方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遮蔽”，并开始从各个学科的维度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马克思生态思想相关的词汇或思潮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成了“显学”，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认知与“建构”

生态马克思主义大致经过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酝酿、本·阿格尔的确立以及奥康纳、福斯特和岩佐茂等人的发展几个阶段。这些学者有的直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态解读，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生态危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解决生态问题、透视绿色理论的一种重要指导思想。

本·阿格尔，加拿大哲学家，1979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被国内外学界视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形成的标志。在书中，他首次明确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一词。

阿格尔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批判的正确性，但是并不承认经济危机是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他根据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的新发展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和经济地位，缓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而经济危机难以大规模爆发。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加强对社会和自然的控制，导致了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严重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以生态危机换取或延缓经济危机，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危机即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阿格尔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已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① 阿格尔认为生态危机是由消费异化直接导致的。资本积累固然是引起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这种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②，但同时要超越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可见，阿格尔试图以生态危机否定经济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瑞尼尔·格仑德曼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1991年），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不同于统治（mastery），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而是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是实质上的服务。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分析展现了一种“更宽泛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生存状态是以不得不存在于、依赖于自然为特征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要通过技术方式改造自然。这种依赖与改造的双重关系从原始社会的简单形式发展到今天的复杂形式，人对自然的攫取由采集水果和蔬菜、猎获动物的直接方式转变为依赖技术的间接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揭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马克思认为人改造自然的这一过程是“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即“新陈代谢”。如果我们接受技术的发展已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间接关系这一历史观点，那么试图回到人对自然直接攫取的阶段的努力就是错误的。生态问题只能在对自然的“现代”态度的前提下才能着手解决，改造自然的适当形式必须由“历史存在的人类自然”来设定。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这类认识。格仑德曼确信，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现代关系的阐述即使有某些局限性，也优越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浪漫梦想。马克思一再嘲笑一切形式的自然崇拜和感伤主义，他赞扬资本主义“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和

①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499.

②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普遍征服自然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相当大量地论及生态问题。但有些解释在现代已不完全合适，比如，马克思提出“合理的私人行为的资本主义模式”趋于无限地增殖利润，从而产生“外化”和意外的结果，导致生态问题的出现。这是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生态问题的解释，已不适合今天的现实，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资本主义企业也在制造生态问题。格仑德曼认为，必须抛弃资本主义是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受到批判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在经济危机中的贫乏的经济运作和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因为它把工人贬低为奴隶，迫使他们依赖于工资奴隶制，并阻碍他们获得自我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古代世界中的人被大脑的产物即宗教所控制，而现代世界里人被其双手的产物所控制。这两种状况都是与人类的尊严不相称的。同样，资本家也陷于与他们的人类本质不相称的境地：即使他们比工人的处境好些，他们也不可能控制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行动的总体后果。因此，他们像原始人害怕自然那样害怕自身行为的后果。格仑德曼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受到自身对自然改造的威胁，马克思的以上分析仍是适用的。但是，格仑德曼指出，马克思提出的对一切侵犯人类尊严的资本主义以及更早期的生产方式，都必须进行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排除，从而推导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并不是要人们首先废除私有财产、建立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说共产主义首先是制度化的人类自觉掌握其命运的社会，是对自身命运进行自我控制的社会，是人类意识理性化的社会。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的分析仍然是卓越的和中肯的，提供了对生态挑战的深刻见解。

1997 年，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出版《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成为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力作。在该书中，奥康纳通过探讨“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地位缺失，阐述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的所谓“理论空场”。与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并不是轻易地否定马克思的理论，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不完整性，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重建。

在奥康纳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生态感受性”的缺失，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忽视或否定了自然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即“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和“自然的终极目的性”，由此导致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自然”地位的缺失。奥康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虽然成功论证了在不同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不同的社会性建构，但突出的是社会关系与物质技术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突出了“人化自然”，却未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边缘化”了。奥康纳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体）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同时，由于缺少“自然的终极目的性”观念，即自然界本身的存在就是它自身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

具有无条件的至上性，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只把自然当作生产、生活随意掘取的资源和驯化的对象。所以，“由于没能领悟到社会历史或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他断言，从这个层面上讲，作为建构者，马克思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阈中的地位已经丧失。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涵应向外和向内扩展，向外扩展至物质自然界，向内则要延伸到生物学维度，因为马克思“对化学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生物学的兴趣”。奥康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朴素遗产，不管是对生态系统的分析，还是对热力学系统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分析，都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中”。“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关自然或者外部条件的理论阐述不是建立在自然稀缺性或有限性的思想基础之上”①，他们没能准确地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是生态学家，“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够唯物主义”。

但奥康纳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确存在生态学视角的理论基因。“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凸显出来的理论视阈中被解读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中，“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他们认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构建一种能够清楚地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矛盾关系理论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说，他们具备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阈。”因此奥康纳指出，在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可信的。

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走进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中，以文本解读的方法，跟随马克思的理论足迹，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其渊源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试图“理解和发展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证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生态内涵和关怀，进而恢复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现代意义。2000 年，他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一书。书中，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和新陈代谢思想的生态学本质进行了论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生态学的定义和原则，而且超越了生态学的狭义性，在更加广泛的人类与自然之

① ［美］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4.

中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实践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2002 年，又出版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Ecology：Against Capitalism），提出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不仅是关于人类自身解放的社会学说，而且是关于自然解放的生态学说。福斯特致力于系统地重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了迄今为止最系统的、最全面的解读与辩护。今天多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理解，在很大程度都是沿着福斯特的思路进行的。

但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也经历了由怀疑—认可—发展的思想历程。1994 年，他在写作《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生态观点在其思想中居于次要地位；这些生态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学知识并没有什么新的或实质性的贡献；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对于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其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而在通常情况下生态学所使用的都是非历史的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概念。到 2000 年，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许多地方都表现出了浓厚的生态意识。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在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着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不但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系统的批判，而且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做出过富有成效的探索。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基本判断，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需西方流行的绿色理论来补充和完善，因为它本身已十分完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深刻的、系统的生态理论，但这一理论还只是潜存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尚没有被人们挖掘出来。对民众来说，这一理论还只是一个没有被认识到的灵感源泉①。

福斯特认为，一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以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价值视而不见，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发生了偏差，他们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去追随马克思、理解马克思，从而也就丢失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表现出对科学的完全忽视或敌视的态度，他们将生态退化归结为培根所开创的科学革命，认为其“支配自然”的观念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从而带来了至今挥之不去的自然危机。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文明、现代性、唯物主义与启蒙运动是生态危机之源，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继承了启蒙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崇尚科学与进步是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因而马克思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是反生态的。福斯特指出，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的实质与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对无限价值的追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的认识路径与

① 陈学明．寻找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评 J·B·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内涵及当代价值的揭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5）．

马克思根本不同，导致他们贬低甚至歪曲马克思的正确生态判断。二是来自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将理论“完全建立在一种盲目崇拜的和扭曲的科学观念的基础之上”，曲解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倾向，从两个相反方向理解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生态价值。

除此之外，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生态理论十分活跃，不仅提出了许多新概念，而且初步拟订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框架，是当代全球生态马克思主义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理论力量。其中不乏可资我们研究吸收的地方。苏联学者的生态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来阐发的。苏联哲学家Э·В·基鲁索夫在《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一文中认为，现代生态形势证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论点，即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仅没有导致社会问题的自动解决，相反，由于耗尽自然资源和降低环境质量，可能使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恶化。因此，应当树立生态意识。苏联著名哲学家伊万·季莫费耶纳奇·弗罗洛夫在其《人的前景》著作中指出：“在解释人的本质方面，许多西方学者……明显地表现出社会生物论的倾向。这种解释是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强调社会因素、社会条件对人的合理活动共有主要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把影响人发展的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统一起来去研究人的。”① 弗罗洛夫还特别地强调：“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努力揭示出生态问题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并重视这些问题的重大社会意义和人道主义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生态问题的特点。”②

日本著名环境哲学家岩佐茂，针对日本的环境问题和学界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批判和误解，走上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环境思想的道路，出版了《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环境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认为马克思没有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岩佐茂认为，如何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环境保全同时成立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肯定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本来就含有环境保护的思想。如青年马克思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自然与自然的关系来把握，把自然的人道主义与人的自然主义统一起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认为这种物质代谢的“扰乱”就会造成自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引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

① ［苏］伊万·季莫费耶纳奇·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王思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72.

② ［苏］伊万·季莫费耶纳奇·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王思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53～154.

谢的扰乱和自然的破坏，也同时破坏了城市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劳动者的精神生活。岩佐茂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对考察当今的环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马克思所说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岩佐茂认为“这种观点论述的不是人对自然的支配，而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进行‘合理地调节’，‘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① 岩佐茂指出，恩格斯也同样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问题。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出自然和人是生产中能动的两种要素，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与自己的和解”的观点。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由于人过分相信对自然的“支配”、“胜利”，招致了自然的报复。岩佐茂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回答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同时，针对当前自由主义、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岩佐茂致力于从马克思那里寻找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探索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方法和启示。另外，当代日本哲学家岛崎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观也进行了全面解读，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三重结构上的内在关联，或称之为“自然在人面前呈现的三种面孔”：第一，人与自然的“主—主”关系，即自然和人一样是平等的主体。第二，“主—客”关系，即人是自然的改造者与呵护者。第三，“客—主”关系，即自然是人的缘起者和养育者。由此，岛崎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环境问题同样适用。”②

总之，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学术认同的角度，国际上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一些国家的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二是西方知识界从学术角度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三是国外学者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加以接受，并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就是建立在第二和第三种基础之上。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两大主题，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嬗变等问题，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通过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技术批判与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从而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就中国而言，这三种情况兼而有之。作为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维度的研究并存，且第一维度统帅第二和第三维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发展导致的生

①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11.

② 冯雷．日本学者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

态环境问题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研究，引介并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成为热点。由最初的基本理论内容的介绍性研究转向主要代表人物理论观点评论性研究，并最终发展到“为我所用”，即借鉴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研究成果，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如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等。同时还有另外两种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一是纯文本的研究。研究的维度与视野如下：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形成史的维度加以阐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生成足迹是，由异化观下的自然观—实践观—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创立；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维度加以阐发，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有明显的生态学价值取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加以阐发，认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恶化归因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把社会变革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手段。二是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无人”的理论相比较的马克思主义“有人”生态思想研究。但在福斯特看来，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识是非常肤浅和零碎的，并没有系统和深刻地把握其根本。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的视角为切入点，提出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他们重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立足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弘扬人的主体地位，强调打上人的目的和意志印记的自然对人的意义。但反对人类绝对至上，强调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与和谐统一，主张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结合，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逐利的固有逻辑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变迁，即共产主义的到来才能实现。

（一）承认人在自然中的主导地位，反对无视人类主体性的极端自然主义和非功利主义

1. 纯自然主义消解人类的主体性

纯自然主义和非功利主义地将人与万物平等看待，将人的主体性与特定的需求消解在与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之中，要属西方“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为最。相继提出的一脉相承并层层递进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理论，都认为必须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至上的迷恋，把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上，将伦理规范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因为人并非天生就比其他存在物优越，每一个物种都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所以动物、生物等都应获得道德代理人即人类的平等关心、关怀和尊重。其核心思想是呼吁尊重动植物乃至整个环境独立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之外的自然及其

存在物也具有内在价值和权利，呼唤人与自然存在物的平等，甚至呼吁为了解决生态危机，人类社会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主张经济停滞不前的“零度增长”，维持现状。

非人类中心主义对运用人的智慧和力量去征服自然的妄自尊大的思想提出了挑战，这一价值理念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思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一理论脱离特定社会和人的需求，没有看到人类和自然之间需要不断进行交换的物质关系这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而简单地认为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就在于人与万物的平等。它从纯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须受制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关节点。它只看到了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同一性以及这种同一性的伦理意义，而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实践意义，这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在现实中，一旦人的利益与其他生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种理论就成为难以实际操作的空想、一种天真的幻想、一种很难转化为现实的理想，或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美国旧金山老虎跑出动物园威胁了行人的安全，最终还是为了人的存在而被击毙。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 完全否认人的主体性，将自然权利看得等同于或高出于人，甚至激进地认为：我宁愿杀死一个人而不愿杀死一条蛇，这就将自然权利绝对化了。如果人们连打死一只苍蝇、消灭生物病毒也怕侵犯了自然的权利，那么这样的自然权利论在现实中有何意义可言呢？自然权利的取得难道要以消灭人类的利益为代价吗？使树木受到膜拜，而人却成了奉献给祭坛上的牺牲品，这同样是不道德的。虽然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但行为本身仍然是要以人为中心的。人只能说人话而不是说神话，人类不可能不顾及自己的利益而一味以自然为中心。当我们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就已是以人的身份从人的立场出发了，人和其他生物一样，也有生存的权利，如果人不存在了，一切环保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保护生态环境，理应包含保护人的生存的内涵。所谓的关心自然，其实质就是关心人类自身，关心的方式和程度也是按照人的需要和能力来进行的。实质上，这种生态理论仍然是把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对立起来的一种思维方式，注重从单因单果上分析事物和过程，只看到线性的和非循环的因素的作用，局限于人或生态的单一中心论，区分人和生态哪个为首要，完全从对立的两极进行思维。它的思维路径和理论基础是自然主义，其伦理原则是建筑在反经济学基点上的超功利主义。

2. 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观高扬人类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与此恰恰相反，它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基础，不是自然本体论，即只坚持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而是以自然为前提、建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

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本体论，即人本论。据此，有人认为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自然与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但相对于自然，马克思更关注人，以人为核心，将社会放在首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以社会系统中的主体——人，作为分析的核心和逻辑的出发点，其他的分析才有意义。马克思重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强调打上人的目的和意志印记的自然对人的意义。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自在的自然，包括人类历史之前的自然和存在于人类认识或者实践之外的自然。马克思认为，自在自然对于人类没有任何意义。离开了以人类劳动为中介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任何自然的存在也就都失去了以人类生活为判断尺度的存在意义。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①

其二，人化的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是经人的实践改造过的自然，是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马克思是在这个意义上谈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统一。"人化的自然"概念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②，马克思也常称之为"打上了人的目的和意志印记的自然"、"属人的自然"和"历史的自然"等。

马克思认为"人化的自然"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产生，它确证和表现着人的本质力量，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通过劳动才能产生。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③。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思想内涵了这样几层含义：首先，人必须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把自然这个无机的身体根据自己的需要部分地变为自己的有机身体，以维系和延伸自身的发展。其次，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既改变着人身的自然，同时也改变着人身外的自然，即"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第三，人应该对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加以调整和控制，做到变换的平衡，而不是无度利用自然资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用的不是"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其生态意义十分重大。如果立足于对自然的控制，人们考虑的重点是如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1～202.

满足人们需求；如果立足于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人们就会优先考虑变革自然的劳动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劳动不是可有可无，因为“哪怕只停顿一年”，人类就会丧失自己全部的生存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① “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这种“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一句话，就是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依靠自然界。因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劳动，就必须把自然对象化、人化，把原初的、不是直接地同人相适应的自然，改变成为“人化的自然”。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生活资料，是人这种生命存在物生存和延续所必需的合理的生存活动。离开这种活动，人类的存在便无从谈起。“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②。那么，人如何表现呢？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己看作类存在物”，同时也“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③。在马克思主义中，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马克思认为，正是因为被融入了实践因素，自然也成为了社会的、历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自然不断地被人的实践活动所改变，人通过劳动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马克思认为，人把自然纳入劳动过程，作为“劳动的自然要素”或“劳动本身的要素”。因此，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断言，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自然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④ 恩格斯在谈到人类所处的自然界时说：“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97.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7～128.

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①。

在人化自然中，人类属于主体，自然属于客体，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改造自然界，人类认识自然、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以及保护自然的目的就是使自然界更好地、有效地为人类服务。马克思在评价“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时候写道：“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② 人类数百万年的生成史，尤其是几千年的有文字史，人类所进行的主要活动就是使自然界人化的活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就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的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主要是与物质创造相联系的生产活动。自然界的人化，正是这种生产劳动的对象化，是人“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一切经过人改造的对象，都渗透着人类劳动的性质，都体现着主体的本质。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受到格外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马克思认为，人类越是把第一自然转化为第二自然，他们就越是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③。

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观克服了人类对自然的单纯敬畏，主张人类对自然的主体地位，坚持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和价值，内含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然而，由于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和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因此，虽是功利的，但却是合理的，也就必然地成为人类活动首先遵循的理论原则。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与此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坚持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反对人类绝对至上的人道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

马克思虽然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主张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他的人化自然观反对对自然的征服破坏，而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1. 人类绝对至上的价值观

人类绝对至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近300年来，它一直是支撑人类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

践活动的理论基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的著名命题。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提出“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因而，“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要按照自然的规律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只要掌握了规律且有了知识就有了一切。人只有不断地去认识客体，征服并战胜它，才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解放。它反映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人是以自己为尺度看待世界、评价世界和对待世界的。这个尺度使人的主体性走向了极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对立的两极。首先，人类利益超自然化。人是大自然的杰作，是自然界进化的最高阶段，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级的存在，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因此，人类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其次，人类利益价值唯一化。自然资源只有对人类有益才有价值，离开了人类的需要，自然环境、物种、生物无所谓权利与价值。人成为万物的尺度。第三，自然存在对象化。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与之相应，自然万物都是因人而存在的资源对象，没有其独立的内在价值，只是作为满足人类利益的物质性存在，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单向作用的对象，自然物的存在是为了人的目的。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言：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而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食物，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为了人而创造的。它的核心理论观点是征服自然、主宰自然，人类只关心人类自身的利益，自然只是满足人类生存需求及欲望的占有物。能否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利益和实现人类的权利是衡量人之外存在物存在必要性的尺度。对人的主体性片面张扬的这一价值观，导致人类环境行为的无度性和破坏性，助长了人类对大自然不顾后果的掠夺和征服。它在使人类生产呈加速度增长的同时，也令环境的破坏程度呈指数上升。人类满腔热情、一路高歌创造的文明又异化成为自身的反对力量，从而使人类在享受物质成果的同时，又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征服的自然观犹如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在高扬人类智慧的同时，又把人类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世界历史上20多个文明的兴衰发展史显示，战争、政治和经济等因素虽可以对人类的生存构成重大影响，延迟人类发展进程，但一般不至于毁灭整个人类，而唯有生态问题可在悄无声息中摧毁全人类。绝大多数地区文明的受挫、衰败，甚至淡然出局，都源于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受到摧残与破坏。掠夺性使用土地，破坏了植被，促使表土状况恶化而使生命存在失去基础支撑能力，出现了生态灾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警示。人类对自然的漠视，其结果是人类自身的灭亡。

2.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类和自然界具有一致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以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人的利益为目的，坚持人类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但是，他们在对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则采取了辩证唯

物主义的态度，没有将人类和自然机械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主体和客体，而是将它们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认为人类与自然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人类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把全部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劳动发展史，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中，解读劳动史必须联系自然史。“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劳动史和自然史始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无自然的历史和无历史的自然，认为它们两者是同一个过程。“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明确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约束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②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自身具有自然的属性，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③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他永远也不能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关系。人依赖于自然界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④；另一方面，人类的生产要以自然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⑤。人尽管具有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特性，但是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脱离自然、超越自然。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应该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有机整体，所以人只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恩格斯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7.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2.

界的，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恩格斯认为，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要坚决地摒弃“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②。

马克思批判了人类妄图支配自然的行为，“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灵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的，人就越是不得不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所能带来的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③ 人类控制自然所带来的恶果，就是人类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④人类若想控制自然界，反过来只能陷入自然界的控制之中。人类在把自然变成被统治的对象的同时，也使人类自己失去了自由。

3. 人类活动要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否则与动物无异

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种意识不仅体现为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谋划，而且表现在为其他存在物考虑。马克思认为，动物的活动仅限于功利性的活动，即满足其自身生命需要的活动；而人类的活动则包括超功利性的活动，即人类能够超脱自身需要的狭隘束缚，顾及其他物种的生存需要。人类不仅需要把自然万物当作实用对象来对待，而且能够把自然万物当作审美对象来对待。马克思深刻指出：“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子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而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⑤。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它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人类生产与动物生产的区别：动物的生产只是自身种的需要，只按照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4～30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20.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2.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47.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进行。而人类的生产是全面的，不仅直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且懂得必要时摆脱直接需要去按照其他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所以，人的生产有两种尺度：一是人的需要的尺度，指人类生产首先要以人为本。二是其他物种需要的尺度，指人类在生产时要考虑到其他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即要按照自然生态规律来生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对自然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人类只能根据自然规律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解决人与自然对立就要尊重自然规律，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自然生态规律是在自然界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并发生作用的规律。概括起来，主要是指自然界的生物因素之间、环境因素之间以及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具体体现为：① 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互生规律；② 相互补偿、相互协调的共生规律；③ 相互适应和选择的协同进化规律；④ 物质循环的平衡规律；⑤ 能量输入和输出的转化规律。自然生态规律是自然现象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它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体现为强烈的不可抗拒性，不论什么力量都不能使规律的必然趋势改变方向，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人的思想和行为不仅不能摆脱客观规律的制约，而且归根到底都要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和认识到它的存在，自然生态规律都客观地起着作用。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人在自然界的最大自由度，就是在客观规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做出最佳选择。恩格斯说："自由不是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② 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刻、越正确，遵循自然规律且按规律办事，就越能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相反，看不到规律的客观性和重要性，全然不顾规律的作用而随意妄为，则势必破坏生态平衡，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人不可能也不应该与自然力量抗衡，到目前为止的许多抗衡已使人类遭受了惨重的代价。恩格斯告诫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③ 恩格斯用了许多实例说明了人类盲目改造自然界所造成的危害。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而砍光了森林，使这些地方成为荒芜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也因为砍光了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而摧毁了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但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1.

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就此指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步结果又取消了”。① 要减少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破坏，必须同时估计到施加于自然界的行为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两个方面，不能只看自然影响而不管社会影响，不能只顾眼前而不计长远。人类要学会预见并根据这种预见去支配和调节自身的行为。恩格斯指出，“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对于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质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② 如果不能自觉地顾及自然与人的血肉联系，既追求人的利益，又能超越于上，那就与动物无异了。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遵循功利主义原则是合目的性的，但人类的活动也应合规律性，人类物质欲望的满足不应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人类的劳动不能无视自然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因此，需尊重自然规律，坚持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统一。那么，坚持人的主体性，又尊重自然的存在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想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态问题首先以自然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不是自然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的问题，生态危机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资本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不相容性，造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分析到，人对自然的一般性“支配”不是生态问题的缘由，生态问题是人们对待自然的“特殊”方式所引发的，又必然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关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恶化是资本固有的逻辑结果。

1. 资本逐利的固有逻辑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的本性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对自然环境必然的破坏。“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2.

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资产者把一切东西都变为追求利润的手段，把自然的创造物，如水里的鱼、天上的鸟、地上的物产等全部变成自己谋利的资产。即使猪毛菜无需投入人力，也不会因为投入人力而增加产量，但产猪毛菜地段却和其他田地一样，也要交地租。“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①。工业文明时代“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② 因此，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所有者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以资本积累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适应资本与利润的生产”。“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③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这样就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社会与自然一起应严格遵守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新陈代谢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指生物体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化学物质的合成和降解而不断进行物质更新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后来也成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生态循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地将这个生物学概念从自然领域运用到社会领域，引入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认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新陈代谢发生断裂导致生态问题的出现和生态危机的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问题时指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程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55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7.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0.

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① 这里的“物质变换”一词指的就是“新陈代谢”。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发现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资源的破坏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成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②。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以利润为目标指向，其首要的关注目标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与人的生活相协调，而是如何花最少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这就必然带来在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中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和榨取，超出自然承载的边界，同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资本价值积累的无止境本性，它对于利润的天然偏好，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将自然环境作为影响其生产的内生性因素来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对生存环境的污染及其对人体的危害，则是完全被忽视了。”③ 所以，对利润的狂热追逐必将导致资本的自我扩张和积累，而由于资本对自然界存在价值的低估，以自然和人的自由的破坏来换取利润的增长就成为必然，其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的产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形象地指出：“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16～91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堆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有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工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及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却同时以掠夺式的经营方式对待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财富的源泉，摧残人并对自然产生了压迫，产生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剥削。对人的剥削体现为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摧残劳动者的身体和生命，把人变成动物一样的存在，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了自己。"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劳动者说来，对自然界的这种占有表现为异化，自我活动表现为为别人的活动，并且似乎就是别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而对象之生产表现为对象之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的势力、异己的人所有。"② 它突破了人作为一种自然力的"道德极限"和"自然极限"，造成劳动者的"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马克思对此描述道："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③ 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资本家只局限在眼前的经济利益和高额利润，置他人利益和长远的社会后果于不顾。而异化的生产必然产生异化的自然，劳动者劳动的终端产生巨大的剩余价值，而起点则表现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其结果，"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31.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2.

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的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被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①。所以，“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其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不成其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再为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② 人类与自然之间有机统一体联系发生断裂，导致自然的破坏和自然对人的报复。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去除人与人的不平等，消灭异化劳动，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的调节和控制；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使人的本质真正达到了自由自觉的程度，统治者不再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统治者与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不再对立；统治者不再奴役劳动者而与劳动者关系平等；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异化，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财富也就越多，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即人自身感性和理性统一而和谐，人格统一而不分裂。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源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扭曲，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恩格斯指出：“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③ 到那时，即共产主义社会人才真正不再以私有者的身份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才能超出所有权这一“使用和滥用的权利”的狭隘眼界，“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有用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两极对立”状态消除，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

2. 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

人道主义自然观有着特定的含义，作为认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范畴指人本主义，它把人类自己看作整个自然的目的，强调关注人自身的生存、发展，高扬人能动的主体性精神，以人的福祉为终极价值目标，而自然对于人而言也具有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为人而存在并为人所利用。认为人类能够洞察自然的奥秘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而完全可以实现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绝对控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道主义自然观不能为人们看待和处理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提供正确的基点。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生理基础和活动条件，无论人的肉体、人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发展资料都离不开自然界。不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基础性和客观性，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21.

从根本上否定了人自身的生存。马克思指出，即使是人的创造活动也必须以“物质的先行存在”为前提；“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① 他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对象，但劳动对象本身又以自己固有的自然属性制约着人的这种改造活动。人道主义自然观的错误，不在于它承认人的主体性，而在于它夸大了人生存的特殊性，否认人的主体性必须以承认自然的客观性为基础，完全从人的利害关系出发、以对人是否有利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标准。因此，人道主义世界观不能成为人与自然相处的唯一思想基础。

而自然主义则强调自然界存在本身具有目的性的价值与意义，要求承认自然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凡是存在的就应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坚持自然保护主义的“诺亚原理”。“诺亚原理”是生态学家埃伦费尔德借用《圣经》中“诺亚方舟”的传说而命名。在一切都被洪水淹没的情况下，诺亚不仅自己借助方舟逃脱了灾难，而且把其他动物也救上了船，没有一个物种受到遗弃。“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咐诺亚的。”保护自然的根据不在于对人是否有用，每一个物种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生存权利”。它们应当受到保护，因为它们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极其古老、庄严的历史延续过程。

自然主义突出人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受动性，把自然存在物人格化，赋予其主体性的权利，这就必然要抹杀或忽略人存在的特殊性，把人降低为单纯的自然存在物。人只能在自然所规定的范围内像其他动物一样生存，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现实的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中，人类的利益还是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因此，自然主义也不能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价值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合理的标准应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 人和自然的关系完成了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体现在：首先，“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指“人的自然本质”，人道的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然化，人类本身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其中内含着对非人类自然存在物的平等认知。其次，“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即人实现“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在自然身上打上人的目的和意志的印记，将自然人道化，按照人的真实的本质占有自然，“把自然界改造成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此时，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更加合理化，“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 马克思所说的“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即“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也就是以美的非破坏性、非损害性的特质来“占有”自然界。自然不仅仅是统治的、施与权力的对象，而且也是自由的、解放的对象，这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这样，“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

马克思超越了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对立，摆脱了反自然的人道主义和非人道的自然主义的局限，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道主义充分发展，上升为一种包含了自然的人道主义；而自然主义也克服了单一性，上升为一种包含了人道的自然主义。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相互交融，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实现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③”，体现出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有机结合，呈现出一幅最高境界的人与自然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生动画面。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的这一思想显现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现代生态理念。共生共荣关系是指人与自然之间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不是单一地以某一方为中心的单向运动，而是二者的双向互动，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双方都得到生存和发展，从而使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与自然的优化相得益彰，形成正反馈的动态统一关系，产生“互惠互利”的双赢效果，表现为一方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另一方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因此，在思维方式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强调的是综合的整体性思维，从根本上克服了只顾及人类利益而忽略自然平衡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又弥补了自然主义对人类主体性淡漠的理论缺陷，是对人道主义自然观和自然主义的积极扬弃。首先，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虽然和人道主义自然观一样，都把人看成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但是，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人道主义自然观，它没有把人看成是整个价值世界的绝对中心和对自然的绝对主宰，反对人对自然的恣意妄为，它立足于人需要的满足应建立在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损害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克服了将主体和客体从对立的两极来思考问题的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式。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与自然主义也有某种共通之处，都认为应尊重自然界的固有规律，但它克服了自然主义的浪漫，主张人对自然的积极改造。由此，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第三条道路”，使人类既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也不会为了保护自然，而不顾及人自身的利益；既弘扬人的主体性又兼顾自然的优化，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人的尺度与对象尺度、主体选择性和客观必然性的有机统一。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远不如今天这样严重，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非常深刻。他的一些生态观点在100多年前即体现了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这一点尤为可贵。如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重要的生态学维度；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的思想表现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然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把生态环境问题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考察，从制度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成因，这一点也是深刻的。尽管一些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消除生态危机、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案的分析抱有不同看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批判功能所彰显出来的分析问题的宏大视角却是令其崇拜的。马克思的一些生态观点对当今世界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观察生态问题，必须透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要利润至上原则仍起支配作用，生态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因此，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批判的正确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两大主题，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辩证地探讨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特点和规律，指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合理路径，即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融合，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启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且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之

一，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 并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②] 这一论述明确了和谐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经济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三位一体，是三者互相影响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其中任一要素的单一发展。而这三者的关系本质上可以浓缩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其核心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人的利益与自然存在和谐共存的生态思想。

（一）“自然的人道主义”思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导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基础，是以自然为前提、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本体论，即人本论。马克思关注人，其理论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核心，认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就必须把自然对象化、人化，把原初的、同人不是直接相适应的自然改变成为“人化的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是为了人性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和谐社会”中的“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

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保护自然并不是不要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要以发展为主导，只有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减少、减轻贫困，才能实现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因噎废食，为了生态保护而裹步不前放弃发展，甚至在原始的意义上回归自然过茹毛饮血的生活有悖和谐社会精神。这种自然环境空气虽然清洁，但缺衣少食，疾病丛生，寿命短促，绝非理想的生存环境。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③]，邓小平也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胡锦涛总书记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要靠发展。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④] 科学发展观明确地将“以人为本”作为理论核心。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

---

①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706.

②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706.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708.

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① 和谐社会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社会。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念和意识。因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经济条件直接影响和制约环保意识和行动，二者存在一定的正比例关系。社会经济基础不同的人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会拥有不同的能力、资源、权利和期望，从而也就决定了对待环境态度的差别性。在某种意义上讲，贫穷是污染最严重的形式，或说贫穷是最大的污染。经济落后，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难以满足时，人的环境意识必然让位于生存意识，对环境质量的渴望远远小于饥饿感的消除。此时，满足生存的需要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一个要活命，还是要长寿的问题；是能生存，还是要毁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很难期望他们为环境做出牺牲和付出代价。严峻的生存压力使人不得不乱砍滥伐、猎杀野生动物、破坏自然资源，由此导致土壤肥力降低、水土流失、森林资源急剧减少等环境问题和各种连带的自然灾害。对自然的破坏性攫取成为解决生存的主要方式，即使能够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也难以自律。如我国云南天池保护区的农民意识到不能破坏环境，但是他们为了照明、做饭和建房，到保护区盗伐树木就成了唯一选择。于是，产生"双输"的效应，人们不得不承受贫困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并且，贫困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生态恶化又加剧了贫困，因此而陷入经济贫困和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所以，联合国发展组织在《人类环境宣言》中说："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大半是由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牢记他们的优先任务和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必要。"②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进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对于我国来说，第一位的也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才能最终摆脱贫困和愚昧，而经济停滞和衰退却可能和环境问题相互促动，加重环境危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这种互补性在当代逐渐成为共识并越来越深入人心。

（二）"人的自然主义"思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发展是主导，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主张人在自然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② 王伟．生存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

中的主导地位，但反对对自然的恣意，强调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中要坚持对自然的非破坏性、非损害性，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创造活动必须以自然的先在性、基础性和客观性的“物质的先行存在”为前提。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重新审视推动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境承载力相协调，要力求降低自然资产的耗竭速率，使之低于资源的再生速率或替代品的开发速率。不仅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而且要达到“生态良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资源消费量急剧增加，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人与自然关系不协调的问题非常严重。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我国的城市结构、社会经济结构、交通运输体系和国民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直接对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污染物排放量极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从总体上讲，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急剧地向农村蔓延，不少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并呈发展趋势，大气污染严重，酸雨面积已超过国土面积的29%。生态环境在建设的同时，又遭受破坏，且范围在扩大，原有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产生。可以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的一两百年中分期产生、分期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的发展中集中地呈现出来。目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增长的加速时期，但由于经济基础差，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量大，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和激化，加之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增长态势，使我国本来就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2005年1月，“世界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按照满分100分的标准，芬兰位居第一，中国得分38.6名列第133位（倒数第14位）。而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①]。

事实告诉我们，我国过去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无度消耗甚至是透支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生态是和谐之本，发展是和谐之基。我们能不能最终建立起和谐社会，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把握好生态与发展的矛盾，处理好生态与发展的关系，寻求生态与发展的结合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构建和谐社会新路。为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要“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依法淘

① 梁从诫.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M］.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15.

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工程，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①

显而易见，调整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变革传统的与劳动力过剩、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状况相适应的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费、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种经济发展遵循的是“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单向流动的方式，导致资源日趋减少，污染却日益严重。不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能源、资源的瓶颈制约就难以打破，经济运行也难以进入良性循环，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就难以持久，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能实现。而循环经济的发展遵循的是“资源—生产—消费—二次资源”循环流动的方式，以循环利用物质为基础，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力求实现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因此，要大力推广循环经济模式，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少投入、多产出、多利用、少排放的经济集约型发展之路，减少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压力。

一个和谐合理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也应该保障自然资源、生命系统能够正常地延续和发展。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对自然的需求不能超越其可供量，破坏它的生态结构。惟其如此，才能确保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又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这样，就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和谐社会，就是双赢互利的社会。着眼于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展示和谐统一的全新意义。

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应着重强化几个意识：

第一，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即维护自然的完整与稳定，维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统一和生态系统各部分的动态平衡，这是我们对自然应持的基本伦理态度。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母体，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有一条永远割不断的脐带。人作为自然之子，无时无刻不受自然之恩惠。人不应是凌驾于自然之上，面对自然发号施令的征服者，而应是维护自然稳定与和谐的调节者。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从一个号令自然的主人到一个善待自然的朋友。人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由于自然不能自动地满足人与社会的诸多需求，所以人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影响环境来达到其目的，这样，人就在一定的意义上获得了对自然的独立性。然而，无论这种独立性如何强大，人化的自然如何日益拓展，人并没有也不能完全挣脱自然的怀抱。人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依赖性并不因为技术进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656.

和生产发展而改变——技术和文明进步只是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方式。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利用和改变自然的能力越大，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就越强。因此，人与自然、与环境的关系不能仅仅化约为主体和客体的外在关系，更应理解为人就是自然机体的一个部分。遵循自然之道，即遵循生态规律，尽管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把握自然的内在运行规律，但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预知人的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其一，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生态系统都有一定的负荷能力，如果超过负荷，它的稳定性就会遭到破坏，生态平衡就被打破。其二，自然资源的补给、再生和增殖是需要时间的，一旦超过了极限，要想恢复则困难重重，有时甚至是不可逆转。所以，撇开、背离自然之道对自然肆意开发和掠夺，就会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而人自身也在劫难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自觉意识和实践态度。

第二，在消费环节，要加强舆论导向大力倡导适度消费，树立节约资源的社会意识和风气。适度消费是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的消费，是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方式，它既不是禁欲主义地反对消费，也不是享乐主义地过度消费，而是倡导健康理性、有节制的消费，反对奢侈、浪费型的消费，舍弃生活消费中过度包装、“一次性”用品等资源浪费现象，因为这种消费强化了对环境的索取，增加了环境对废物净化的负荷；要弘扬施行绿色消费，鼓励消费者选购对环境无害的商品，反对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并制约和鼓励企业转向绿色生产。

第三，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是实现和谐社会人与自然相和谐由认识到行动的关键。普通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参与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20 世纪中叶以来治理环境的实践说明，环境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变更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技术及有效的治理，但更关键的是植根于深层的公民环境意识的革命性变革。行动起于意识，不同的环境意识形成不同的行为。环境意识是调控人对社会环境行为的根本，是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治本”之道。近些年，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虽然有了明显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70 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普遍的环境宣传教育，公众对环境和环境问题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环境意识调查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还比较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存在着明显差异。进一步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仍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①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② 可以说，环境意识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环境保护，教育为

① 国家环保总局．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437.

②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707.

本”，世界各国都将环境教育视为提高全民环境意识的基本手段。因此，我们也要加强环境教育，广泛普及和宣传环境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大力弘扬环境道德，倡导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为。通过环境教育，使公众的环境意识由自发升华为自觉、由被动上升到主动、由道德“他律”进入道德“自律”。

第二章
社会发展的和谐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发展难题的破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耗费了各种财富资源。战后，百废待兴，“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所以，这个时期，“单一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发展理论的主流诉求，并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发展”。人们将社会发展状况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类型。社会发展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趋近的过程，而其实现手段就是“经济增长”。但是，按照这一范式进行的发展，一些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经济的畸形发展主要表现为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而忽视质的优化。与此同时，由于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贫富差距等，以至危及到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上面提到的某些问题。面对如此社会发展问题，我们怎么办？这需要我们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处去寻找破解这些难题的答案。

一、问题：现代社会发展难题与西方学者的发展新范式

（一）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同步

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贫富差距等问题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在对现代性的畸形发展过程中，人的生活世界受到强烈挤压，人成为单纯的理性动物、经济动物，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日益加深，人们逐渐远离自己的精神家园，精神的迷失成了物欲社会中难以治疗的‘顽疾’；尤其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加速发展，直接危及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人的生命安全，人的发展

前景并非那么光明。”①

西方的学者对这一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笔着重彩，进行了客观的表述，如加拿大文化学者保罗·谢弗在其著作《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中引用了一句警告语：

> “我们可能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们正处于世界转型的过程中，这个关键的阶段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一次伟大的变革。”②

他认为人类已经走到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些证据之一“便是环境危机，与之相伴的则是战略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诸如木材、水、煤、天然气、电、鱼、石油，其中可耕地的减少尤为严重”。证据之二“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被迅速拉大”。其他的证据则包括：“令人触目惊心的污染、贫困、饥荒和失业，传染病的扩散，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升级，失衡性的世界两极分化，核生化战争的威胁，以及谋求‘人性化发展’所遭遇的失败。”③这些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谢弗接着分析到：

> “人们稍加思考即可想到，如果这些问题找不到相应的解决方案，世界将会出现怎样的畸变。隐藏在这些问题的背后的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潜在的致命问题。随着世界人口达到60亿并持续加速的增长，随着地球载荷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找不到有效的防范途径，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必将崩溃。正是基于这样一些理由，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日渐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生存状况需要一次重大的转变以便恢复其健康状况。”④

从自由的角度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阿马蒂亚·森也有与此十分接近的观点：

>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中，在一二百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在经济范围之外也有很多令人瞩目的变化发生。……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不仅有老问题，还有很多新问

① 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3.

② 转引自［加］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M］．高广卿，陈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序言1.

③ ［加］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M］．高广卿，陈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序言1.

④ ［加］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M］．高广卿，陈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序言1～2.

题，包括长期的贫困与得不到满足的基本需要，饥荒和大范围饥馑的发生，对起码的政治自由和基本的自由权的侵犯，对妇女的权益和主体地位的严重忽略，对我们环境及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维系力不断加深的威胁。许多这样的剥夺，都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富国和穷国观察到。”①

而名动一时的经济增长示警书——《增长的极限》中的描述更为深刻：

“为维护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物质流的数量与质量所要求的能量和资本不断提高。这些成本的产生综合了物理、环境和社会因素。最终它们将提高到工业增长无法持续的水平。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促使物质经济扩展的正反馈圈将逆转方向，经济将开始收缩。”②

该书道出了只重经济增长而不重视生态、社会问题，将出现不可逆转的重大问题。

众多的发展难题无疑都指向了一点：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不同步。资源在代际和代内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在代内的不合理分配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在代际的不合理分配主要体现在环境的恶化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这使得我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只是用来发展了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却没有得到发展。这一现代社会发展难题举世瞩目，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研究和争鸣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西方学者对现代社会发展难题起因的分析

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较早，所以其现代社会发展问题暴露的就比较早，与之相符，其对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的理论自觉也就比较早。其批判的理论自觉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经济增长范式和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工业化的批判与反思中；其建构的理论自觉主要体现在对新发展范式的尝试性建构。

1. 新发展观的观点：“经济主义”的核算体系存在问题

西方新发展观论者佩鲁和森认为现代社会发展出现众多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传统发展评价设计中的核算体系有问题。他们都对这种传统的核算体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判，认为正是这些核算体系使发展偏离了方向，失去了为人的目标。

---

①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序言 23～24.

② ［美］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增长的极限［M］．李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47.

佩鲁认为："对传统经济学中作为一个抽象观念的短缺所作的这一初步分析，表明有必要对有限条件下的最大化这一理性经济学的准则或范型提出质疑。"① 这种核算体系："根本不考虑是谁在追求最大化、对什么实行最大化、随这种最大化而出现的间接效应是什么的问题。"② 佩鲁认为，这种核算体系"对'经济的'和'社会的'加以区分"，只关注经济问题，使得"工人和所有那些因身份低下而无法在社会总产品和总收入中享有一定份额的人员在体力上和人格上的完善"③ 成问题。所以，这种核算体系造成了身份低下者发展的障碍。

佩鲁将这种存在于现实发展中的核算体系的问题归谬于一些学者们的错误理论，并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佩鲁对古典经济学家阿瑟·W·刘易斯的批判："他的著作只与增长有关，除增长外概不涉及其他问题：在他的笔下竟然偶尔也露出发展和进步的字眼，但这只是为了使叙述有所变化而已。"④ 并认为，"我们也可证明刘易斯把亚当·斯密的视野搞得更狭隘了，因为后者曾在《论国民财富的起源和本质》中就国民收入及其构成和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泛而富有成果的思想"⑤。在佩鲁看来，相对于斯密，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更加狭隘。佩鲁还找到了这种理论的哲学根源，认为："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甚至直至今日似乎还在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这是个事实。"⑥ 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甚至是"经济主义"的："鼻祖们的功利主义，由于虽然并发但却各不相同的理由，逐渐被程式化、掺假并退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成了被讽刺地命名为'经济主义'的思想漫画。"⑦

"经济主义"的核算体系，根本不考虑人，不考虑文化价值的进步。佩鲁认为，不计算文化价值的核算体系是无法言说发展的，因为：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他告诫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⑧ 所以，佩鲁倡导一种从人的成本的角度进行的核算，认为"这些成本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维持个人物质平衡和精神平衡的成本，一部分是能够使每个人享受智力

---

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前言6.

②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前言6～7.

③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9.

④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7.

⑤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8.

⑥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3.

⑦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3.

⑧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5.

与精神生活（教育）的成本，另一部分是给每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的成本，因为没有闲暇，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①

新发展观的另一位杰出代表阿马蒂亚·森也从发展的核算体系的角度对传统的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森在其著作中，引导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 “以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甚至更早一点发生在韩国的危机为例，人们也许会奇怪，一个国家在几十年间每年经济增长5%或10%以后，为什么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年中下降5%或10%对它会是如此灾难性的事情。从总水平来说，它的确不是典型的灾难局面。但是，如果5%或10%的下降不是由全部人口平均分担，而是主要压在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身上，那么这一部分人就不会有什么收入了。”②

在灾难（一个发展问题）面前，这种评价体系是失灵的。由此，森展开了对传统发展核算体系的批判。认为，这种只考虑物质财富增长的核算体系对于发展的评价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森批判这种狭隘的发展观并倡导“扩展人类自由”的发展观：

> “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当然，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的增长，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的手段，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由同时还依赖于其他收入因素，诸如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公共讨论和检视的自由）……如果发展所要促进的就是自由，那么就有很强的理由来集中注意这一主导性目的，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手段，或者某些特别选中的工具。”③

所以，“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④，必须超越这种传统的核算体系，构建一种“有人在场”的发展核算

---

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6.

②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82.

③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

④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

体系。

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技理性使人异化

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相对于新发展观对现代社会发展难题原因剖析的深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似乎更加深刻。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异化论的角度来阐释发展难题，认为正是异化使发展的成果与发展主体的提升不同步。他们认为这种异化来自于科技理性的泛滥。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工厂劳作是按照科技理性组织起来的，不符合人性，对人的发展造成制约。卢卡奇认为：

> “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过程的真正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的，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①

科技理性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合规律性，其未必合人的目的性。科技原则运用到分工等组织环节，使得分工外在于人，“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② 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原则的滥用，使劳动者处于一种人性不能得到关照的境地。

第二，科技与资本主义政权勾结，成为控制劳动者的工具。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通过科技“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人的控制”③；认为现代“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用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离德的力量。”④ 科技成为社会控制和制造病态社会的刽子手。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把现代社会描述为“单面性的社会”，在《工业社会与新左派》中则把其描绘为“有病的社会”。他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⑤ 如果“人们没有任何自己的意愿或信念，如果他们是一些被异化的自动机器，他们怎么能够表达‘他们的’意愿呢?”。⑥

---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0～151.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2.

③ ［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69.

④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

⑤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4.

⑥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蒋重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23.

科技成为霸主，其原则渗透到了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中，以科技理性为原则的各种活动的展开不是按照人的逻辑进行的，恰恰相反，它却制约了人的发展，使人畸形化，其带来的不是各个阶层的福祉，而是使人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终造成了单向度的人的生成。

（三）西方学者针对现代社会发展难题所提出的发展理论新范式

分析问题是为了最终的解决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注重对发展难题深层原因的揭露和探索，而新发展观更注重于对发展难题解决之道的探索。他们认为，传统的发展范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现实，需要转换为新的发展范式。三位新发展理论的研究者——弗朗索瓦·佩鲁、阿马蒂亚·森和保罗·谢弗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分别提出了向“价值本位”、“自由本位”和“文化本位”发展范式转换的理论。

1. 弗朗索瓦·佩鲁的“价值本位发展范式”

面对“经济增长发展观”，佩鲁反思道：“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增长是有益的？增长是为什么人的？”[①]佩鲁认为现有的经济学描述的各种指标只能让我们认清物质财富的多少，对人的发展却没有丝毫的关照。他认为只重视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是行不通的，因为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②]“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③] 在佩鲁看来，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文化价值的发展状况是经济增长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它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所以，佩鲁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就在于文化价值的进步。针对传统的“经济增长范式”，他提出了新的社会发展范式——“价值本位范式”。

“范式革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革命。一种新范式的出现需要一种新的哲学理念的建构，需要有超越传统功利主义哲学的新的哲学为基础。新的哲学是什么？佩鲁试图进行寻找：“在这一领域中的抉择无论怎样困难、怎样带有主观性，我们都认为，在世界迫在眉睫的激剧动荡使人们进行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而且应当从卡尔·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从基督教的行动哲学（产生于莫里斯·

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8～9.
②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65.
③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5.

布隆代尔的个人人格至上）汲取宝贵的训诫。”[①] 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还是基督教的行动哲学？佩鲁认为：“马克思原初理论中保留下来的是被剥削被压迫者对自由日益高涨的渴望，当时，他们在一个有利的历史时期，成功地把政治活动同广泛的、潜伏的拒绝接受制度性弊端的运动结合起来。即使在人们考虑到马克思的思想绝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自发哲学’时，它也是具有极其深远意义的教益；但马克思的哲学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行动哲学。”[②] 而“在莫里斯·布隆代尔的著作中，则可以找到一个精心设计、结构完整的行动哲学。”[③] 所以，佩鲁找到的不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而是莫里斯·布隆代尔的行动哲学。

在对发展范式进行了哲学构建之后，佩鲁又进行了现实层面的分析，认为“要顺利地由传统等级制经过一种过渡形式而走向一种新的等级制，必须作出真心诚意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传统文化价值。”他认为，“制定新的标准并找到使旧价值观念更新但同时又不是歪曲它们的新手段的需要，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达到的程度是衡量发展是否完满、是否取得持续成功的试金石。”[④]

佩鲁进一步分析到，对于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主要指标应该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必须就生活条件、文化和政治意志的锻炼提高个人和群体的标准（社会前进的条件）”；第二，“它必须始终使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向着最佳一般结构的方向发展，以促进该共同体内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良好结构的条件）”；第三，“一旦具备了这两个先决条件，它必须尽可能迅速地促使革新和投资的收益、科学知识和艺术创造性在整个人口中普及。”[⑤]

这种新的发展指标体系必须考虑到全面协调性：

依赖完全相同的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相继阶段不可能按照总人口的利益分配革新、投资及其结果。在不平等且主动性各异的集团之间存在着结构的和社会的辩证法，只有对这种关系加以组织和协调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曾经说过必须对发展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会产生一种协调发展的策略和战略。[⑥]

同时，新发展观非常关注人，认为在指标体系设立的过程中要计算“人的成本”，计算人的全面生活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维持个人物质平衡和精神平衡的成本，一部分是能够使每个人享受智力与精神生

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00.
②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01.
③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01.
④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2.
⑤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2.
⑥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67.

活（教育）的成本，另一部分是给每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的成本，因为没有闲暇，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①

佩鲁认为，通过这样的结构设计，“就使我们涉及到对我们分析的统计手段及其长期内容来说往往很难理解的结构：这种结构把我们带入发展过程的现实之中，也就是说，把我们带入客体（产品）与人类的关系之中。”② 这种新指标体系的确立在背后蕴含着一种发展观的范式革命，向着重视人的价值的方向转变，他要让我们知道：“市场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工业属于世界，而不是世界属于工业；如果资源的分配和劳动的产品要有一个合法的基础的话，即便是在经济学方面，也应依据以人为中心的战略。”③

重视发展的文化价值问题，会从根本上提高发展的动力，佩鲁让我们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④

2.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本位发展范式”

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非常独到，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冲击是深沉而巨大的。

森认为发展的核心要素是自由。其给出了自由在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两个理由——评价性因素和实效性因素。

森认为，“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这一评价立场不同于传统的规范性分析，后者注重的是其他变量，例如效用、或程序性自由、或实际收入”⑤，这是森所谓的发展的评价性因素。关于发展的时效性，森认为“自由不仅是评价成功或失败的基础，它还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重要决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而这些对发展过程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所关心的与我们（冒着过度简化的危险）或可称作的个人‘主体（agency）地位’有关。”⑥

可见，森认为，只有自由才能符合发展的目的，并且使得发展更有实效性。所以，“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

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6.
②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5.
③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2.
④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5.
⑤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
⑥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

度干预。”① 森认为，需要消除的还包括由于经济贫困而带来饥饿、营养不足、衣食住条件不良等因素，以及由于“缺乏公共设施和社会关系，诸如防疫计划、对医疗保健或教育设施的组织安排、有效地维持地区和平与秩序的机构”②而带来的公共品不足等问题。此外，还要消除“权威主义政权对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以及对参与社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自由的限制。”③

如何消除这些限制自由的因素呢？森提出了五种工具性的自由：“① 政治自由；② 经济条件；③ 社会机会；④ 透明性保证；⑤ 防护性保障。”④ 这些工具性的自由保障了人的“可行能力”，进而保障了人的自由。“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⑤ 由国家和社会来进行保障的这种“可行能力”是森“以自由看待发展”视角中的一个核心追求。森认为“在分析社会正义时，有很强的理由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⑥ 来进行判定。为了具有操作性，森以“可行能力”为基础设置新的发展核算体系，对人类发展的收益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人类发展的收益，……远远超出了对生活质量的直接提升，它还包括对人们的生产能力以及广泛分享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识字和算数的能力帮助大众参与经济扩展的过程（从日本到泰国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了利用全球贸易的机会，‘质量控制’和‘按产品规格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盲或数盲的劳工很难胜任和保住这些工作。此外，还有很多证据表明，改善医疗保健和营养也会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及其收入。”⑦

市场机制本身是不能调控好人们的可行能力的，因为“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⑧ 所以，“就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创新来创造社会机会。……我们看到，今天的富裕国家在

---

①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②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③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④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1.

⑤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3.

⑥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5.

⑦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6.

⑧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6.

过去历史上引人注目的公共行动，分别涉及教育、医疗保健和土地改革等等。广泛分享这些社会机会使得许多民众得以直接参与经济扩展的过程。”①

因此，发展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国家为广大民众提供可行能力的政策支持，使得广大民众获得“可行能力”，进而实现自由，使得自由成为发展的目的，与之同时，人们的主体价值的提升又使发展的实效性得到提高。

3. 保罗·谢弗的“文化本位发展范式”

保罗·谢弗认为，“人类已经走到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②，“经济时代无法解决那些棘手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并且正挫伤着人类生存元气的问题，无法使地球生态恢复其健康状态。”③ 这些问题只能在文化时代得到解决。“这样一个时代的主要成果是，在其包含一切的结构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体论、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以及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将获得更高的优先发展地位。这就有可能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需求，同时也能够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同时，这种时代还将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位，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合实际的、持续连贯的确立。”④ 由此，谢弗提出了“文化本位”的社会发展新范式。他认为，文化时代充满了人文关怀，其发展追求代内和谐与代际和谐，是对原来的“经济增长范式”的全面超越。

“文化本位”发展范式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史观。保罗·谢弗认为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必须用文化史观来代替经济史观：

> “历史上被创造出来的每一种文化都是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容，都是由众多各自独立且相互关系错综复杂的部分所构成的整体。尽管经济学和经济的确构成了其中极为根本的部分，因为他们历来都被视为人类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并且关系到生生不息的问题，但它们实质上仍然只是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并且也更加根本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前面所说，文化和民族文化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构件，并且成为人类生存的基础。这使得文化史观成为切实可行的对历史最准确和最可靠的解

①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6.

② ［加］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M］．高广卿，陈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序言1.

③ ［加］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M］．高广卿，陈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序言7.

④ ［加］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M］．高广卿，陈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序言9.

读方法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它符合现实状况、人类生存状况，以及历史发展的本质。这一史观出自于这样一个原理，即看待历史应当从一种全面的、平等的和多维的角度出发，而不应当从片面的、偏袒的和一维的角度出发。"①

保罗·谢弗认为经济只是考察社会问题的一个维度，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认为单纯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经济维度的考察评析是有问题的。他认为人是多维的，是全面的，因为"无论人们现在如何贫困或一直以来如何贫困，他们从来都没有忽视在这些方面的需求，即社会组织、娱乐、宗教和精神文明、艺术表现、神化、表演、象征主义、通知方式、培训，以及简单的休闲。这些需求对于人的整体生存和福利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有着与其经济和物质要求完全相同的重要意义。"② 因此，在"解读历史"时，"文化史观与经济史观相比"就"更加准确和可靠"。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

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不同步这一现代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难题彰显出发展的理论研究。当前，要开发出具有中国气派的发展理论，需要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寻找资源。然而，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并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我们的自觉把握。要真正完成对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把握，需要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转向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学者高清海在论述建构新的发展理论时曾说过："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必须以人类历史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现代理论成就为基础。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理论的开创人和奠基者，他所提出的实践观点应当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③ 从马克思的实践论入手对马克思发展哲学的范式革命进行考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研究的唯一正确的致思路径。

这一工作的完成需建立在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层研究的基础之上，但这种研究不应当是无意识的。科学哲学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察渗透理论"④，其对文本学研究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过程中是带着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所凸显出来的现实问题的。当今社会发展实践中，人们经

① ［加］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M］．高广卿，陈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22.

② ［加］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M］．高广卿，陈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27.

③ 高清海．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化趋向及其面临的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1994（2）.

④ "观察渗透理论"是著名科学哲学家N·汉森提出来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其主旨是：观察方式本身受到理论的影响，感觉经验里面隐藏着理论，观察描述带有理论语言。用在本文，意在说明本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是带着当代社会发展实践难题的视角而展开的。

常会面临发展的理性诉求和价值诉求的冲突问题，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依靠从马克思实践论所蕴含的关于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相关理论中去寻求答案。

（一）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转向与社会发展观的革命

马克思批判和分析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革命来自于其实践论转向，正是实践论的转向，使马克思超越了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找到了打开现代社会发展秘密之门的钥匙。

1.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转向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马克思的实践方法论是达到改变世界的通途，是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区别开来的根本之所在。其实践论是在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中逐渐生成的，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以正式形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② 马克思指出：

>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③

马克思抓住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缺陷，认为它们只是抓住了主客关系中的一端，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活动。

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工作在马克思随后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延续下来。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哲学对现实的批判是无力的，“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④ 认为这些批判都是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⑤ 尽管有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区分，但是他们都没有跳出意识形态本身的窠臼：“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则通过以宗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② 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要清算的是新唯物主义诞生前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但是本文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观点与马克思之前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

⑤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

教观念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来批判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① 循其理论，青年黑格尔派是通过同意识作斗争而消除束缚自己的限制。所以，马克思毫不客气地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道：他们仍然是一些意识形态家，尽管他们"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② 因为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他们"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③

这样的哲学批判是无力的，马克思强烈批判道："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④ 马克思认为，沉湎于"词句"批判的哲学家们在现实面前是无力的，或者说跟现实是无关的，这种哲学根本找不到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马克思论述道："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⑤ 所以，对这种不能实现社会发展从而完成人的解放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必定会被马克思所抛弃的。

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把一切都诉诸感性的直观，把自然和人看作直观对象，他没有看到，"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⑥ 马克思认为这种感性直观由于"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当遇到社会问题时，费尔巴哈"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而变成一个唯心主义者，所以"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⑦

由此可见，唯心主义者和旧唯物主义者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都是唯心主义的。在他们的理论中无法找到实现人的解放的科学的途径。因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
⑤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
⑥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0.
⑦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

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①

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强烈批判，再加上对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洞见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马克思的视阈定格在社会历史现实。认识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 在实践中，人、自然和社会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③ 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变革。

马克思的实践论哲学彻底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特质，脱离了传统哲学的静观的思辨的思维方式，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论哲学。哲学在马克思这里发生了实践论的转向。这种变革是一种范式的转换，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不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论转向，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社会发展哲学的范式革命，从而就不可能根本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本章开篇就对马克思实践论转向进行详细论述其深意也就在于此。

2. 实践论转向所带来的社会发展观革命

哲学的实践论转向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这一革命也带来了发展哲学的范式革命。哲学的实践论转向带来了关于“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解决人与社会问题的方法”以及“发展的价值诉求”等理论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共同构建了发展哲学的范式革命。

第一，关于“人的本质”。

以实践为立论之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论述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⑤ 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生成的。作为我们考察问题前提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所以，马克思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⑤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

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①

从实践的角度，马克思认识到人的实践生成性，是现实的实践活动生成着现实的人。所以分析问题不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②从进行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来分析问题，马克思论述道：“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③

第二，关于“社会的本质”。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④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人的实践生成性决定着社会的实践性。“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创新着——现存的关系。”⑤ 社会发端于处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的需要。正是个人的需要，使他们相互间结合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创新着这种关系。而这种需要都是由特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所以社会发展是具体的，是由具体的人，进而由具体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马克思清晰地论述道：“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⑥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本身就蕴含着“发展”，“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⑦ 所以，虽然人是社会生产实践生成的，但是人也是能动的，人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使社会得以发展。

第三，关于“解决人与社会问题的方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515.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⑦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

马克思认为人和社会都是实践的、具体的，这决定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的独特性。认为解决人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都应该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角度入手，而不应该从孤立的人的角度入手。因为造成人和社会问题的原因不是人的抽象本性，而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必须从人的实践生成性的视角去破解人与社会的问题。面对现代社会发展难题，马克思的旨趣，是深入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去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以此为视角，马克思考察出了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的根本起因——资本的逻辑。资本内涵着对劳动力的剥削，其间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靠劳动者“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劳动者“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① 所以，对资本的态度问题成为解决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的核心问题。而资本关系代表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的一贯的主张，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入手才能破解社会和人的问题。

第四，关于“发展的价值诉求”。

发展的价值诉求，包括人的发展的价值诉求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的实践生成性观点，决定了其价值诉求的实践性，人的发展的价值诉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社会和谐都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迷梦，而是一种消灭现实问题的生成式的发展过程。

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会逐渐生成。在私有制存在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人们会在已有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寻求自己的解放，这种解放会带来生产力的进一步的发展，历史发展的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在这种辩证的统一中不断地进行下去，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绝对地实现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正是一定的生产交往方式生成着一定的人，建立在特定的生产交往方式之上的人结合成特定的社会关系。人的现实性决定了社会发展的现实性。绝对的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别的绝对消灭，这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另一个是私有制的消除。满足这两个条件，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但是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并不是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②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马克思研究人和社会问题的实践论视角所带来的发展理论的方法论革命为人类解决当前发展中的理性诉求和价值诉求的冲突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实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6.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

本身既是一个客体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主体性的概念，既有合规律性，也有合目的性，所以发展既是主体的也是客体的，既是合规律的，也是合目的的，是历史和价值的统一。这一问题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难题，本文将重点阐释。

3. 马克思考察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两个维度：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

如前所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践论转向缘起于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唯心主义却只从能动的形式也就是只从主体的形式来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所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人的活动都不能进行全面的把握。只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才从主体和客体两种形式来认识人类的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 在实践过程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共同构成了实践的过程。

实践的两种形式：客体的形式和主体的形式，便构成了实践的两个维度。客体形式反映的是环境被改变的情况；而主体形式反映的是人的自我改变。这两个维度是交织在一起的，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主体根据规律来改造客体，是合规律性的，可以称其为实践的理性维度；另一方面，被改造的客体对主体应该是有意义的，是合目的性的，可以称其为实践的价值维度。主体客体化，遵循理性尺度；客体主体化，遵循价值尺度。这两者辩证统一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主体按照规律更好地改造客体，才可以更好地为主体的发展服务，而主体的更好的发展，又可以使主体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但是，如果主体改造的客体不符合主体的需求，或者没有用于主体的提高，这样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而为了人类的需求不按照客观规律改造客体，也是会造成灾难的。所以，两者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张力。

以实践论为立论之基，马克思解决了发展中理性缺失或价值缺失的问题，实现了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的辩证统一，从而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发展之路。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其实践论转向，并开辟了发展哲学的新范式。这是其分析发展问题的哲学方法论。按照这一方法论，马克思将其一生的绝大部分研究时间都投入到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究之中。在其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马克思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价值理想，对现实的社会发展进行理性的分析和价值的考量。现代社会发展实践在理性与价值的冲突与消解的过程中言说着人的生存境遇。资本逻辑带来的人的价值贫困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但理论的探索和社会发展主体的自觉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要达到全面而自由的人的生成，单纯的价值指引是不够的，扎根现实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批判分析是必须的。马克思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解蔽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批判，提升人的价值，在新的高度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性和价值的辩证统一。

（二）资本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经济哲学视阈

马克思在形成其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后，开始将其研究视角深入到物质利益深处，从政治经济学中探寻现代社会发展的奥秘。以其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考察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为理论视角，马克思将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中。为了揭示现代社会中隐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所作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蔽物化的世界。

1. 解蔽物化：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进行价值批判的前奏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和手稿中，所做的重要的工作就是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其对现代社会发展进行价值审视的前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人被片面物化[①]的时代，“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②] 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③] 代之而起的是“利害关系”和“现金交易”。“利害关系”和“现金交易”表征的是物与物的比价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让位于物与物的关系，物化世界得以生成。资产阶级经济学便在抽象地承认物化合理的基础上建构了其理论大厦，其在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创造物质财富的人的关照。物质丰富的背后，是历史主体的价值的贫穷。然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④]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重物不重人”的理论旨趣不同，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发展之路，其手段就是透过物

① 物化逻辑萌芽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Ⅱ、笔记本Ⅲ及穆勒评注，确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后，马克思的论述不再局限于人与物分离的线性异化逻辑，而通过成“象”的“物”的关系呈现人的关系性本质。物化的解蔽，澄清了物化背后的人与人的不平等的关系，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强烈的价值批判。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

化关系，考察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充斥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的现实表现就是商品、货币和资本，所以本文所提出的解蔽物化，也就是对商品－货币－资本本质的解蔽。商品、货币、资本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产物。价值关系的逻辑与历史的展开依次经历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阶段，所以本文对物化解蔽的过程也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的。

商品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诊断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 所以，马克思对物化进行解蔽始于对商品的解蔽。以对商品本质的分析，马克思打开了解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大门。

马克思谈道，商品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但是其"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就商品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它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② 商品形式的奥妙在于："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③ 这说明，从本质上看，商品关系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人的劳动产品实现为商品，私人劳动才得到承认。循此思路，商品看似是私人劳动的产物，来自于劳动者个体的意志，其实不是，劳动产品要想得到实现，成为商品，就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整个社会劳动体系中的一部分。对某人的承认来自于对其创造的物的承认。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

随着价值形式的逻辑与历史的展开，"商品"发展为"货币"，马克思论说道："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内在的货币属性；商品的这个货币属性作为货币同商品相分离，取得了一个同一切特殊商品及其自然存在形式相分离的一般社会存在；产品对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的关系，成为产品对同它并存的货币的关系，或者说，成为一切产品对在它们全体之外存在的货币的关系。正像产品的实际交换产生产品的交换价值，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货币。"④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一种"直接"的和"普遍"的"可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9.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6.

换性”，这便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是“金银”这种作为货币物质载体的自然物本身具有“直接”的和“普遍”的可交换性，而与人的一般劳动的耗费和劳动的社会性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①所以，从本质上说，货币是重要的生产关系，它代表着对别人的劳动的支配的权力，“人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② 这样，“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③。所以，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信赖的是物（商品和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

劳动者和生产条件之间出现分离之后，开始出现雇佣劳动，价值形式相应地发展为资本。人不但受制于社会，而且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因为从本质上说，资本是活劳动与死劳动相交换。“价值的增加无非就是对象化劳动的增加，但是，只有通过活劳动，才能保存或增加对象化劳动”④，因而“价值即货币只有同活的劳动能力相交换才能转化为资本”。⑤ 所以，资本是一种关系，而且是一种对活劳动能力的关系，是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探索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商品的社会性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劳动组成社会劳动体系的一部分。一个人能否从社会获得自我发展的物质财富，就在于自己的劳动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成为整个社会劳动体系的一部分。而这种承认的表现就是获得交换价值或货币的量。“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⑥所以，在商品经济社会，是商品和货币将人与人结合起来。人不是自由的，人为了获得私人利益，就必须放弃个人的自由，因为“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⑦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正是这一机制完成了资源的配置，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但从价值的角度来说，这一机制妨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有甚者，随着价值关系运动到资本阶段，社会的发展更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上，虽然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资本的内在逻辑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9.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0.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0.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发展而带来人的价值贫困这一社会历史现象高度重视。从现实出发，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强烈的价值批判。

2. 价值批判：扎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批判

马克思通过其独到的分析，揭示出了物化（商品－货币－资本）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探索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注重对经济运行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对物化逻辑带来的人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激烈的价值批判。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商品和货币逻辑带来的人的无自由无个性状态。商品和货币的逻辑使人失去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① 如此看来，似乎人们在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过程中达到了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但马克思却从商品经济发展中人的生存境遇进行分析，认为不是每个人互相帮助别人实现利益，而是"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② 斯密所认为的万能的"看不见的手"，从配置资源的角度来说对经济的发展的确是意义非凡的。但是从社会发展的价值的角度来看，私人利益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③ 所以，商品和货币的内在属性使人没有了"个性自由"，失去了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批判了商品和货币给人带来无个性不自由的状态之后，开始转到对资本逻辑拒斥人的发展的价值批判之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内在逻辑使现代社会发展是以极高的代价进行的："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④ 资本逻辑的展现中，"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⑤ 因为"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6.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19.

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① 将劳动力的价值看成劳动本身的价值，从而心安理得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完成自己的发展，而使劳动者的发展失去了可能。更有甚者，“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价值，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② 工人没有了自由时间，根本就无法实现自我的价值，使自己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体力和智力都极端退化。③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和价值无法实现，失去自由发挥的空间。

由于资本内涵的剥削本性，带来了历史主体的极端价值贫困。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研究是从主客辩证统一的向度展开的。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价值批判的深意在于探讨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下人的存在状况，其目的是寻求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的社会发展之路。

3. 社会发展：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强烈的价值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迷梦，而是建立在与理性现实的辩证统一的基础之上的。

前面我们考察了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发展观。其发展观中内涵着辩证统一的两个维度：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本文也详细考察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批判，即考察了社会发展对历史主体的意义。但是本文在这里无意于造成一种对现代社会发展全盘否定的态势，这也不是马克思的初衷。因为马克思以其实践论作为考察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方法论，而实践本身是内涵着两个维度的。从理性的维度来度量，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是充分肯定的。

马克思认为商品－货币－资本的内在逻辑将人的发展带入了人对物的依赖阶段，马克思对这一发展阶段的评价是从理性和价值两个方面展开的。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人的依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物的依赖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④

所以，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看，资本主义这一人被片面物化的时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正是这个阶段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06.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0.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了空间。而且，马克思还分析道："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① 所以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也是高度肯定的，认为其是发展的必经阶段。

问题研究到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批判的意义何在？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按照前面的分析，实践包括两个维度：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实践活动要有序地进行下去，其理性层面和价值层面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因此，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现代社会发展，其理性层面和价值层面之间也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才能使其有序地进行下去。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是从实践的客体的角度来考察现代社会发展的，人类按照规律开发自然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也就是进行经济活动。其言说的是物质世界的丰富性。马克思从理性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予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 而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是从实践的主体的角度来考察现代社会发展的。人类开发自然界是为了主体的提升，为了主体获得更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它言说的是现代社会发展成果对现代社会发展主体的意义。正如本文在前面分析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现代社会发展进行了强烈的价值批判。

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之所以是合理的在于其从实践论的角度将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辩证统一起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③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理性和价值辩证统一的视角。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分析中，内涵着价值批判，而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批判中也不是没有边界的，而是以理性为基础。现代社会发展中这两个维度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在资本主义时代，如果一味地只注重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不顾历史主体的境域，使其处于一种"极端退化的境地。"④ 那对经济的发展是极端不利的。因为财富毕竟是由历史主体来创造的，历史主体不能得到发展，必定会从根本上制约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一味地强调历史主体的地位，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伦理批判，则社会发展又会回到历史的起点。

正是马克思的这一社会发展思想，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实践的重视，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有意识的调整，使得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保持在一个必要的张力的限度之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0.

但是，只要资本存在，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就会有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政权体系内，这一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马克思在分析保障工人500立方英尺的空间的工厂法立法时论述道："既然工厂法通过它的各种强制性规定间接地加速了较小的工场向工厂的转化，从而间接地侵害了较小的资本家的所有权，并确保了大资本家的垄断权，那么，法律关于工场中的每个工人应占有必要空间的强制规定，就会一下子直接剥夺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家！就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也就是说，会破坏大小资本通过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和消费而实现自行增殖。因此，工厂立法在500立方英尺的空间面前碰壁了。卫生机关、工业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都一再强调500立方英尺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说不可能强迫资本接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实际上就宣布，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①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调整不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也就是不会动摇资本的统治地位，那么现代社会发展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矛盾便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矛盾才会得到解决，其带来的是社会的真正和谐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研究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指导，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也是寻求一种发展的价值维度转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范式转换是有本质区别的（其核心区别体现在对资本的态度：社会主义国家将资本作为发展的手段，而资本主义国家将资本作为发展的目的）。其次，从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对中国的科技－分工－大工业的发展进行审视，将对发展中的一些分歧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对西方发展理论新范式的审视

新发展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发展难题进行了深层的分析，并试图寻求破解之道。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是否解决了现代社会发展难题？其与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别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得对西方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研究进行审视和回应变得十分迫切。

1. 对新发展观的审视

西方新发展观的确是关照人－文化－价值的，佩鲁和森等都认识到了现代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55.

会发展应该从研究经济的增长转向为研究人－文化－价值的提升，由研究商品世界本身转向为研究人与商品的关系。因为文化价值的进步是发展的根本要素，表现为二：第一，人的价值的实现程度是发展的评价标准；第二，人的价值的实现也是发展的动力。马克思的价值论也包含着这两个层面的意蕴，但是马克思的价值论与西方新发展观的价值论是有根本区别的。与之对话成为一个迫切而有意义的问题。

况且，挑战性的话语已经出现，如佩鲁认为，“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除了一种关心被剥削者及其集团的社会哲学所作的杰出而具有刺激性的抨击外，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思想对于发展理论和分析很少有贡献”①；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由于忽视现代工业生产本身的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的区别，导致他对现代大工业条例下如何实现人类自由这一问题缺乏必要的敏感性。”②

这使得对西方新发展观的回应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下面就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出发，从“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解决人与社会问题的方法”以及“发展的价值诉求”等层面对西方新发展观进行审视。

第一，对“人的本质”的观点的审视。

西方新发展观将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体去进行直观。比如佩鲁在其发展理论中考察人的生活水平时，提出了最低生活方面的标准。他对“生活标准”进行了详细的结构化的细分并认为如此就能“把我们带入发展过程的现实之中，也就是说，把我们带入客体（产品）与人类的关系之中。”③ 而森在解决人的饥饿问题时，也是从其所谓的“可行能力”的角度，来考察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达到物的可行能力，其就不会挨饿。所以，佩鲁和森等在考察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时，都是把人作为孤立的个体来看待的，都认为解决好一个个孤立的人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贫困与饥荒问题。

然而，某个人是否能达到最低的生活标准，以及是否能避免挨饿，不是进行孤立的考察就能解决的。这需要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关系去进行考察才能寻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正是马克思考察人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 所以，马克思认为，作为我们考察问题前提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

---

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9.

②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M］.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c Blackwell, 1987：340.

③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5.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 这是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和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在考察起点上的不同。西方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往往从抽象的直观的角度考察人，将人看成是孤立的。而马克思认为人是具体的，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生成的特定的人。考察起点的不同决定了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和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在理论品质上的巨大差异。

第二，对“社会的本质”的观点的审视。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体。以孤立的抽象的人为前提对社会进行考察，必然会认为社会的本质是孤立的人组合而成的群体。这是包括新发展观等西方理论的一贯的观点。

而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的，认为：“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创新着——现存的关系。”② 社会发端于处于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的需要。正是个人的需要，使他们相互间结合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创新着这种关系。而这种需要都是由特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所以社会发展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是由具体的人，进而由具体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马克思清晰地论述道：“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③

所以，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的实践生成性，决定了社会的实践生成性。社会是由处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人结合成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的社会本质观和西方抽象的社会本质观的重大理论差异。

第三，对“解决人与社会问题的方法”的审视。

人和社会的实践生成性，决定了马克思解决人和社会问题方法的独特性。西方学者在破解社会问题时，往往从人性的角度来着手，其致思路径是由人而及社会；而马克思破解社会问题时，往往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入手，其致思路径是由社会而及人。

现代社会的发展难题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不同步。资源在代际和代内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在代内的不合理分配主要体现为贫富差距，在代际的不合理分配主要体现为环境的恶化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

西方学者所做出的解决发展难题的努力——所有权研究和指标设计（从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51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体的角度出发解决人与社会的问题）都是空洞的，都是在资本的逻辑框架之内所做出来的。在这一框架之下所做出的努力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此问题的解答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深层经济关系去进行审视，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理论旨趣的指引之下，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深处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角度出发解决人与社会的问题），找到了造成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分离的根本动因——资本的逻辑。资本的消灭是解决发展两个维度分离困境的唯一出路。因为，只要有资本的存在，就会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会出现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靠劳动者“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劳动者“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①

第四，对“发展的价值诉求”的审视。

要分析由于资本关系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发展的不平衡，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来进行分析研究。马克思正是通过其剥削理论，揭开了资本的逻辑，进而揭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经济关系，为现代社会发展难题找到了真正的症结之所在。

佩鲁和森等都抓住了现代社会发展由重视经济增长范式到重视文化－价值－人的进步的范式转换这一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但是在方法论上，他们没有上升到实践论的高度，没有把握这一发展范式转换的科学方法论，从而容易将现代社会发展研究的价值转向进行机械化的理解。西方学者一直将发展中的理性与价值的冲突问题进行一种直观的理解。认为两者很难协调，除新发展观外，西方的其他经济学家们也无法找到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② 其实，经济增长和文化－价值－人的进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翼，这两者辩证统一于具体的现代社会发展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③ 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而文化－价值－人的进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并受到具体社会发展实践的制约，交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但同时这两者之间要保持必要的张力。当投资不旺，人们的物质需求极大，资源丰富时，发展的理性维度就凸显出来。二战结束后，物质财富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增长，物质的丰裕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成为发展的中心，各个国家开始谋求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发展。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6.

② Okun, Arther M. Equality and Efficiency［M］. Washington: The Big Tradeoff, 1975: 2.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是，当物质产品丰富，贫富差距加大、资源开始枯竭，发展的价值维度就会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都是在实践中，在理性与价值保持张力的发展中而逐渐生成的。西方学者所追求的抽象的价值实现，看似是为了全人类，其实是具有阶级性的，其价值的实现是资本的价值实现，而不是整个人类的价值实现。

2.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异化理论的审视

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科技发展“异化力量论”，是建立在资本关系发育极度成熟以及社会发展中价值问题凸显的基础上的。

从出现资本主义国家以来，资本由于处于统治地位而无限制地寻求其意志的实现，这带来了资本和劳动关系的高度紧张，使得劳动对资本的反抗一浪高过一浪。而且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剥削，造成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这对资本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全面的障碍，甚至引发了经济危机，这两个原因使资本在对待其与劳动的关系时，会经常做出一些调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受到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影响，资本在寻求和劳动的握手。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资本在本质上对劳动的剥削关系。

这一剥削特性是资本的内在属性，因为“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①] 资本代表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垄断权，这种垄断权必定会带来剥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的固有的剥削属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关于劳资关系的调整都不可能是消灭资本，而只能是保障资本。由于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决定作用，使得科技发展只能按照资本的意志来运行。资本意志的过度彰显，必定会带来科技对人的异化。

另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物质基础雄厚，价值理念缺失，社会发展的价值问题凸显。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在西方国家却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经济的畸形发展主要表现为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而忽视质的优化。与此同时，由于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贫富差距等，以至危及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西方社会理性层面的过度发育，使得社会发展的价值问题暴露出来。很多西方有影响的思想家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思，对社会中的理性的过度发育进行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2.

判。而理性的根本原则来自于科学技术，这使得科学技术成为被批判的焦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异化理论的批判方法，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实践是具有两个维度的，单纯从主体的维度——异化的角度对社会发展进行批判显然是不全面的。异化方法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在本文中已经进行了论说，在此不再赘述。

（二）问题破解：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对社会发展本质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发展”一直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理解为商品世界本身的丰富，循此信念所进行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原有的发展观念缺乏对人的关照。发展实践急需新的发展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发展研究完成了转向：由重视“经济增长”（商品本身）到重视“人的价值”（人与商品的关系）的转向。发展的价值转向在中国的表现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蕴涵着丰富的价值维度思想。对其进行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论式的解读和反思是正确理解和执行科学发展观的必要路径。

1.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维度特质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维度特质，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论内容和“实践论”的价值实现方法论上。

第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维度内容。

价值问题在发展中凸显有两个原因——评价性原因和实效性原因，即人的价值的实现程度是发展的评价标准；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发展的动力。科学发展观也内涵着这两层意思。“坚持以人为本，要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① 在关于“以人为本”的表述中内涵着两个方面的意思：“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言说的是发展的评价性因素，“发展依靠人民”言说的是发展的实效性因素。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所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意思保障了中国的发展由重经济增长到重视人－文化－价值的进步的范式转换的全面展开。

“发展为了人民”言说的是发展的评价性因素，用人民的价值实现的程度来评价发展的结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一切决策，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22.

平上。”① 政府的表述中，其价值评价性是一目了然的。

“以人为本”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其提出才具有了制度上的可能性。“以人为本”不是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而是哲学价值论的概念，其关注的是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哲学史上，“人本”是和“物本”、“神本”相对的。文艺复兴时，提出人本思想是相对于神本思想而言的，将人的尊严还给人，但这种对人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理性的尊重。文艺复兴后，推翻了神的僭越，人们开始痴迷于自己的能力，在科技的支撑下，人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创造，遮掩了人们的视线，工具理性趁机泛滥开来。但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② 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物质世界越是发展，人越是贬值，资本自身的发展逻辑是见物不见人的，人被物所役。在私有制出现以来的阶级社会，发展的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一直不能真正地融合，主要体现在历史的发展是以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资本的逻辑必然限制人的逻辑展开。只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使得以人为本的发展变得具有了现实性。

“发展依靠人民”言说的是发展的实效性因素，即发展的动力。“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③ 这一表述清晰地表达了发展的实效性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民群众。马克思认为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既是价值主体，同时也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在生产实践中，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④ 所以，历史是人民群众自身的发展史，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群众队伍必将逐步扩大。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力量在于其不仅揭示出了发展的目的（评价性因素），而且揭示出了发展的主体，也就是发展的动力（实效性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是互相分离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才是统一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才是重合为一的。

---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22～2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24.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发展的终极价值诉求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价值诉求必须构建和谐社会，因为和谐社会是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所以说，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人的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都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二，“实践论”：科学发展观价值实现方法论。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范式的价值论转向。为了实现“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举措，比如“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② 再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各方面的发展相适应，各个发展环节相协调。”③

这些表述可以概括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其是马克思实践论在发展现实中的外在反映。从根本上说，发展问题解决的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又依赖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在发展中的价值实现是通过实践逐步生成的。实践有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发展的价值论转向就是实践的主体向度转向。对于这一转向必须站在实践的高度才能把握住。实践论是科学发展观价值实现的方法论。在本文的前面提到过实践体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人按照规律改造环境（自然），当然这种改造也体现了人的目的，同时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成果又增强了人的创造力，使人在新的起点上来完成对自然社会的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是有能动性的。主体的能动性就表现在改造客体的方法的选择上，其在当前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发展的“全面协调”式展开。

“全面”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促进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协调”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全面协调”式展开使主体改造客体和客体满足主体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立统一于“革命的实践”④。这是发展在现实中的最佳展开方式，正是这一方式保证了发展的物质增长的尺度（理性维度）和人－文化－价值进步的尺度（价值维度）从长期的分离状态统一了起来，从而保证发展的成果真正地为全体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30.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33.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民所享有，保证了发展中人的价值的实现。

2.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维度反思

从上文的分析中能够得出结论：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及其实现方法都全面体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要求，但同时我们要重视一个问题：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实现必须注意其实践生成性，才能避免乌托邦式的断想，从而走上一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一，“和谐社会”反思：经济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的现实性。

实现人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价值论式的理解之上，否则容易进入乌托邦式的迷梦。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创新着——现存的关系。”② 社会发端于处于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的需要。正是个人的需要，使他们相互间结合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创新着这种关系。而这种需要都是由特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所以社会发展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是由具体的人，进而由具体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马克思清晰地论述道：“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③

正是一定的生产交往方式生成着一定的人，建立在特定的生产交往方式之上的人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受当时具体的生产状况决定的。绝对的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别的绝对消灭，其建立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另一个是私有制的消除。

这两个条件的满足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并不是说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51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

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国社会当前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以追求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价值理想，就是在现实中以和谐社会的六条价值判断标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来消除上述不和谐现象的现实的运动的过程。如此，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解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从而使我们远离乌托邦式的价值迷梦，开辟出一条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之路。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反思：社会发展价值诉求的现实性。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实践中的逐渐生成的过程，不是一个空洞的价值诉求。它是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追求的目标，马克思在其中学作文中就论述道：为人类谋幸福是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围绕着这一主题马克思开始了自己一生的理论探索。在其理论探索的前期，马克思一直诉诸于“异化”理论来寻求人的解放。马克思试图将人从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中解放出来。但是随着马克思对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的参与，他逐渐认识到，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无法找到人的解放的途径。人是现实中的人，是从事生产实践的经验中的人，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规定性是发展的。马克思将其探索人的解放的目标诉诸于实践，从而找到了科学的人的解放的路径。人是实践，是生产交往的产物。而私有制存在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人们会在已有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寻求自己的解放，这种解放会带来生产力的进一步的发展，历史发展的理性和价值尺度在这种辩证的统一中不断地进行下去，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所以，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而人的现实发展状况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状况的视角。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人的依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物的依赖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②

在第二个阶段，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是没有发展权的。马克思曾经论述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而到现在为止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是有限的生产力；靠这种生产力进行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发展只在下述情况下成为可能，即：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①

所以如果生产力有限，大部分人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发展是有产者的特权。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发展是处于由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剥夺剥夺者，建立了公有制经济，这就有了绝大部分人能够得到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生产力发展有限，私有制还有存在的必要，这样就决定了有些人的发展是要受到限制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得到发展，这就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提出了要求。而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表达了政府在诉求人的发展方面的执政自觉。我党在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中论述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这种执政自觉对于人的发展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根据本文的研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的实现必须要建立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之上。

第三，发展的范式转换反思：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价值转向的全面启动，但按照本文的分析，在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

当然我们将发展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并不是说对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同等重视。而是要根据具体的社会发展实践进行具体的发展范式选择。当社会财富匮乏，发展的理性问题就是发展的主要问题，此时的一系列发展政策就应该凸显发展的理性色彩，比如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等。与此相关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就是 GDP 等。而当社会财富开始充盈，贫富差距问题和能源枯竭问题开始显现时，发展的价值问题就成为发展的主要问题。此时的一系列发展政策就应该凸显发展的价值色彩，比如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强调“发展的成果要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强调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强调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6.

与此相关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就是绿色 GDP 和社会和谐 GDP 等。

所以发展的价值论转向，并不是只重视发展的价值问题，而不重视发展的理性问题。根据本文前面对马克思实践两个维度，特别是发展实践两个维度的分析，我们从学理上能够认清：发展中的两个维度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合理张力。所以，我们在理解发展范式的转换这一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辩证地理解，因为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是对立统一的。

第三章
经济危机的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2007年4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威胁到实体经济，世界上多个国家的经济出现负增长，从金融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多家知名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申请破产保护，证券市场剧烈波动，许多国家的经济面临困难，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在各个国家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的同时，人们不仅在关心危机的发展及其影响，考虑如何应对危机，把损失减少到最低，更在思考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试图找出彻底解决危机的正确措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我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也因而会经常性地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时刻关注国际经济危机发生发展的情况，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思想为基础，不断深化我们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建立经济危机的预警机制，在危机来临时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一、经济危机的表现、新特点及西方政府的应对措施

（一）经济危机及其表现

在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这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顽症，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能彻底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威胁。

在经济危机来临时，经济突然出现猛烈下降的趋势，市场从繁荣转向萧条。

市场上商品严重滞销，卖不出去，甚至成批地被毁掉，企业利润大量减少。实体经济遭遇严重的冲击，企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生产，急剧下降。企业得不到订单，减产停工。工厂、商店甚至银行纷纷破产倒闭。企业被迫大规模裁员，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员工实际工资下降，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陷入极端困苦状态。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现金奇缺，流动性不足，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行情猛跌。社会生产力和产品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

从历史上看，历次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都对实体经济形成极大的伤害，对社会生活造成沉重的打击。1873 年的危机是在马克思生前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开始于 5 月 9 日维也纳的债券交易，在 24 小时内股票急剧贬值；随之而来的是信用全面瘫痪和有价证券交易中止。源于维也纳交易所的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欧洲各国停止对美国的资本输出，导致美国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9 月 18 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在这次危机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了打击或影响，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外，还有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以及日本、阿根廷、印度等国家。

1929 年开始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1929 年 10 月 29 日，美国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这一天，美国位于华尔街的纽约交易所崩溃了，道琼斯指数从顶巅跌向深渊，一些主要企业的股票价格缩减甚至超过 2/3。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共有 300 亿美元的财富消失，这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在随后持续 4 年的萧条中，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损失了 90% 的财富。随着证券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也随之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一连串可怕的连锁反应随之发生：居民疯狂地涌向银行挤兑，超过 1 万家银行破产倒闭，大量工厂关门，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居民的生活极度贫困。与此同时，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在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这次持续四年的大萧条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为吃、穿、住的挣扎。

爆发于 2007 年 4 月的美国次贷危机，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危机发生后，对各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多家金融机构

出现巨额亏损甚至倒闭，证券市场剧烈波动。随着美国经济的萧条，美国的工人、工厂、超市、银行借贷等生产要素和资源都很无奈地被闲置起来。一向崇尚超前消费的美国人也学会了节俭的生活，零售商店的销售额持续减少，工厂的订单减少，旅游盈利降低，通信业、航空业、货运业、居民借贷业等的营业额持续下降，世界银行一再调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伴随着油价大幅上涨，通胀加剧，信贷紧缩，全球经济也陷入衰退，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危机。随着各国政府联合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情况在2009年有所好转，但许多学者仍然认为这次危机将持续3年左右的时间，不排除经济再次探底的可能性。

（二）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经济危机的表象有所不同。生产下降和失业激增，是战前与战后经济危机的共同的主要标志。战前与战后不同之处，主要是在货币、金融危机方面。在战前的危机中，一般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利率上升，银行挤兑并大批倒闭；而在战后的危机中，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采取膨胀政策以及其他原因，从1957—195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期间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反常现象。主要表现是：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物价居高不下，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宣布破产等。

从总体和实质上讲，当代经济危机和以前的古典经济危机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时间毕竟过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各种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与以往的古典经济危机相比，当代经济危机又有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

首先，危机的程度有所减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方政府采取积极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经济危机从总体上有所缓解。在战后一度出现了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黄金增长时期，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也出现了较为罕见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现象。萨缪尔森甚至一度认为：“在19世纪伤害资本主义的狂烈的经济周期已经被制服，不过它还不是一条哈巴狗。”①

其次，危机周期的长度缩短。自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之后，每隔十年八年就要周期性地重新爆发一次，危机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在大萧条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长达四年的衰退。在战后的危机中，由于政府的相机决策政策，危机周期的长度缩短，并出现了周期进程中阶段交替界限不清的情况。

第三，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相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停滞和大量失业只是发生在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和萧条阶段，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通货紧

①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330.

缩、物价跌落；而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则总是发生在高涨阶段，但在这个阶段里却没有经济停滞和大量失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危机中，“滞”和“胀”是互相排斥的，二者并没有在周期的某一阶段里同时并存。随着战后西方政府采取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现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滞胀的出现束手无策，美国的霸权也一度衰落。

第四，金融危机对整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加强。以往经济危机的爆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对比较大。在实体经济领域表现出大量商品积压，卖不出去，甚至成批地被毁掉，工厂减产停工，生产猛烈下降，工人大批失业等，然后影响到信用和金融领域，即由于生产衰退、工厂倒闭引起信用关系破坏，货币奇缺，流动性紧缩，银行纷纷破产倒闭；而当今经济危机的爆发，却主要发生在信用和金融领域，首先表现为信用和金融危机，即拖欠贷款不能偿还，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巨额贷款不能如期收回，发生严重亏损，资金不能正常周转而破产或濒临破产，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狂跌等，然后影响到生产、销售等实体经济领域，即库存积压，生产缩减，工厂开工不足甚至破产，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等。这次的经济危机就是由美国的住房次级抵押贷款所引起的，由一场金融危机引发为经济危机。

第五，危机的导火线从有效需求不足转为有效需求过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资本主义古典式经济危机，其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即工人大量失业，没有收入，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下降，商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生产萎缩，工厂倒闭，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但在战后，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执行，需求一直处于膨胀的状态。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当代经济危机，其导火线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以至于出现了有效需求“过度”。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的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爆发金融危机，进而波及世界经济发生危机。

（三）西方政府的应对措施

在 1929—1933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中，西方政府面对经济危机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英法美等民主国家采用改革的方式，国家干预经济来摆脱危机，著名的有“罗斯福新政”；德日意等专制国家采用对外侵略的方式，建立法西斯独裁转嫁危机。

针对 1929—1933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凯恩斯提出了治理危机的一揽子手段，主要内容就是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千方百计提高有效需求，人为地使需求赶上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达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均衡。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首先，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大搞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即在穷人买不起、富

人不愿买、私人缺乏消费实力和意愿的情况下，由政府充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角色，大规模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向经济注入强心剂。其次，调整分配格局，刺激消费能力。即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提高向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使用转移支付等手段，促进购买力扩张。第三，鼓励超前消费或透支消费，预借未来消费能力。即通过鼓励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透支购物等形式，让普通劳动者提高当前的消费能力。

迄今为止，最成功解救经济危机的就是“罗斯福新政”。1929 年 10 月 24 日，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大量销毁产品、失业、破产的凄凉景象所代替，整体经济水平倒退二十年。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当选总统后针对当时的实际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称为“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 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

罗斯福通过立法采取非常措施对金融企业进行整顿，振兴工业，调整农业政策，通过美元贬值加强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制定了《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改革了社会不合理的结构，对于普通人的权益实行更多的保护，新政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最终扭转了经济发展态势，恢复了信心。

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管理得到加强，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明显增强。新政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提供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虽然是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但其大胆借鉴社会主义的长处，运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改革的方法解决经济危机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二、西方对经济危机本质的认识及存在的问题

（一）西方学者对经济危机的解释

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经济出现反复波动的情况，在对经济危机进行分析时，也得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观点。这些学者的观点主要从经济周期的时间长短，即周期的类型以及周期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由于不同学者掌握的资料和划分标准不同，他们将经济周期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三种类型，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分别称之为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英国统计学家基钦在1923年发表的《经济因素中周期与趋势》中研究了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通过对物价、利率等数据的分析，提出了经济周期包括大周期和小周期，小周期平均长度为3.5年，大周期包括两个或三个小周期。法国学者朱格拉在1860年发表的《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发生周期》中提出危机是周期波动中的一个阶段，经济中存在一个长度为9～10年的经济周期。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和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都提出了长周期的观点。康德拉季耶夫对美国、英国、法国100多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在1925年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为期50～60年，平均长度为54年的长期波动。库兹涅茨研究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00多年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价格变动的情况，提出主要工业化国家存在长度在15～25年之间，平均长度为2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基钦、朱格拉和康德拉季耶夫的观点进行了综合，提出自18世纪80年代起西方世界经历了三个长周期，每个长周期中包括6个中周期，每个中周期又包括3个短周期。

关于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西方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外因和内因两大类。外因理论用经济制度以外的因素变动解释经济的波动，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太阳黑子或星相；战争、革命和选举；金矿的发现、人口增长率和移民；新大陆和资源的发现；科学上的突破和技术创新。[①] 内因理论则在经济制度内部寻找产生经济周期的机制，认为经济制度内部的货币、投资、消费、心理等因素本身取决于经济状况，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波动。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于1875年提出太阳黑子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由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影响气候的变化，进而影响农业，农业又会影响整个经济。由于太阳黑子大约每隔10年会出现一次，经济周期也是如此。美国经济学家穆尔于1914年提出金星每隔8年会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导致地球的雨量变化，进一步影响农业。政治性周期理论把经济周期性循环归因为政府为了选举所采取的周期性决策。在选举前，为了迎合选民，政府会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而在选举结束后，又不得不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衰退。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科学技术的创新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在科技创新出现以后，会刺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当创新不能持续不断地出现时，经济停滞乃至衰退就不可避免了。熊彼特用创新将西方资本主义分为产业革命时期、蒸汽和钢铁时期以及电气、化学和汽车时期。

---

①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317.

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提出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直接决定了经济的波动，甚至极端地认为经济波动是由于银行体系交替地扩张和紧缩信用造成的。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提出消费的不足导致经济的衰退，认为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和社会的生产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又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公所造成的。投资过度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过多，投资品的发展较消费品发展过快。资本品生产的过度发展促使经济进入繁荣阶段，但投资导致的过剩又促使经济陷入萧条。心理理论认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会影响到经济的波动。在预期较为乐观的时候，投资增加，经济开始出现繁荣；在预期出现悲观的时候，经济开始陷入衰退与萧条。

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他们认为由于心理因素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经常存在消费落后于生产的情况，即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这是由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①。凯恩斯反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者所信奉的无危机和充分就业理论，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危机的态度。他不同意说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失业的存在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或只承认失业只是结构性的，是暂时性的“摩擦失业”。在凯恩斯的著作中，他承认经常性失业的客观存在，认为只要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就已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在他看来，危机和失业会经常出现，充分就业仅仅偶然存在。凯恩斯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解释失业的原因。凯恩斯并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去寻找失业的原因，而是把失业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并进一步归结为心理因素。他认为，“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二者才决定就业量，就业量又决定真实工资水准——并不是颠倒过来。设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所产生之有效需求不足，则实际就业量将小于现行真实工资率之下，所可能有的劳动力供给量，而均衡真实工资率，将大于均衡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②“雇主们决定雇用之劳工数 N，乃定于二者之和（D），即可以预期于社会之消费量 $D1$ 以及可以预期于社会之新投资量 $D2$。D 即以上所称有效需求。”③“因为当我们的所得增加时，消费量增加，但消费量之增加小于所得之增加。解决实际问题之线索，就在这个心理法则上”④。事实上，即使消费与收入增长得同样快，经济危机同样会发生。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试图为价格刚性寻找微观基础，他们运用菜单成本理论等解释了价格保持不变的原因，并以价格刚性为基础论述了经济波动。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周期原因作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各个学派的观点不同，因此至今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09.
②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9～30.
③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8.
④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9.

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并不单纯地用内因或外因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变动。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周期的出现是由于总供给或总需求的移动。[①] 萨缪尔森认为：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是内因和外因的结合推动了经济周期。[②]

（二）西方学者存在的问题

在西方学者对经济危机的论述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例如，西斯蒙第最早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客观必然性，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产物。西斯蒙第认为，资本家为利润拼命扩大生产，但小生产的破产和社会分配不公使广大人民收入不足，收入不足使消费不足，因而一部分产品不能实现而必然产生经济危机。西斯蒙第还提出了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的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末日的来临，资本主义制度将被别的社会制度所代替；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西斯蒙第经济危机理论分析框架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征、后果及解决途径的内容；在分析方法上，西斯蒙第也强调了制度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因素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由于西斯蒙第所处的时代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其经济危机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从西斯蒙第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来看，他继承了西方从亚当·斯密到萨伊的分析方法，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分别获得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从而忽视了不变资本价值。这样一来，西斯蒙第所谓的社会产品实现问题就仅指消费品的实现而没包括生产资料的实现问题。西斯蒙第提出消费先于生产的理论。他认为，人们进行生产只是为了满足其需要，消费引起生产并决定生产，生产创造收入，收入又决定再生产。产品是用收入购买的，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归根到底是商品与收入的交换。在对经济危机的特征的分析上，西斯蒙第坚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永续不断的、永久性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周期性的。他认为因为今年的产品是用去年的收入购买的，只有今年的生产与去年的收入相适应才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下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今年的产品总是超过去年的收入，这就发生了一种永恒的收入不足因而经常存在着过剩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会永远处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中。由于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危机时，他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到小生产去，发展小生产。因为小生产有无比的优越性，不会发生经济危

①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303.

②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319.

机。具体来说，小生产是为消费而生产，这样生产就不是无限的；其产品能就近销售或为人定做，生产者最能了解市场需求状况，就不会发生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小生产者同生产条件不分离，全部劳动产品归自己，他不剥削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小生产能保证每个人的幸福。因此，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得取消大生产，保存小生产，至少要削弱大生产，发展小生产。西斯蒙第的这些观点否定了生产力是最活跃的，不断发展的观点，也难以解决人们的需求不断提高的问题。

凯恩斯也是西方承认经济危机的客观存在，并寻求改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大量关于经济危机是需求不足的论述。需求不足的危机最终以就业不足甚至大规模失业的形式爆发。

凯恩斯敢于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性失业的客观存在，与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相比是很大的进步。他承认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批判了萨伊定律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谬论，承认了物物交换与商品流通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些事实表明，一方面，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已经不再容许回避经济危机的事实，简单地否认已经不再可能使人信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深刻性对西方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凯恩斯接受了马克思对商品流通内在矛盾的分析，并将其吸收到他的危机理论中。尽管凯恩斯不愿意承认他的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但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也提到“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盖塞尔或道格拉斯少校这些不入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① 但是这个“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上，却要比凯恩斯以及所有西方学者更能系统地解释经济危机问题。

三、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观点

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革命活动和研究政治经济学初期就十分重视经济危机问题。恩格斯在 1842 年就发表过关于英国经济危机的《国内危机》一文，着重指出了经济危机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严重后果。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理论阐述，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的，两位革命导师发表于 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使得经济危机的相关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的问世，经济危机理论最终完成，他们对经济危机的实质、产生根源、周期性以及经济危机的后果和意义都作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1.

了精辟的论述。由于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论述，而是将这个问题的阐述分散于《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有关章节中，西方一些经济学者便认为马克思没有创立一种完整连贯的经济危机理论。例如，琼·罗宾逊就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建立关于商业循环或资本主义的长期运动的完整的学说。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采用完整系统的专著形式，但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成熟性。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系统研究，论述了经济危机周期产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特别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实质，马克思阐述得非常深刻，建立了完整的经济周期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1. 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和商品流通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含了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危机形式的萌芽。由于商品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的萌芽，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是从最简单的商品开始的。由于商品中包含着诸多的内在矛盾，如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货币的出现。在对货币的起源进行分析之后，马克思论述了货币的五种职能形式。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就隐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得直接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商品流通。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不同于物物交换，它可以使一个完整交换过程的买和卖实现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分离。“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① 一个人卖了自己的产品并不一定要马上买回自己需要的别人的产品，就可能造成另外的人卖不出自己的产品。由买和卖彼此脱离而形成的潜在的危机，是危机可能性的第一情况。

其次，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以后，商品能够以赊销形式出卖的，购买者可以先不付出货币而得到商品。虽然商品已经转手，但商品的价值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交换的参与者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因此，这里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只是观念上的价值尺度，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人们需要的是实在的货币。一旦有一个或几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这一锁链上一系列债务人也就随之不能履行还债的义务。当大家都要求进行现金支付时，整个支付信用关系遭到破坏，从而进一步增大了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

但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发生以上两种危机的可能性只是潜在的可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3.

性。“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①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才会从可能转变为现实。“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②

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由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在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实现的。由于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发达的商品生产使商品内在矛盾的各种形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展开也只有在商品内在矛盾能够充分展开的地方才能实现。

马克思从两方面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第一，由于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不同步，发生货币信用危机。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人们的交换在很小的范围内就能满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以后，人们的交换范围极大扩展，商品交换的频次和范围都增加了，仅靠原来的物物交换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货币资本开始频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这时，总商品资本和它包含的每一单个商品都要经历由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的转化。因此，只要资本也是商品，那么包含在这一形式中的危机的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了。买和卖的分离在资本主义时期更进一步表现为，一笔资本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另一笔资本就必须相应地从货币形式转换为商品形式。资本运动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一笔资金离开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另一笔资金就必须相应地从流通领域流回到生产领域。由于不同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不断转换，形成相互联系和交叉的状态，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第二，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社会生产的目的，产生的危机的可能性已经具备了更现实的基础。“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增长”。③ 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不顾社会的实际需求，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增加生产规模，但这时市场上还没有这么多的货币供应量，危机会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3.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8.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73.

为资金链的断裂而爆发。例如产业资本家必须支付全部不变资本进行生产，当产品出售给商业资本家时，常常得到的不是现金而是信用工具，如银行汇票。如果商业资本家到期不能履行支付的义务，就会发生普遍性的危机。虽然危机的爆发是各种因素引起的，不能说仅仅因为货币资金出现问题就一定爆发经济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促使了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导致了危机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二）虚拟资本过度扩张是导致经济危机更大规模爆发的原因

在考察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虚拟化的形成原因、本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的过度扩张是导致经济危机以更大规模爆发的原因。马克思指出，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有价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利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利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①

虚拟资本具有独特的运动形式。这种独特性意味着，虚拟资本虽然只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虚拟资本的运动却能独立于现实资本。由于虚拟资本可以在市场中不停地换手，其市场价格可以脱离所代表的现实资本价值而自由地变动。这样，“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②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贪婪本性驱动着虚拟资本的扩张。资本所有者对利润的追逐是天然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法律；若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于是，资本所有者“周期地患有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③。“这时，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可以说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2.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3.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8.

投机的骑士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① 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由于“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②，因而可以“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③，“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④，这些因素都会促使虚拟资本和信用货币的膨胀。虚拟资本和信用货币过度膨胀孕育着货币危机。由于虚拟资本同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买卖分离的风险，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而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更大，因而风险也就更高。马克思这样描述道：“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够同时一起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都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⑤“货币在恐慌时期还是在那里；但每个人都当心不让它转化为借贷资本，即借贷货币；每个人都抓住它不放，以便应付实际的支付需要”。⑥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所谓生产相对过剩，包含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生产相对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二是生产相对于一定价格水平下的需求的过剩，三是生产相对于一定市场规模的过剩，四是生产相对于保存资本价值和增殖资本价值的过剩，或相对于一定利润的过剩。

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既不像亚当·斯密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不像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消费不足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对抗性，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尖锐，也使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这具体表现在两点，一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当这两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使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时，就会出现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3.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8.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6～497.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3.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50.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03.

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发展的界限”。①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即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对劳动者的不断剥削造成的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为资本主义以获得更多剩余价值为生产目的，而这一目的是无限的，资本主义下生产者之间自由竞争，要想压倒对方就要不断扩大生产，获取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使生产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因为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要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主义的竞争导致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造成了劳动者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缩减了他们的收入从而缩减了他们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难以避免，经济危机也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说“整个再生产过程可能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了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停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②。

（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使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1.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机与危机之间的间隔表现了一定的规律性。自 1825 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大约每隔 10 年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1825 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 1836 年、1847 年、1857 年、1866 年、1873 年、1882 年、1890 年和 1900 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基本上都演绎了每隔 10 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的现实。进入 20 世纪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连续爆发了 1907 年、1914 年、1921 年、1929—1933 年、1937—1938 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经济的政策，危机发生的频率相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8.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9.

对不那么规则。

虽然经济危机的发生频率在变化，但并不意味着危机就此会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20世纪最后十年，西方世界曾一度出现黄金发展时期，但经济危机一直没有被彻底消除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①

马克思曾经十分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好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经过一定时期后就会重复发生。由于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经济危机周期地爆发。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在资本主义的每一个经济周期中都包含着四个环节，分别是繁荣、危机、萧条和复苏。"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② 这四个环节中，危机是关键环节，既是一个经济周期的终点，又是另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表现为经济不断走向危机和不断摆脱危机的过程。

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在这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危机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环节出现，然后迅速波及各个部门，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严重混乱。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是上一个经济周期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现象有所缓和，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但过剩商品还未完全销售出去，社会购买力仍然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停滞状态。萧条阶段之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局面，于是，萧条阶段过渡到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价格开始上升，利润渐有回升，从而刺激着资本家增加投资、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进入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在高涨阶段，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繁荣包含了新的危机的先兆。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时，危机必将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一个周期都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不同的阶段。战后的周期虽然发生了某些形态变化，但四个阶段的交替仍然是周期的基础。

2. 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原因

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周期性的原因，一个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7.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37.

是周期长短的原因。

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原因要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一基本矛盾虽然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严重激化之中，而是有时尖锐，有时缓和，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发展的状态。经济危机是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又反过来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暂时强制地缓解这一矛盾。但危机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重新激化起来，使另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正如恩格斯认为，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造成经济危机周期长短的原因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并没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早期，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是没有规律的。当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从手工业阶段进入机器大工业时期。大工业生产还不够发达，固定资本的再生产还没有能够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当时的英国曾经频繁出现过 1788 年、1793 年、1797 年、1803 年、1810 年、1815 年和 1819 年的经济危机，但它们的出现和交替是没有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危机还是一种局部性的或地方性的。在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大机器工业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生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程度时，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危机才逐渐转变为波及一切主要工业部门、震撼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25 年首先在英国爆发的危机，就是最早一次这样的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没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周期的长短主要是由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决定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必然会引起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从而促进生产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就会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生活资料市场，从而促进生活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固定资本的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准备了物质条件。不仅如此，固定资本的更新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生产过剩，为下一次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没有进入垄断阶段以前，大工业时代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本在考虑物质磨损和精神磨损以后，平均大约 10 年就需要实行更新，固定资本的这个平均的生命周期，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个最主要因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了物质基础。

固定资本的更新固然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对危机间隔时间的长短又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也并非永远如此。在 1825 年以后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中，固定资本的更新确实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加强了对市场的干预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

化。决定周期长短的因素，除了固定资本的更新以外，还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可以延缓或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经济危机的表现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用固定资本更新这个单一因素去解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波动。

（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性及其双重影响

1.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历的历次危机中，属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有三次，即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因为这三次危机表现了明显的国际同期性。有的则是属于部分国家同期发生的，如美国在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1969—1970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1987年间都爆发了经济危机。此外，英国1992年，墨西哥1994年，亚洲1997年，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于1998—2000年都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每一次都给这些国家带来重大损失，并影响到更大范围。

1873年经济危机第一次表现出了极具国际传染性的一面，超越了以前的历次危机。这次危机涉及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以及部分非西方国家的农业危机，成为1873年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的运输工具的出现不但大大降低了长途运输的成本，而且缩短了海上运输时间，这就造成大批廉价的农产品不断从美洲、澳洲、亚洲等地运往欧洲和其他地区，从而导致1873年同时爆发具有世界性质的农业危机。不仅如此，危机不但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影响。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非洲内陆和亚洲、拉美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国家已纳入世界市场范围。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商品、金融与贸易相互联系，任何一处发生波动，都会迅速地蔓延开来，因而使危机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性与同期性特征。

马克思从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职能以及国际信用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在国际间的传染机制。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市场上，一国的进口过剩，同时就是另一国的出口过剩，它们都是生产过剩在外贸领域的表现，一旦发生进口过剩或出口过剩，就会出现巨额支付差额，从而产生国际信用中断的危机。马克思说："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① "支付差额和贸易之间平时运用的期限，由于危机而废除或缩短，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结清"。② 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是经济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7.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7.

危机跨国传染或转嫁的媒介。马克思还认为，贸易顺差有助于一国缓和经济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顺差国就不会产生经济危机。他明确指出："出现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①。因此，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无论在国际贸易中是否获利都会受到威胁。

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

马克思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认为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既具有破坏作用，也具有建设作用。他指出，危机不仅意味着再生产过程的矛盾的爆发，还意味着这些矛盾的暂时的、局部的解决。经济危机的建设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危机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另一方面，危机促成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从而为社会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打下物质基础。

在资本主义初期，个人资本占据主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个人资本逐步被股份资本所代替。马克思说："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联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② 股份公司的发展部分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融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③ 在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进一步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产会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特别是在对这种生产或多或少占有垄断地位的国家。但是，在机器等增加以后生产借以进行的基础，——这个基础在经过若干波动后，应当成为新的正常的基础，新的起点，——也由于上一次周转周期中发生的过程而显著扩大了。"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发展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自然力实行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同特点。这种垄断可以增加代表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部分，而相对减少转化为工资的劳动产品部分。只要它发生这样的作用，它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53.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43.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88.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7.

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可是不会创造出超额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正好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因此，如果说一种自然力如瀑布的利用，在这里创造出超额利润，那么，这不可能只是由于一种自然力的利用在这里引起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① 资本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中，不断在内部克服着制度的缺陷。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造就了资本主义的黄金发展时期，也形成了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状况。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制度内部改革的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危机中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转而向社会主义靠拢。如在金融动荡频繁发生的拉美地区，竟然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保持相对的平静。众多拉美国家经济稳步增长，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失业率较低。拉美地区不同于欧美的发展模式，那里涌动的社会主义浪潮，开始引起世人的关注。还在十几年以前，大多数拉美领导人都紧盯着白宫，以为那里藏着摆脱债务危机、发展本国经济的灵丹妙药。美国指导拉美国家进行全面经济改革，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理念。认为只要全力推行经济自由化，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最大限度地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就能万事大吉。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拉美各国普遍实行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等项改革。但拉美国家后来却发现自己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拉美地区的外债，由1991年的4 610亿美元，到2000年的7 405亿美元，增加近一倍。巴西每年还本付息，就需470亿美元。各国相继陷入金融动荡之中，经济出现负增长。被西方媒体称之为“粉红浪潮”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席卷拉美大陆。经过选举，拉美地区有13个国家元首倾向于社会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对于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经济危机一直存在争论，我们长期将经济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之必然产物，社会主义能够完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也呈现出几次大幅的波动。我国出现经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在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我国应该如何面对，都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

1. 社会主义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论述过社会主义是无危机社会，但他们对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25.

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为后人形成社会主义无危机发展的思维定势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剩，是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在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不再会出现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根据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论述，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如果能够避免这些条件的产生，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社会主义虽然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经济仍然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总量增长总是以一定的上下波动偏离稳定均衡轨道，表现为扩张和收缩、高潮和低谷循环交替。经济的周期波动是一种超越制度形式的普遍现象。①

2. 我国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基本制度无关，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具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国际化，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客观条件进一步具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明确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我国目前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已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一个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和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因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按劳分配，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才不会出现经济危机。即使2009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中国却没有发生危机。中国只是受西方危机影响，在外贸方面出口开始下降，引起一些中小企业破产和就业困难。”② 当然，无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存在根本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理论上，它不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也不能排除经济危

① 陈东琪，李茂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548.

② 程恩富“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学术讲座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6/9467109.html

机的可能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经济危机的充要条件更加完备。

（二）正确认识我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也经历了数次波动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与随之而来的调整时期让人们印象深刻，1984—1985、1988、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及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速减缓都印证了中国经济存在波动的情况。当前影响我国的经济波动的因素主要有哪些？是否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呢？

1. 我国依然存在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因素

从西方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看，我们已经基本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中国经济存在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金融体系也不很完善，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

首先，我国的居民消费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持续保持了30年的高增长态势。但从中国经济的增长的贡献来看，其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较弱。消费增长率明显低于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从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从20%上升到40%，而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从80%下降到55%。[①] 世界各国的消费率基本上在70% ~80%之间，而投资率则基本上在20% ~30%之间。[②] 从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来看，投资率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而消费率所占的比重逐渐减小。总的来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在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为4.6%，而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则有8.0%，[③]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是消费的2倍。与此同时，从居民的消费看，制造业零售商品的价格低迷或者下降，而通

① 中国统计年鉴2006［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表3－11.

②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39.

③ 国家统计局：2009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 http：//www. stats. gov. cn/tjfx/jdfx/t20100202_402619049. htm

信、能源、房地产等行业由于政府管制、垄断经营的原因导致价格居高不下甚至一升再升，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其次，中国存在潜在的货币信用危机。我国的金融体系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一直没有真正对外全方位开放，所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国际游资对我国的冲击。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由非正规渠道进入国内的游资数量也是相当的庞大，在2008年证券市场的非正常下跌中就能看到其中的严重后果。中国的资本市场迟早是要对外开放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就很难在国际性经济危机中不受影响。例如在我国的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依然占据着绝对比重。200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40.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①，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总市值只有不到24万亿元。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再融资的总额只有5 000亿元左右，银行贷款依然是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我国银行的呆坏账已经达到了上万亿元，经过10年对银行不良资产的集中处理之后，中国银行业仍然有不良资产大量累积。我国的虚拟资本迅速膨胀，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在2007年首次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但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依旧很不完善。这些都是潜在的货币信用危机的表现。

第三，西方国家的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也不可避免。我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已有30年，一直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等经济组织的活动。在2001年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日益密切。在经济区域一体化方面，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在借助于世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求我国密切关注世界市场供求矛盾的变化，防范国际市场出口过剩危机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在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我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在2008年我国的经济调控政策被迫三度调整，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2008年宏观调控政策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到200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下半年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明确2008年宏观调控政策第二次转向，“一保一控”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国务院提出刺激经济增长十条措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09年净出口对

①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00121_402615506.htm

GDP 的拉动为 -3.9%①。马克思认为："关于进口和出口，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② 西方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冲击绝不能等闲视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难以避免。

2. 正确看待我国经济的波动

我国出现经济波动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由于我们一直处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摸索之中，政府政策的变动及政府行为与经济的波动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速度变化总是伴随着政府相应政策的出台。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的波动在于产品供不应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困扰了国民经济近 40 年。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才开始出现供求平衡。为了达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目的，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就会创造有利于扩张的机制，实行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刺激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扩张热情。工业的快速扩张导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结构失衡，这样就只有采取收缩的政策，降低工业的增长速度以换取农业的增长，从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进入 21 世纪，我国不断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生产过剩开始困扰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生产过剩，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有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危机观点，生产过剩危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市场经济的产物，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又进一步加大了危机发生的概率。这就是说，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着市场经济体制，就存在着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市场过剩出现后，我们也前所未有地遇到了通货紧缩的情况，在我国政府及时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才从亚洲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中走了出来。由于我国长期是以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一直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的增长长期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此外，国际市场的变化也是 21 世纪以来的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制度带来的经济危机，但仍可能存在市场运行的一般性周期。马克思曾指出："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的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③ 这样看来，马克思并没有把周期性波动看成资本

---

① 国家统计局：2009 年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 . http：//www. stats. gov. cn/tjfx/jdfx/t20100202_402619049. htm

② 马克思 . 资本论 . 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

③ 马克思 . 资本论 . 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4 ~ 695.

主义社会特有的周期性危机，而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有一般的周期性扩张与收缩。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危机。即使危机发生了，也只能是社会制度以外的原因造成的。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经济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经济出现适当的波动是完全正常的。对此，我们无需改变社会制度，只要在社会内部通过发展经济，改革体制，完善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等途径就可以得到解决。

（三）我国如何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

我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分析的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于预防经济危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1. 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产品实现问题时提到，社会再生产必须按照客观比例来进行，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否则，就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盲目坚持列宁归纳和发展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工业化道路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忽视了两大部类需要平衡发展的基本思想，导致了我国经济结构长期扭曲。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10年2月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并进一步提出应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握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情况一直左右着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必须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水平，灵活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计划的和行政的手段，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以保证市场供给和总需求不仅在价值量上平衡，而且在结构上能够相互适应，避免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2.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由生产过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与人民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向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努力，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市场疲软现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拉动因素。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的同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发生了重大调整，由

于历史的或体制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人民群众购买力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限制了我国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我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低于投资，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受到需求的约束，并且这种需求约束力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加剧。因此，国家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确保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加快分配制度改革，要从初次分配领域入手，提高劳动者报酬比例，通过减免税费的方式让利于民。还应加快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最为重要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人民群众在生活方面无后顾之忧，国内需求才会持续增长，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才能缓解，社会经济发展才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3. 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合理促进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

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金融发展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但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信用”的拓展，也有可能带来经济危机的发生。近代经济危机往往是由于金融体系率先出现危机，只有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才能合理发挥虚拟经济的作用。我国在1995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现已形成中央银行为领导，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协助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监管也应该进行改变。从单纯的强调安全性转变为寻求安全与效率的均衡，在对金融机构传统业务监管的同时加强对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从注重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由一味强调外部监管向内外监管相结合，更加注重调动和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的积极作用。资本的国际性流动更需要我们同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制定统一的监管措施和监管标准，实现对金融体系的全方位防范。

4. 正确处理好出口和内需的关系，把对外依存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一般来说，商品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一国经济的发展不能过度依赖本国产品的出口。一般来说，对外依存度越高，说明该国的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越强。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容易受到国际上各种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影响，有损于国家的经济安全。随着改革和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的对外依存度也随之提高。然而，如何判断对外依存度的高低，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从国际上来看，在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他们的国内资源比较贫乏和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战略基本上依赖国外，因而对外依存度都比较高，一般都在70%以上。在发达国家中，国内消费水平普遍较高，对外依存度不是太高。如果资源相对贫乏，如日本，则对外依存度一般属于中等水平，大体上保持在50%上下。如果国内的资源丰富，比如美国，对外依存度较低，一般保持在

20% 的点位上。目前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基本上处于 50% 的水平，和其他国家相比不能算高，处于中等水平。而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将随之而逐渐下降。在 2020 年前，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基本上保持在 40% ~50% 的水平是较为合理的。

第四章
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分配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发展的过程，形成了现阶段“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高速增长，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收入不断提高，分配制度的效率已经显现。但是，在现阶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收入分配中仍然存在着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违规非法收入增加、收入分配起点不公等现象，这使得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凸显。很多人由此对我国的分配制度产生困惑。怎样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合理的？在中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分配制度应该坚持效率优先，还是公平至上？马克思力求社会公平并按照社会发展阶段而划分的三种分配原则给我们提供了应当和不应当的宏观分配尺度：不公平的按资分配、体现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统一的“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按劳分配、最高公平层次的按需分配。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里经常用到的两个范畴，其含义非常广泛。在收入分配这个特定的领域中，基本上可以用这两个范畴来描述收入分配的状况。

（一）效率的含义

广义效率的含义表现在三个方面：生产之前要素的配置、生产之中要素的使用，以及生产之后要素报酬的分配和由此决定的消费。前两个方面是通常意义上

的效率概念，指人们对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分配，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即效率是指资源最合理的配置，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指投入产出的比例，比例越高，效率越高；反之，效率越低。后一个方面的效率概念和收入分配有关，有两层意思：一是分配行为本身的效率，涉及分配的具体方式方法；二是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分配的过程或结果能否促进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能否促进人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在分析我国的分配理论时，应该从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即市场效率这个含义来分析问题。

（二）公平的含义

相对于效率，公平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公平的含义也更加丰富，分类的方法也很多。公平本是伦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人民对既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认识和评价，其原则和标准因时代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内容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有人认为，从哲学的角度讲，公平是指正义、平等和公正，它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有人将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还有人把公平分为经济公平、社会公平和政治公平。联系到收入分配，一般认为分配公平是分配结果的公平。当然，分配结果的公平是研究收入分配公平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仅仅从这个方面研究，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公平应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初次分配的公平，又称为市场公平。它包括起点的公平和过程的公平，侧重于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消除各种特权和歧视。并以此作为判别行为合理与否的标准以及制定规章制度的依据，从而为人们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二是再次分配公平，也叫社会公平。它表现为结果的公平，侧重于分配结果的均等化。在目前看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不是完全的平均分配，而是有一定差距的平均化。

（三）效率和公平：欣喜与困惑

第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效率已经显现[①]。众所周知，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我国在收入分配上一直趋向于平均分配。这种分配方式使得劳动者收入均等并且低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自 1978 年开始，我国从农村到城市，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分配制度的改革。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的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计资料显示，从 2002 年到 2008 年，我国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均已突破 10 万亿元大关，2008 年更是突破 30 万亿

① 根据前面有关效率的含义，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分析我国分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元大关。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年均8%左右。[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能长时期、稳定地保持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同时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也逐步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由过去的温饱生活阶段提高到了当前的总体小康生活阶段。这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尤其是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可以说，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效率已经显现出来了。

第二，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凸显。首先，我国收入分配的起点不公平。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这可能会导致收入分配起点不公平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分配情况是劳动力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较低，要想获得较高收入，主要靠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但我国人民在资产、教育、管理各种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非常不平等，这样就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其次，收入分配的过程不公平。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间，很多的规章法律制度不是很完善，这就导致很多人在分配的过程中钻法律空子，获取违规非法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这更加重了起点的不公平。最后，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公平。对于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程度问题，有效的测度工具就是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在图4－1的正方形中横轴 OH 表示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分组）的累积百分比，纵轴 OM 表示收入的累积百分比，弧线 OL 为洛伦茨曲线。如果社会总财富完全平均地分配于所有家庭，那么洛伦茨曲线就是对角线 OL，OL 被称作绝对平均线，因为这样的洛伦茨曲线代表所有的家庭都得到完全相同的收入。这时，从收入分配的结果来看，是绝对公平的。另一个极端，是完全不平等的洛伦茨曲线 OHL，因为这一折线表示一个家庭拥有所有的社会财富，而其他的家庭都一无所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既不是完全不平等，也不是完全平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相应的洛伦茨曲线，既不是折线 OHL，也不是45°线 OL，而是像图中这样向横轴突出的弧线 OL，尽管突出的程度有所不同。

为了使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更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经济学领域又引入了另外一个指标——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如图4－1所示，将洛伦茨曲线与45°斜线之间的部分 A 叫做“不平等面积”，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洛伦茨曲线成为折线 OHL，OHL 与45°斜线之间的面积 $A+B$ 叫做“完全不平等面积”。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之比，即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 $G=A/(A+B)$。显然，基尼系数不会大于1，也不会小于0。

下面利用基尼系数来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程度。从图4－2中可看出，从1988年到1998年这11年之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波折上升的。其中

① 数据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2－12－08/1812833850.html；http://newsletter.caixun.com/000004ff/362/0000cabv.s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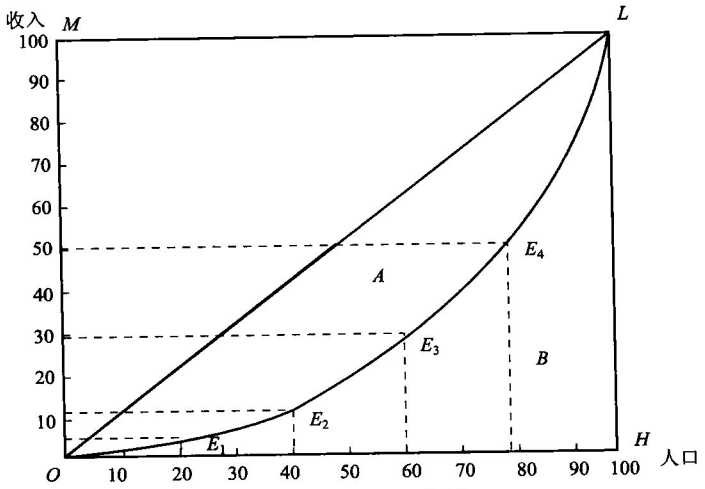

图 4－1　洛伦茨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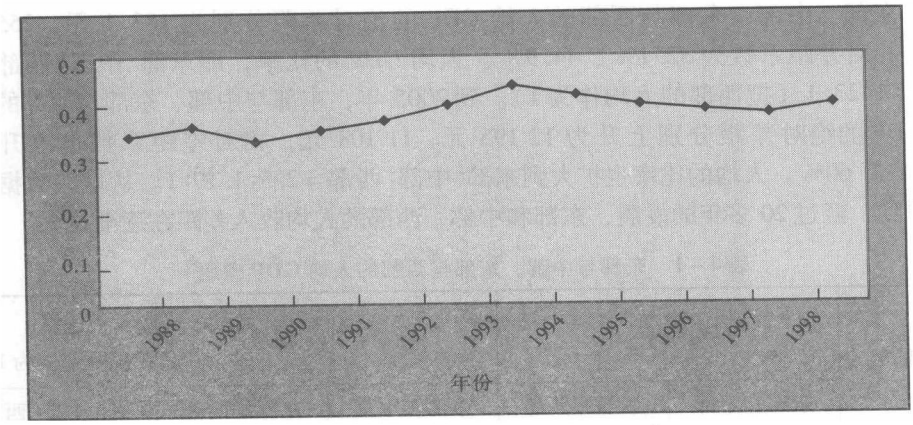

图 4－2　1988—1998 年中国基尼系数

1994、1995 年上升到一个较高的程度，说明这个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拉大，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在较高的水平。

到了 21 世纪，我国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速，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根据联合国 2004 年报告，我国 2001 年的基尼系数为 0.447。根据世界银行 2005 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 12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85 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根据中国社科院 2005 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 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 0.465，2005 年逼近 0.47。这是我国国内的数据，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53～0.54。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 0.2 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 之间表示“相对平均”；

0.3～0.4 之间表示“比较合理”；0.4～0.5 之间表示“差距偏大”；0.5 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同时，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为 0.4 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虽然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这种数量界限只能用作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能成为禁锢和教条。但是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虽然我国居民在整体上收入增加，可社会成员中分配的非均等程度也在扩大，并且这种不均等目前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当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与国际接轨进入小康或富裕型社会的同时，我国的下岗工人、民办教师、弱势群体以及西部农村还极为贫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人们在分配领域中事实上的贫富不均。

具体来看，我国收入分配中结果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区域收入差异。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而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直接决定了该地区的收入水平。在中国，地域差异最大的现实就是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从人均来看，如表 4－1 所示，1980 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人均 GDP 的绝对差距分别为 183.1 元、255.4 元，相对差距系数为 32.1%、44.9%。人均 GDP 的比率，即东部∶中部∶西部 = 1.81∶1.23∶1（把西部的人均作为 1）。到 2005 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人均 GDP 的绝对差距分别上升为 12 195 元、11 108 元，相对差距系数也上升到 52.3%、60%。人均的比率也扩大到东部∶中部∶西部 = 2.5∶1.19∶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东部和中部、西部的人均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

表 4－1　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人均 GDP 差距①

年份	绝对差距/元		相对差距系数/%		比率（把西部作为 1）
	东部和中部	东部和西部	东部和中部	东部和西部	东部∶中部∶西部
1980	183.1	255.4	32.1	44.9	1.81∶1.23∶1
1985	281	411	28.6	41.8	1.72∶1.23∶1
1990	695	881	35.5	45.1	1.81∶1.17∶1
1995	3 114	3 897	4.4	56.8	2.32∶1.26∶1
2000	5 352	6 647	47.2	58.6	2.42∶1.28∶1
2005	12 195	11 108	52.3	60	2.5∶1.19∶1

注：绝对差距是按当年的价格来计算；
相对差距系数 =（东部 － 中部/西部）/东部 ×100%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2006.

二是行业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2005年，行业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从458元扩大到32 249元，扩大了约70倍。1992—2005年期间，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以年均150.9%的速度增大，而同期职工平均工资的增幅却为44.4%，[①] 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快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在各行业中，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一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高收入行业群体，其职工平均工资基本保持在前5位。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制造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从来就没有高出过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属于低收入行业群体，其职工平均工资基本上排在最后。虽然行业的特点不同以及人们的劳动付出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存在本身不可避免。但当行业收入差距突破一定的合理度，而且这种差距不完全符合公平原则时，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就弊大于利了。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效率突出，公平问题重重，导致很多人对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产生困惑。困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困惑，当前的分配制度为什么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所倡导的公平呢？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力求社会公平的，并且往往这种分配公平被看成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所以，按照马克思的分配制度或者发展的马克思的分配制度来进行收入分配，社会主义中国不应该出现收入分配的悬殊。但是，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于是，很多人在大呼“不公平”之后开始困惑，当前的分配制度为什么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所倡导的公平呢？我国当前的分配制度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传承？它是否适合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当前分配制度中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和以前资本主义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有什么区别？二是对分配制度中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困惑。效率优先还是公平至上？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不高。这和当初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差别太大，大家一听到社会主义就和“穷”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分配制度也应以效率优先为标准，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还有人认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没有起到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目的，反而会妨碍我国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并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公平性。所以，现在的分配制度应该体现公平至上。

这些困惑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再加上实际生活中分配不公问题，已经开始抑制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阻碍我国的经济增长，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

① 魏军．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二、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不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配理论，而且还包括列宁和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分配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分配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配理论内容非常丰富。总的来看，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关于分配理论的总原则，包括分配的内涵，决定分配的条件，分配与生产、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分配与物质利益的关系，等等；二是对资本主义分配的揭示，主要是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分配方式；三是对未来社会分配原则的构想，又可以分成对未来社会第一阶段的构想即按劳分配，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即按需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配理论是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批判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分配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如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否定，认为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等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也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圣西门和傅里叶的“按能力计报酬”分配的思想。恩格斯认为：“他们的经济学说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公社的每个社员分得的产品，首先是以他的工作量，其次是以他所表现的才能决定的。”①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要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②。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不同社会的考察和研究，按社会发展阶段，提出了分配阶段的三分法。它们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是按资分配；在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即中国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是“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按劳分配”③；而“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论按资分配，还是按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7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37～638.

③ 这里没有直接写“按劳分配”一词，是因为该提法并非由马克思首次提出，而是后来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总结出来的。

④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

分配以及按需分配都是符合分配总原则的。

1. 生产方式决定分配关系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总原则

如果把分配仅仅理解为产品的分配，而不和生产联系起来，马克思认为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① 生产工具的分配，② 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①] 马克思还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②]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工具的分配，其实就是生产要素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它是生产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他说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所以，马克思的这些话充分体现了分配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称。所以说，一方面，社会的分配关系是由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其实，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另外一种表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运动体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的发展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则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一个社会的分配关系由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这是符合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的。

另一方面，分配关系由生产关系决定，特别是由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关系来决定。就此，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③] 这里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其实就是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情况。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

在生产的具体运行中，马克思还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来分析生产对分配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其中，直接的生产过程是再生产过程的起点，起决定作用。这个决定作用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分配的对象、交换的对象、消费的对象，只能是生产的结果。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才能分配什么，分配多少，才能交换什么，交换多少，才能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但是，分配、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3～3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97.

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

换和消费也不是单纯被决定的消极因素，而是会反作用于生产。若前面三者适应后者，则促进后者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的发展。

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总原则、总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所有社会的分配方式，都是从这个总原则出发的。按资分配、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总原则。例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时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①

2.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实质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上的。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也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如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就提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由劳动决定的思想，并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后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没有区分劳动的二重性，从而不能指出到底是哪种劳动创造了价值。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创立了全新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使用价值是指物品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人的体力和劳力的耗费，即常说的"活劳动"。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所谓劳动的二重性，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从一个方面看是具体劳动，即具有特定性质、目的和形式的劳动，它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活劳动和抽象劳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马克思指出，"价值的增加无非是物化劳动的增加，但是，只有通过活劳动，才能保存和增加物化劳动。"② 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即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活劳动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脑力和体力的耗费，物化劳动又称死劳动，是凝结在物品中，体现为劳动产品的人类劳动。物化劳动只是借助于活动转移其价值，而不能实现价值增值。当然，马克思也肯定了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

成的！）的源泉。”①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又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新创价值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分配。马克思认为，价值的增值即剩余价值的产生的前提条件是要购买到一种特殊的产品，这种特殊的产品能生产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特殊的产品就是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一方面有人身自由，一方面又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比较特殊。它的价值被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包括三个部分：① 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② 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③ 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包含了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劳动者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构成是有变化的，因此，其价值也是不断变化的。这里的劳动力的价值，其实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分配的工资。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则更具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剩余价值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进行生产劳动的能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是能凝结在商品中形成价值的。所以，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能生产出大于自身价值（工资）的价值。于是，马克思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生产工人自己的工资；另一部分为剩余时间，生产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或土地所有者占有。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工人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所以，马克思说：“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部分，他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②

学术界有人将此称为马克思的按资分配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也有人称之为马克思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分配方式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根本不是工人劳动的全部报酬。而这种不公平的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分配不公的情况，马克思设计了一个理想的模型，即未来社会的按劳分配理论。

---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92.

3. 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分配理论的设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晚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在该书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在坚持生产力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具有五大特征，分别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而其中按劳分配是主要特征之一。在该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按劳分配做了明确的设计。

第一，按劳动量领取报酬。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按什么进行分配？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应当是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来分配，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这也是建立在他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既然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就是按劳分配，具体来说就是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来分配，即“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①] 这个劳动时间，不是劳动者的个别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当然，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为什么要按劳分配呢？这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哪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做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们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们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们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存储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②]

第二，分配的对象是经过扣除的社会总产品。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什么进行分配，即分配的对象是什么，是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总产品吗？是新创造的价值吗？拉萨尔曾提出，社会主义社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6.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

会的分配应当是“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①] 马克思深刻地批评了这个观点，提出，由于要进行扩大在生产，再加上一些公共需要，所以，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对象不是全部的社会总产品，而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即社会总产品做了若干扣除之后的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成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分配。”[②]

马克思所说的扣除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可以认为是积累的扣除，通过这类扣除，社会总产品就分成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这类扣除包括三类：“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③]

另一类可以认为是公共需要的扣除，通过这类扣除，消费基金可以分为公共消费基金和个人消费基金。它也包括三类：“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褊狭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④]

第三，按劳分配以表面的平等掩盖事实的不平等。

从按劳分配的原则看，它是平等的。劳动者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从社会领取报酬，多劳所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⑤] 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表面的平等。因为，首先每个人的禀赋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劳动能力强，有的人劳动能力弱，所以他们从社会分配的个人消费品可能就不一样。其次，即使禀赋一样，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负担也不一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5.
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
④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
⑤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

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①

从马克思按劳分配的理论可以看出，实行按劳分配的方式需要很多前提条件。

首先，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适合未来社会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社会主义阶段，在马克思的设想里和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阶段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人类社会在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将会出现自我否定的趋势。当这个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时，人类社会就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社会主义将在西欧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即我们常说的“同时革命论”。如恩格斯曾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即至少在英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它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也是和后面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有关联的。

其次，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为未来社会设计的理想模式是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状态的分析分不开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公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导致的，正是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导致了劳动者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谋生，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要解决这种分配不公，只能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入手解决。所以未来社会应该是，除了劳动力以外，所有的其他生产要素为整个社会所占有，即单一的公有制。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自己的按劳分配理论里设置了一个前提，即全社会范围内的公有制，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这样就保证了每个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均等性，从而消除了人们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参与分配的经济基础。于是，“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

按照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联合劳动者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① 于是，每个人在社会总产品中的贡献只能由其劳动本身决定。如果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物质没有极大丰富，则依据劳动贡献大小来分配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

再次，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要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每个生产者不需要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不需要将自己的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因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② 所以，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里，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利用“劳动券”来实现产品的直接分配，社会经济体制将是计划经济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手稿中指出：“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③

最后，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实现，要求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即要求消除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消灭剥削，劳动者也成为所有者，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是在这些前提下提出的，所以，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方式时，一定要注意这些前提是否满足，否则可能会出现扭曲按劳分配理论的结果。

4. 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理论

未来社会的高级阶段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也消失了，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已经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分配方式和前一阶段不同，实行的是按需分配。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 按需分配，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94.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7.
④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

不平等分配，并且也消除了按劳分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最高公平状态的分配方式。

从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按资分配到按劳分配再到按需分配，分配的公平性是增加的。也可以据此推断，马克思是在追求分配公平的。最开始的按资分配，马克思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①] 所以，人民大众不得不忍受自己创造出来的价值被别人占有的事实。按劳分配比按资分配前进了一大步，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达到我们第一个层次的公平的含义了，即存在初次分配的公平。但事实上仍然有一些不平等，马克思也为这个事实上的不平等做出了一些努力，如他所说的由于公共需要的一些扣除，可以认为是在再分配中弥补这种不平等。但是这种弥补是一定程度上的，不可能完全弥补。所以，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社会，设计了最高级别平等的分配模式——按需分配。按需分配不仅完成了第一个层次的公平的含义，也完成了第二个层次的公平的含义。

所以，马克思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实质在于突出分配的公平性，包括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这也说明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里，公平是最后的归宿。当然，在他那里，已经没有效率的问题了，所以也不存在效率和公平之争。这个思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他后来的继承者。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比较教条式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理论，忽视了该理论的前提条件，过多地把眼光放在公平上，而没有注意到效率问题，以至于把按劳分配变成了低水平的平均分配。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分配理论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理论上对未来社会的分配制度做了一个设想的话，列宁和斯大林则是在现实中实践了按劳分配制度。1917 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在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呢？是实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按劳分配制度，还是其他的分配制度呢？列宁和斯大林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按劳分配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形成了他们的分配思想。

列宁的分配思想是和前苏联的命运紧密联系的。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前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前，列宁对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进行了勇敢的实践和大胆的探索，提出了很多积极的思想。列宁认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②] 可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

见，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来社会初级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社会，将其分配思想直接称为“按劳分配”，这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发展。列宁还把“按劳分配”解释为：“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不劳者不得食。”“不劳者不得食”是列宁针对当时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时，在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为了使剥削者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列宁提出了“不劳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这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创新。列宁指出：“‘不劳者不得食’，这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懂得的。这是一切工人，一切贫农以至中农，一切渡过贫苦生涯的人，一切靠工资生活过的人都同意的。十分之九的俄国居民赞成这个真理。这个简单的，十分简单和明显不过的真理，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①

第二个阶段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喘口气，1918年，帝国主义开始对苏联进行围剿，国内也爆发动乱。为了维护新生的政权，苏联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于战时粮食的极度缺乏，列宁的分配思想也转变成了“按需分配、平均分配”。1918年，列宁在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要求：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新生政权平定国内外的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列宁也曾一度设想一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分配政策。但是，战争结束之后，矛盾很快就出来了。按需分配所需的物质财富远远不够，平均分配导致农民和工人没有生产积极性，刚刚平定的动乱又开始了。列宁开始反思：“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用‘设想’也许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② 为了提高积极性，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了新经济政策。1921年，列宁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用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所以要“改行新经济政策”，要实行商品交换，进而发展商业企业，对国营企业进行出租。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分配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按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进行分配的工资制度。根据“最小的劳动领取最低的工资”的原则，实行“计件工资制”。在农村，变“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农民在交给国家一定的税收之后，可以自己支配剩余的粮食。“计件工资制”和“粮食税”打破了平均分

①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79～580.

② 列宁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76.

配的格局，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苏联的经济开始好转起来。

此外，列宁还非常注意利用物质利益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他认为："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① 后来邓小平肯定并继承了列宁的这个思想。此外，他还主张专家高薪制，主张实行奖励，等等。

列宁去世后，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在苏联建成了以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在分配理论方面，斯大林基本是按照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来实施的，但也有一些发展。一是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他说："在阶级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时候，在劳动还没有从生存手段变成人们的第一需要，变成为社会谋福利的自愿劳动的时候，人们将按自己的劳动来领取工作报酬，'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公式。"② 二是斯大林提出人们的劳动报酬是以他们投入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标准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有劳动的义务，人们所得的劳动报酬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投入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标准，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工资这个范畴，并且工资是有区别的。

列宁和斯大林的分配理论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前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和斯大林在具体实施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具体的实际情况，所以他们对按劳分配的理论进行了一些发展。但是他们（特别是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教条地理解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基本全部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来建设苏联的社会主义，全体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是证明。因此，他们在按劳分配的理论上，也没有太多地跳出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框架。他们仅仅关注了马克思的公平目标，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公平目标的前提。然而，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前提和苏联的实际是不相同的，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基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而苏联的生产力不发达。在一个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匹配较高的生产关系，为后来的经济建设埋下了隐患。

（三）毛泽东、邓小平及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分配理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建设？

①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98.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04.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只能从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实践中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分配理论。

1. 毛泽东的分配思想：从按劳分配到平均主义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虽然晚年在中国基本上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但他对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还是有发展的。毛泽东的分配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开始还是较好地坚持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的。他说：“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① 在1961年9月16日试行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中规定“工人、技术人员、一般职员的劳动报酬的多少，应当按照本人技术业务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不应当按照其他标准。”②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一方面是反对在当时的中国实行按需分配的，另一方面，他也提出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确定报酬，这是典型的按劳分配的思想。同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还建立了一系列的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还进行了全国性的工资改革，这有效地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毛泽东强调在分配中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原则，适当处理税收、积累和个人收入的关系。这可以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一大发展。他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渐增加个人收入。”③

第三，毛泽东在分配中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主张大体平均的相对平均主义。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观点。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规定：“生产队对于社员的劳动，应当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④“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绝无所谓绝对的平均。”⑤ 同时，毛泽东又坚持大体平均的相对平均主义。认为在中国没有一点平均主义是不行的，要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606.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60.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1.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99～400.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

尽量缩小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思想也可认为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均”的问题比“贫”的问题更重要。所以毛泽东立足中国的国情，提出了相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这样一方面能使劳动者的收入拉开一定的差距，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差距又不至于过大。

从毛泽东分配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他最初的分配思想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发展，在公平的前提下，保证一定的效率。但后来毛泽东的分配思想开始在“均”上面做文章，开始逐渐转向平均主义。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毛泽东的平均分配思想开始付诸于实践。取消计件工资和奖金，在城市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等级工资制度，在农村实性工分制。这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农村的工分制基本上是以劳动时间来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这必然会产生“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大家一起耗时间。这不仅损坏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且社会的竞争机制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可以说是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城市的等级工资制度，不能反映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2. 邓小平对按劳分配理论的发展：先富与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分配政策主要是平均分配。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的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人民生活并不富裕。邓小平对当时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指导下，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分配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

第一，分配制度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于分配方式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不重视，这导致了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制度时的教条化和模式化，在分配中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使我国生产力严重落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根本没有办法体现出来。邓小平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首先强调，在认识和发展我们国家的问题时，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他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① 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就要使社会主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而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在联系分配制度时，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① 后来，邓小平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可见，在邓小平的理论里，生产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当然其分配理论也不例外。

提出分配制度一定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观点，对于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分配理论就是没有贯彻这个观点，才导致了平均分配，导致了国家的贫穷。其实，这个观点我们应该也不陌生。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生产关系又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分配制度一定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其实就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总原则“生产方式决定分配关系”的另外一种表述。可见，邓小平的分配理论在原则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原则符合的。同时，邓小平的这个观点，为我国后来“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奠定了强大的理论依据。

第二，真正理解和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邓小平认为，以前中国也说是按劳分配，但其实是对按劳分配的误解，在实际中表现的是平均分配主义。这种分配方式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取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② 现在就要打破平均主义，让人们在物质利益上有所差别，因为物质利益的差别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③ “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④ 那么怎么贯彻按劳分配的制度呢？邓小平认为，应该废除以前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模式，应该实行奖罚制度。“要实行考核制度，……今后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的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跳级，不合格的就不提。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于干得好的干的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⑤

第三，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8.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5.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0～31.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6.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2.

最核心的分配思想，一般被称为邓小平的“富民思想”。

首先，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标。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进行设想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肯定要比资本主义富裕。对此观点，邓小平是赞同的。他说：“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①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② “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是发展生产力，一是共同富裕。”③ “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④ “总之，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⑤ 这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是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标的。

其次，共同富裕如何实现的问题。邓小平认为，虽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这个共同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和平均富裕。由于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当时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这一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结果的道路。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的富裕起来。”⑥ “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⑦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⑧ 此后，邓小平还在很多场合论述了这个问题。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的。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劳动者个人禀赋和家庭负担的不同，使得分配的结果会在事实上存在一些不平等。邓小平的先富政策正是让一些诚实勤劳、守法经营的个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5.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2.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111.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2.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2.

并不是目标，目标是共同富裕。所以先富起来的个人和地区应该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个人，实现共同富裕。

再次，其他分配方式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同时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对马克思分配思想的创新除了他的“富民”思想外，应该就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作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了。在这之前，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有发展和创新，但基本都是在如何理解按劳分配和怎样按劳分配的框架里发展。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制经济的出现，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这个分配理论包含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思想的萌芽。

当然，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允许其他的分配方式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在实际生活中会带来一定的收入差距。很多人由此反对邓小平的分配政策。对此，邓小平有充分的认识。他指出：“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避免两极分化。”① 他还提出了很多实践中的方法，如政府征税、转移支付等。邓小平说：“对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② 所以，邓小平在一开始就注意到利用国家的再分配来体现公平。

邓小平的分配理论，特别是先富和共同富裕理论正确处理了当时中国存在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也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和主张。首先，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分配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平均主义，经济的根本面貌是共同贫穷。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收入差别具有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于是明确提出了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分配政策，并且首先在农村实践。1977 年，农村开始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迅速推开。事实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归自己”的分配方式适合中国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有资料显示，在1977—1984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①] 这应该绝大部分归功于农村分配制度的改革。其次，邓小平先富起来的政策还体现了初次分配的公平。先富起来的人都是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在同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的结果。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财富的方法是禁止的。最后，先富带动后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及利用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则体现了公平性。

3.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分配理论：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随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和分配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收入分配情况也出现了以前没有的一些特征。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进行了较大的创新与发展。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分配制度的创新应从十四大算起。在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大上，我国分配制度被阐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从这个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十三大一没有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说法，二是没有说明有哪些补充的分配方式，三是也没有指出邓小平分配思想所体现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十三大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分配理论的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1992年，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四大在分配理论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提出了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从这个创新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的分配制度既要实现效率，同时要缩小改革初期的收入差距，实现公平。1993年，我党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提出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分配制度的创新有两点：一是多种分配方式的地位提高，从以前的补充变成了并存，这说明其他的分配方式开始在我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的原则，这说明这一时期我国分配制度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任务。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

① 孙居涛．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J］．经济评论，1999（2）．

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该分配理论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并且指出了具体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其次，提出了要鼓励而不是允许生产要素参与收入的分配。

2002 年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这次会议提出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创新。这就说明哪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重要，对生产社会财富的贡献大，谁获得的收入分配就多。以前的分配制度也提按生产要素分配，但到底怎么分配，没有说明。其次，这里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上升为“原则”，并且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并列提出，也是一种创新。它既肯定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也肯定了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它们的地位是同等的。2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我党的分配制度主要突出在对公平的强调上，提出要更加注重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还提出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可见，此时的分配政策开始把目光更多地转向公平，并且这个公平不仅仅是结果公平，还包括过程公平。

十七大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可见，十七大已经将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从原则上升为制度。同时，十七大就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来讲，延续了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政策，即更加关注公平。初次分配要注意过程公平，再次分配要注意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分配制度可以描述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对于分配政策，可以有以下理解：

第一，应正确理解我国现行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分配制度里处于主体地位，这也是我国现行分配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继承。

但是，由于我国的具体情况和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很多前提条件不一样，导致我国的按劳分配又呈现出了中国特色。首先，按劳分配不是全社会唯一的分配方式，这是非常清楚的。其次，按劳分配不是直接由社会实施，劳动者的劳动不是直接成为社会劳动，而是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也就是说，劳动者为企业生产产品，企业把产品成功出售，劳动者的私人劳动才变成社会劳动，劳动者才可以领取劳动报酬。最后，按劳分配还必须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即企业用货币来发工资，劳动者再用工资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劳动者的收入可能会受到市场、货币的影响。

第二，生产要素应该参与分配。生产要素是指进入生产过程，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现在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资金、技术、管理等。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体现，就是生产要素根据其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来分配收入。在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还没有达到马克思设想的除了劳动力之外，其他的生产要素全部是公有制的状态。目前生产要素还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这些所有者会按照市场的信号提供生产要素，要素的使用者向所有者支付费用。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其实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第三，分配的数量问题。明确可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是一个质的问题，那么每种生产要素分配多少呢？这是一个量的问题。或者说，按什么来对生产要素分配呢？我国当前的分配制度明确指出：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因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过程所发挥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客观地决定了要素参与收入的分配也应有差别，所以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应该是按其贡献的大小分配。要素的贡献是指要素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做的贡献，即为社会提供了多少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或服务。由于当前我国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所以最终生产要素的贡献由市场决定。

三、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为正确理解我国分配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很多人的困惑首先来自于理论上认识的不足。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高度认识当代中国分配制度并提升几个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1. 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公平观

根据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总原则，分配关系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也就是说，一国的收入分配方式或分配制度是由该国的生产关系，进而由该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这是总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公平观，即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性由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当收入分配制度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认为这种收入分配制度是公平的；反之，当收入分配制度超越或者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则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实行的“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可以发现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公平观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实行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但我国的发展情况却和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不一样。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我国还没有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我国也还没有成为“自由人联合体”。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教条地看待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其他的分配制度。采取什么样的分配制度，要根据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水平和由此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状况来决定。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发展不高且不平衡，所以，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结构上，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在分配上，我们也应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让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公有制中，实行按劳分配，在其他的所有制结构中，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是一种能适应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度，因此是公平的、合理的。

2. *按劳分配体现了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认为，按劳分配就是按照每个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所以，无论是以“劳动券”形式来按劳分配，还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按劳分配，它都是能体现效率的。这是因为，首先，以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收入，可在一定程度内拉开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其次，由于个人收入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决定，而劳动数量和质量又和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科学知识水平相联系，这样，劳动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就会努力提高劳动技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样又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同时，按劳分配又能体现公平，这主要是过程公平和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按照每个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收入，这是非常合理和公平的，多提供收入就高，少提供收入就低。另外，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获得的收入，差距不会太大，所以又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因此，我国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所获得的收入是能体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的。但是，我国现在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和按其他生产要素比较起来，按劳分配中劳动者只是获得工资，获得一个仅仅能维持自己生活的费用，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很低。这不利于实现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也不符合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并列的地位。所以，可以通过对按劳分配劳动对象的创新，来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从理论逻辑看，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的分配原则，应当

是在共同的对象上用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由于按资分配的对象是利润，因而，按劳分配的对象，不能只是生活资料，而是也要把利润作为自己的分配对象。所以，劳动者既要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补偿收入即工资、奖金、津贴等，还要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即通过年薪等参与 M 的分配。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是不存在的。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基础，是全部的生产资料都是公有制，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管理并使用劳动者创造财富中的社会（即利润）部分，所以，如果要求劳动者也参与分配属于社会的那一部分利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多种经济成分，有多种生产要素和劳动一起参与生产。所以，在多种所有制存在的情况下，利润已经不能再全部为国家所有，而要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我们提出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在整个新创价值即 $V+M$ 中的比重。劳动者不仅能分配到 V，还能和其他的生产要素一起参与利润 M 的分配。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分配制度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

3.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对马克思按劳分配制度的发展

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与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制度是有一些差别的。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是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实施按劳分配应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而这些前提在我国现阶段都没有实现。

但是，这些差别并不能否定我国现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是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发展，也不能否定它们之间的兼容性。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制度，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的合理内核。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即生产条件的分配方式决定产品的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①] 马克思这里的生产条件，其实就是生产要素。在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里，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即所有的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由政府代为管理。因此，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里，不会出现不同的生产要素归属不同所有人的情况，因为全部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是国家的。只有一种生产要素是归属于不同所有人的，这种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所以马克思指出，应该按照不同劳动者在劳动中提供的劳动力来分配收入，也就是按照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但是，现在我国的生产资料不是全部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所以，就出现了不同的要素归属于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的情况。因此，根据前面的分析，当要素主体只拥有劳动力时，就按劳动力的贡献大小分配收入。那么，现在要素主体除了拥有劳动力之外，还拥有资本、技术、管理等生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

产要素时，就应该按这些要素的贡献大小分配收入。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收入的制度是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发展，二者是有兼容性的，只不过后者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而前者有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多种生产要素。

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理论的发展，按要素贡献分配也体现了我国分配制度的效率和公平。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社会财富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出来的。由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每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贡献的大小，理所当然应在交换和分配过程中得到实现。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其实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体现。所有者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生产者使用了这种生产要素，就要向所有者支付使用费用。因此，市场经济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市场运行过程，较为准确地测定出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并同时确定各要素的分配份额，从而为按贡献分配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由市场决定各生产要素的收益率，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原则，实际上是肯定了劳动生产要素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同时，按要素贡献分配可以调动拥有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将他们的要素投入生产过程中以获得较高收入，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效率性。

当然，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其分配方式是指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拿走了由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马克思据此称它为“剥削”的分配方式。在我国当前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的总量在不断增加；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权制度变迁也有可能使劳动者本人拥有一定的非劳动生产要素，这样，劳动者一方面能获得工资，另一方面还可以按自己所拥有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分配收入。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在我国的分配中，仍然存在着所谓的“资本剥削劳动”的现象；但是，这些非劳动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很可能归属于同一个所有者，他是自己在“剥削”自己。因此，这种“剥削”是一种抽象剥削，它并没有过多地妨碍分配的公平。即使由于马太效应会使他最终拥有大量非生产要素，在现实中则表现为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公的经济现象。然而，作为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支付等经济手段来减缓这种不公平的程度。

4. 再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对立通过制度安排解决

在分配中要达到效率，就是要通过分配制度，促进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个人收入，促使国家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在分配中要达到公平就是要保证分配起点公平、分配过程公平、分配结果公平。效率和公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过程中，其对立统一性的表现不同。最高层次的效率和公平

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非常关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很有效率，但缺乏公平，所以，他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理论。按劳分配可以认为是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按需分配则是最高层次的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分配制度，基本是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分配方式。为改变这种情况，改革开放之后，首先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接着又提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的分配政策，十七大则表述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政策。那么，效率和公平究竟如何去取舍呢？其实在问“效率优先？公平至上？”这个问题时，就已经将二者对立起来了。效率和公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它们的对立统一性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对立性表现强烈，此时，分配制度只能在二者中有所倾斜。如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此时突出效率就要舍弃一定的公平，突出公平就要舍弃一定的效率。我国当时是选择了效率优先。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效率和公平高度统一，也没有选择的问题了。目前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所以对于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可以在不同的层次去考察，从而体现它们的一致性。即初次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是一致的，再次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也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对立的成分。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主要是指分配过程公平，各要素主体公平竞争，按要素贡献分配收入。所以，在初次分配中有效率就有公平，二者是一致的。对再次分配，一方面要解决起点公平，另一方面要解决结果公平，而这都需要国家的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制度很好地体现了效率和公平在这两个层次的一致性。各生产要素在市场价格的指引下，参与生产过程，然后按照其对生产的贡献大小分配收入。贡献大，收入就多，贡献小，收入就少，体现了过程公平，也是有效率的。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庞大的宏观调控为再次分配的效率和公平提供了保障。

（二）积极完善我国分配制度，实现分配公平

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为我国分配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又促进我们在实践中改进措施，更好地实现我国分配制度中的公平。

1. 构建我国分配制度三位一体的理想模式，实现分配制度的效率和公平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需分配的三位一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需分配共存。这里讲的按需分配，就是马克思讲的几种扣除，可以认为是为了实行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扣除，如公共产品的提供等。这些要按需分配，而不能按劳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体现分配

中的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按生产要素分配主要体现效率，按需分配主要体现公平。这样，在我国的分配制度中，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就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2. 在初次分配中杜绝违规非法收入，大力提高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保证初次分配公平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针对我国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诸多不公平的现象。第一，存在大量的违规非法收入，这种收入是一种不公平的收入，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并且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对社会稳定形成严重威胁。为了保证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应该坚决杜绝这种现象，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加大对发现的违规非法收入的惩罚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初次分配的权利。第二，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过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和长期以来工资收入水平偏低因素的影响，初次分配仍然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而长期劳动报酬率的偏低会带来很多不良影响。

在初次分配中大力提高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这需要政府和劳动者共同来完成。政府一方面要大力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完善工资增长机制，直接提高劳动力的报酬；另一方面还需要在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上有所作为。既然劳动力是和其他生产要素一起按贡献分配，所以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培训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大小。所以，政府应该扩大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同时要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提高对教育的投入，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这样一来就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贡献，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主要是提高自身素质，形成人力资本。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靠劳动者自己来完成，通过提高素质，形成人力资本，就可以在收入的分配中占据更大的比重。在初次分配中大力提高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的第二种方式是增加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现阶段的情况表明，先富起来的劳动者很少是通过工资积累起来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其他的财产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获得的。所以，提高劳动者工资是一种提高其收入的办法，但可能非常缓慢，但通过提高财产性收入就可以很快达到目标。

3. 利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实现再分配的公平

初次分配领域注重效率和过程公平，必然会带来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再分配是提高结果公平的重要手段，马克思其实也提到了再分配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中，他提到了两种扣除，第二种扣除，其实就是国家为了再分配而进行的扣除。邓小平也说：“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

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①

政府的再分配手段很多，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最基本的再分配手段，其目的有二：将高收入者的收入压低，将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以缩小分配差距，提高结果公平。

第一，改革现行税收制度，缩小结果不公平的程度。

首先，完善税制，变分类所得税制为综合所得税制。我国个人所得税从1994年开征至今，都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便于源泉扣缴，不易偷漏税。但是社会经济生活错综复杂，个人收入的来源也有很大差异，分类所得税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很难符合量能负担原则。综合所得税制有很多优点，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如它要求将纳税人的全部所得汇总，然后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这是比较公平的。但这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征管水平。为了更好地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从分类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转变是很有必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完善技术和征管水平。

其次，完善税种，增加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利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作用有限，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财产的私有化程度已有所提高，财产税的税源增加，税基扩大，所以无论从完善税制、增加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还是从与国际接轨等各方面考虑，我国都应及时地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开征遗产税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关于税制模式的选择。考虑到我国继承人可自行分割交接财产、公民的纳税意识短期内无法提高以及征管水平相对落后等实际情况，我国宜采用总遗产税制，即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征收遗产税，这样有利于税源的控管。其二，关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配合模式。基于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宜采用分设两税，并行征收的方式，即对生前赠与财产课征赠与税，对财产所有者死后遗留的财产课征遗产税。这样可防止纳税人生前大量转移财产而逃税，从而充分发挥赠与税对遗产税的补充作用。最后，关于税率的设计。从国际上来看，遗产税的税率有累进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形式。实行累进税率有利于遗产税收入再分配目的的实现，比较公平，而单一比例税率则便于税收征管。我国遗产税开征的主要目的是对收入分配进行重新调整，因而应选择累进税率方式。同时应注意不论以遗产继承方式还是以赠与方式转移财产，其所负担的税收大致平衡，赠与税的税率安排不应低于遗产税的税率。

再次，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在费用扣除方面应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具体情况。当前个人所得税的申报以个人为主的做法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收入越单一的人缴税越多；其次同样收入的纳税人，其负担不同，如赡养人口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就业等情况不同，而费用扣除额相同。这样一来，以税收调节社会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的作用难以充分体现。所以，为更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3.

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在课征制度上，应改个人征收为家庭综合征收，这样才能起到缩小差距的作用。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再分配的公平。

首先，从中国城乡二元状况的实际出发建立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在实施步骤上尊重国情，区分轻重缓急，由近及远梯度推进。由于未来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我们无法在短期内建立城乡保障水平划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过高的保障水平会加重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负担，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必须同时尊重城镇的传统保障水平高于农村的现实，实施循序渐进的原则，合理调整城乡保障水平，完善城乡保障水平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与新型的、综合性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点，主要保障的是贫困人群与弱势群体。社会救济制度要做到体系完整，经济救济与服务救济并重，不存在漏洞。在城市要继续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在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应完善医疗保险救助制度，避免居民因患病而影响正常生活。在农村要以完善五保户、残疾人员、无劳动能力人员、长期患病人员等生活困难人员为重点的农村居民救济制度。

第五章
人自然而诗意地生存的问题怎么办
——马克思休闲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的人类社会，科学技术日益昌明，物质财富急速增长，但是人类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人们在不断享受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又遭遇着精神文明的失落，人们已经或正在从科学技术中获得利益，却离自己的精神家园越来越远，人们一方面在享受高科技所带来的舒适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变本加厉地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而所有这一切必将导致对人的存在的威胁。人们不禁一遍遍地自问反省——什么才是人类所最终追求的？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才是自然、美丽、诗意的？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才是最符合人性而舒展的？实际上这些追问一直伴随人类的成长，只不过现如今的追问似乎更为迫切与现实。知识经济的出现表明人类正面临一个重大的转型期，这一转型所涉及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文化、精神等诸领域，能否智慧地回应转型期的这些古老追问将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面对这些追问，一个轻松美丽的词汇逐渐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休闲。

一、问题的缘起

拥有闲暇是人类古老的梦想。早在1 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休闲”是一种“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absence of the necessity of being occupied）的状态”①。并且将休闲与人生的种种美好价值，诸如快乐、幸福、美德与安宁等结合在一起。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也不乏丰富的休闲理念和休闲旨趣。单从词源学的角度而言，“休”指“人倚木而休”，在树荫下休息，其最早的意思是“吉庆”“美善”“福禄”，如《诗·商颂·长发》中

① ［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6.

释“休”为吉庆。“何天之休”，郑玄笺：“休，美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以礼承天之休。”杜预注：“休，福禄也。”“闲”的本义是栅栏、范围，后来又与“閒”字相通，同为空闲之意。今天我们将休、闲两字连用，从词源义而言，当指人的一种美好、吉祥、富足的生存状态。就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考察，儒家的“曾点之乐”、道家的“逍遥游”、佛家的“林下风流”、理学家的“浑然天成”与“无人而不自得”，都将休闲与审美作为人的生活品质的理想境界。中国古人这种对休闲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在含义上基本一致，都是以“休”喻“美”，指追求美德、享受美感的一种生活状态。古老的休闲梦想原本就是人类生活的目的，人类对休闲生活的向往与实践一直伴随人类历史文明发展进程的始终。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说，休闲是上帝赠予人类的礼物，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份礼物的拥有，只是由于后来要解决物质生活资料问题，人类的生产性思维才占据主导意识而被忽视。如今，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人类的休闲性思维才再次凸显出来。休闲已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对休闲问题的相关研究也提升到了学术层面加以考察并形成了一定体系。换言之，也只有当休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休闲问题才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在我国，“休闲”一词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一位学者将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最流行的新词总结出了52个，“休闲”名列其中。从1995年起，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1999年又实施春节、“五一”、“十一”3个7天长假日，全年节假日休息时间从7天增加到10天，加上周末双休日，全年假日时间已达114天，人们一年可以有1/3的休假期，从此，中国人开始走进了“休闲时代”。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纲要中，第一次写进了居民的闲暇问题，并明确提出要推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合理调整居民工作和闲暇时间。人们的休闲意识逐渐增强，休闲支出随着工资的增长也在逐渐增加，休闲产业、休闲经济蓬勃发展。长期承受着工作负担和社会竞争压力的人们需要在工作之余使身心得到解放、放松心情、回归自然。看电视、上网、购物、旅游、听音乐、健身、学习……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最先进的休闲场所、休闲条件，休闲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内容。

那么，人们因此而越来越休闲吗？我们是否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休闲？似乎不尽然。休闲虽然已经走入了人们的生活，但在现实的休闲活动中，相当多的公众对休闲的理解与认识还比较肤浅，或者把休闲仅仅等同于简单的娱乐，或者把休闲等同于物质消费。物质财富在增加，但人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更多的幸福与愉悦，对物质占有的欲望使人们的生活更复杂、忙碌、身心俱疲，牺牲了休闲的机会，失去了内心的平和。本来休闲是人享受生活的权利，休闲应该体现为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对人的满足，让现代人在工作之余感受到生活的意义。然而，在消

费享乐主义支配下的所谓“休闲”被异化成为某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人类作为生活目的而追求的休闲，被商品、金钱、物质所绑架，最终沦为了一种“商品”。这些对休闲认识的误区极有可能导致精神生活的无聊和空虚，财富在增加，空闲时间在增多，但人并没有因此而更像“人”，相反，却再次被物所奴役，成为物化的人，“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运用自身内在的动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他才具有真正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是占有，使用而没有存在，他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就会退化为物”①。这种对物质的追逐既远离了人生的真谛，也远离了休闲的真谛，人们很难将休闲同人的生命质量、生存方式联系起来，更谈不上休闲可以促进精神文化的建设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全面地认识休闲呢？

二、何谓休闲

休闲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真正把休闲问题上升到学术层面加以系统、全面考察，则是近一百年的事情。特别是在西方学术界，休闲一直是讨论得极为热烈的问题，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特点出发纷纷发表了对休闲的不同理解，如社会学家把休闲理解为一种时间的利用方式；心理学家把休闲看做是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一种精神状态；哲学家则主要考察休闲的哲学本质，认为休闲是一种自由的生存状态、一种生活的态度或方式；经济学家则从经济活动的角度出发，把休闲看做是一种时间的非生产性消费。② 大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休闲理论研究开始了其初步发展阶段，进入90年代末，休闲研究逐步深入，研究领域逐渐从理论研究蔓延到实证研究，包括休闲经济、休闲旅游、休闲消费与行为研究、休闲文化研究等。在休闲研究的逐步深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两类思想资源时常跃入视野，它们作为休闲理论的源头活水不断地为该项研究注入养分：一个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思想所蕴含的古老的生命智慧。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与品味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这两朵奇葩时，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休闲问题的研究和理解，并从本质上揭示休闲的理论价值和对现实将产生的影响。

（一）马克思的休闲思想

严格来说，在马克思的思想著作中我们很少看到休闲两字，人们一般也很难将这个看似轻松的问题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沉重批判和对社会历史的深邃思考联系起来。但若追寻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我们又不难发现马克思对

① 弗洛姆．生命之爱［M］．罗原，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7.

② 卿前龙．什么是休闲？——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休闲的理解［J］．国外社会科学，2006（4）.

休闲问题的真知灼见以及表现在字里行间的对休闲生活的积极追求。

1. 休闲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人性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人的理想生存社会？围绕这些问题，马克思思索着、实践着……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① 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有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性活动，还应有在此活动之外的休闲性活动。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并且是自觉的，这将人的类生活与动物的类存在根本区别开来。我们发现，在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和类生活的深刻洞察中就蕴涵着不可或缺的休闲真谛：休闲的本质特征应该是人的自由而自觉的活动，追求休闲、享受休闲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首先就是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性活动。劳动生产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② 同样，物质生活条件也是人们能否休闲的最基础性因素，任何脱离物质条件去谈休闲的都可谓是空中楼阁，"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③。当人满足生存需要以后，必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这种需要即人们休闲的需要，或者说，这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是休闲的重要内容，所以，休闲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是劳动的继续和延伸。马克思指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设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点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④ 事实上，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自由、为享受、为活得更好而斗争。生产性活动与休闲性活动是辩证统一的，劳动是自由、休闲的基础，自由、休闲是劳动的目的和归宿，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和体现，劳动与休闲是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两个基点，人只有在这两种生命活动中确证自己、肯定自己、发展自己，能够同时主宰自己的劳动和休闲，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休闲活动体现着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对休闲生存方式的追求过程是生成人、丰富人的过程，是人逐渐占有其本质的过程。

2.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休闲思想的内在根据

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为休闲活动创造物质条件。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0.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来说，仅有劳动时间和劳动活动是不够的，因为这将限制和剥夺人的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压缩人的发展空间。人要想获得自由与发展，还必须要赢得充分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自由时间，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非劳动时间”，就是“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它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①。所以，自由时间是相对于劳动时间而存在的，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游离出来的剩余时间、休闲时间。

自由时间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前提基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②“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③ 可见，自由时间的延长，必然会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归根结底，“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都是时间的节约”④。

自由时间也是个人发展自由个性的根本保障，拥有自由时间是休闲必不可少的条件。自由时间能够为人提供自由存在和自由发展的社会空间，人们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⑤ 只有在自由闲暇时间里，人才能超越物质必然性和社会关系的外在强制而成为自由的社会主体，才能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活动，自由地发展多方面的能力和个性。当然，自由时间的增加并不是休闲本质的展开，它只是休闲活动的必要条件和内在根据，休闲的本质应体现在人们在自由时间里的创造性活动，即发展智力、发展自由个性、实现人的潜能等精神性的创造活动，通过一系列自由选择的活动去探索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

3.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休闲思想的最高境界

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斗争实践来看，“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是其奋斗一生的宗旨，“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新世界”的基本构想就是实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0～31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6.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1.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0.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6.

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或称“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②。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具有社会性，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来谈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只能在社会发展中实现，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它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条件构成人的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应该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但又消除了劳动的异化，所有人都摆脱了雇佣劳动的束缚，占有了自己的剩余劳动，实现了劳动解放；社会物质财富充足、贫富差距消失、强制性分工消除、阶级消灭。在这一社会形态中，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得到了解决，人真正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这种状态也意味着人全面地占有自己丰富的类本质，人的类本质得以真正实现。

当我们重新回顾马克思的这些经典论述时，无疑应受到一种启发，它给了我们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两个基点：劳动和休闲。可以说，一切人的自由和解放都存在于且只能存在于劳动和休闲之间，都是劳动和休闲合理配置的产物。马克思在他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中表达了这样一种休闲理想：“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是因此就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③ 这样的一种活动是人真正自由自主的劳动，即一种休闲化的劳动，消除了劳动的异化，劳动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表现人的本质的活动，人就在自己的活动中表现自己的生命和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劳动和休闲真正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是人的真正自由的生活。

马克思没有直接界定和论述休闲问题，但他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把握休闲概念提供了重要思路：其一马克思是从人的生命活动出发，认为休闲活动体现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是人内在的价值追求尺度，是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表现。其二，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关系角度来说明休闲，认为拥有自由时间是实现休闲的基础。其三，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把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休闲与社会的进步连在一起，马克思的休闲思想就根植于他关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展望之中，认为休闲内在地包含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中，休闲活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形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休闲思想的最高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0.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

界。马克思的休闲思想立足于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展望未来，认为休闲既应该是无产阶级争取的一项基本生存权利，又是人类应该追求的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这使得马克思的休闲思想既具有直接现实性，又具有理想性，是理想与现实、批判与创造的统一。马克思站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对休闲意义和价值的深刻剖析使得马克思的休闲思想直至今天还散发着理论的魅力与光辉。

在马克思之后的100多年间，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的休闲理念。瑞典著名哲学家皮普尔说，休闲是一种精神态度；是一种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美国学者凯利则说：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休闲是以存在与“成为”为目标的自由——为了自我，也为了社会。杰弗瑞·戈比说：“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① 这3个定义都是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角度来定义休闲，认为休闲是值得追求的人类生存价值目标，这一点正与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二）中国传统的休闲旨趣

休闲思想不独西方所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含有丰富的休闲理念与休闲旨趣。在中国古代，无论儒家、道家还是释家，一谈到休闲，指向的都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其追求的最终目的都是与万物和谐的“天人合一”式的心灵境界。具体来说，中国传统的休闲哲学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现实品格

中国传统的休闲旨趣虽立意高远，但并不曲高和寡、空谈性理，而是将人生理想、价值追求等体现于日常的生活世界中，通过人的具体行为模式、生活内容、行为风格来显示人的生活态度，可谓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对于儒家来说，个人的休闲方式需在社会中进行与实践，其休闲旨趣不仅通过日用常行而获得其意义，而且更表现在自觉担负起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在一个物质贫乏、“礼崩乐坏”、处于无序状态的社会中，个人要具有休闲的心态，实践休闲的生活方式是不容易的，所以儒家对休闲生活的追求始终与理想社会的推进相连，其休闲理论包含有强烈的社会发展内容。孔子曾赞赏颜渊“贫而乐道”的生活态度：“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② 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依然能够怡然和悦地生活，这就是被孔子所称赞

① ［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4.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M］．北京：中华书局，1980：59.

的颜渊的生活态度。孔子的一生颠沛流离、苦难丛生，但从未改变这种生活态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① 孔颜之所乐在于他们的所求：即使社会动荡仍满怀热情希望，致力于"和乐"社会的实现，即使物质贫乏，依然可以在对德性的追求、社会责任的承担中获得幸福的身心生活，这就是孔子为人们提供的一种在社会动荡、物质贫乏的状况下依然可以让心灵宁静愉悦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总之，儒者总是以"立功""立德""立言"的形式完成对社会的关怀，始终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积极入世，始终关注社会现实，以求天理的经世致用，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对天理大道的觉解境界中，既有对个体精神超拔一切后的身心愉悦，又有社会价值实现后的济世情怀。

道家虽以否定现实、以超世或出世为旨归，其思想从它产生的时代起，就有着愤世嫉俗的鲜明特色、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但道家并非消极遁世，而是以冷静与谨慎的态度审视这个世界。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文明的进步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对人类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和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与伤害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道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其崇尚自然的理想是对人类自身缺陷的深刻解剖与反省，充满了对人类苦难的觉醒与忧患。老子学说中洋溢出来的社会关怀心态昭然若揭，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虽然其休闲思想力倡"无为"，但"无为"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手段而已，是要通过"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为"的结果，所以道家的休闲哲学，提倡的是在人世间修出世法，即如何在世俗生活中生活，却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以及个体生命的完整，人最终是要通过日常生活来展示其生命的超越。与道家相似的释家追求的是随缘人生，凡事都以平常心来看待，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以一种平常心的大智慧，去面对与化解生活中的苦难与冲突，随时随地去领略人生的美好，正如禅诗所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2.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气质*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传统休闲哲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天人合一"是对和谐蕴义的最好诠释，它有3个基本的追求向度，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即群己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即身心和谐，人生如若达此状态当是休闲的最高境界。

首先，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下，传统哲学倡导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人的生产活动不仅要遵守自然的法则与规律，做到"与四时合序"，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也应该效法天地自然之德，做到"与天地合德"。老子所倡导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一个在遵循自然法则前提下的"无为而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M］．北京：中华书局，1980：71.

无不为”的人生态度，所以，老子极力强调“致虚极，守静笃”、“清净为天下正”的生活方式。要人们“返璞归真”，回到像自然界自身运行那样的和谐、安宁与祥和的状态中。儒家的休闲观在行为方式上虽与道家不同，但其休闲的主旨仍是要在苦苦求索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历程中体悟自然、认识自我，达到与自然之道合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论语》中有段话很能体现孔子所钟爱的生活方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① 这就是著名的“曾点之乐”的典故，“曾点之乐”表明早期的儒家对大自然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热爱。所乐何事？乐就是超越一切功名利禄、是非得失，把人还原为一个自然的人，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物我两忘、主客统一的美妙境界，乐就是在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情景中感受和体验到的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儒家的经典《中庸》为我们描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状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② 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以欣然之心对待万物，从而体验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③ 的深远境界。这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相生共存的休闲旨趣和休闲理念。

其次，休闲人生的获得还需处理好群己关系。由于人具有社会性，其认知和实践活动，其生存和发展，其价值创造和享有，都需要在社会、集体中得以实现。因此，其人生价值评价是否正确，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和实现，还要考虑他人、群体、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与实现。儒家休闲哲学的理论前提就是奠基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础之上的，它认为，实现群己关系的和谐需要两个原则：一是正名；二是忠恕。所谓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④，此原则就是要求每个个人各安其位，各尽己职，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劳动，创造性地为他人、为社会提供价值对象，并因此使自身具有存在的独特价值与可贵之处。个体生命在寻求其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历程中，不能脱离人生存的现实环境，不能脱离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岗位、职责以及责任等，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他所肩负的社会角色中。所谓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此原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它要求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开放性，要求在人际交往中去掉“小我”之私，走出小我的狭窄天地，克服主观臆断。通过正名、忠恕的原则把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在实现社会价值中实现自我价值，在追求社会至善的同时追求个人至善。马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M］．北京：中华书局，1980：119.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37.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
④ 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8.
⑤ 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65，123.

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① 现实生存的人只有在个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角色中，才能体会到个体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真正价值，才能寻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宁静与和谐，才能体悟到休闲的真实内涵，因为休闲本身就存在于一个人现实的生活中。

此外，休闲还追求身心的和谐。休闲作为人的生命的自觉，经历了从生理要求，到生存需求，再到精神诉求的过程，即从物质的需求进入精神的需求，这是对生命自身的一次觉醒。中国传统的休闲观念最注重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个体的生存与物质需求虽然是第一位的，但从意义与价值世界而言，它绝不是第一义的，生活的内容与意义不仅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主体自我的精神欲求与精神指向。儒家提倡的"孔颜之乐"、道家提倡的"游心之乐"都反对对物质欲望的过度追求，主张人不应该被物所奴役，强调了精神生活之于人生的意义。人都有两重的生活世界：一个是精神生活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生活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精神生活乃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一个人的境界不同，其心理状态也不同，对世界和灵魂的感受与体验也截然不同，由此建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各自迥异。"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则愈具有超越当下生活的性质。"② 境界高的人可以超越他所能感觉到的现实世界，他所享用的并不限于实际的世界，而是对精神生活世界的追求与享受。这种境界的获得，饱含着人对自然、社会乃至人生的深切感悟，是一种精神的修养和提炼。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对真、善、美境界的向往都会在人的心灵内部唤起一种自信与充实，使自我表现有可能达到完全的自由和自觉，这种精神活动的创造力正是推动一切伟大的、具有创造性的劳动的始因。

3. 无入而不自得的情感体验

传统休闲哲学所追求的休闲人生是实在的、具体的现实生活，但同时也是审美的、艺术的、诗意的人生，是基于平凡世界中所感受到的不平凡的生命之美，这是一个经由心灵感知所体验到的意义世界。而任何意义世界的发现，以及生命本质的发现，都是同人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分不开的。中国传统的休闲理念把人的精神生命当做思考的对象，思考人应如何通过自身的精神修养达到对宇宙人生的觉解，并由这种觉解带来对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的某种体认，从而使人的人格、学问、修养等内在的精神世界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境界就是心灵感知的世界，从本义而言，"境"描述的就是主体自身的一种感受状态，"敝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境"。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4.

② 胡伟希．中国休闲哲学的特质及其开展［J］．湖南社会科学，2003（6）.

越是自由的心灵，越有深切的美感体验。海德格尔说："人的心境愈是自由，便愈能得到美的享受。"① 而一个人的内在体验越丰富，他所感知的生活也就愈加美丽深刻。这种体验在传统休闲哲学中被描绘成一种"乐"的体验。儒家之乐表现在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间仍能不改操守、胸中泰然。道家之乐表现在"心斋""坐忘"之间摆脱掉物欲凡尘、人情世故对人的本性的异化，在虚己忘身中进入无拘无束、任情任性的逍遥之境。这都是自我超越之后的真性情、真情感、真生命的流露，它超越了是非得失、功名利禄，超越了小我之私、内外之别，在与自然宇宙的契合交融中，充溢着生命的欢欣与宁静。进而，即使身处逆境、遭遇困境，也会坦然笑对、安然自得，所谓"无入而不自得焉"。这种体验，是身心的浸润，非言语所能喻。这种体验，也非无迹可寻，"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体验深处，哪怕是最细微之处，都可能激发起人内心最波澜壮阔的情感，正可谓"鸣鸟游丝俱自得，闲云流水亦何心?"②。这种体验引导人们穿越种种现实的理性屏障，使现实世界和生命成为人自由观照的对象，而不是作为异己力量存在，使精神个体摆脱现实的羁绊，达到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妙契冥合，从而诗意地理解世界、理解生命，这时，人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真正的自然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

所以，"自得"的情感体验是中国休闲哲学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类似于西方休闲学者提出的"畅"的概念。美国心理学家奇克森特米哈伊（M. Csikszentmihaly）在《畅：最佳体验的心理学》中，将"畅"（flow）作为休闲活动的心理学本质和标准，"畅"即"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体验"③。所以，"畅"表达的是人进入自我实现状态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极度喜悦的心情、一种自由的体验。"畅"与"自得"在休闲人生中是非常必要的，休闲就是人的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一种精神状态，从体验的意义上来理解休闲，是将休闲看做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愿选择，从而揭示了人们选择休闲的心理本质和内心动机。

（三）休闲的多元化内涵

从马克思对休闲问题的深邃思考与中国传统的休闲旨趣中，我们认为休闲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内涵。

（1）休闲在本质上是人逐渐摆脱种种外在束缚而能够积极乐观地享受生活、创造生活、实现自我的美好状态，对休闲的追求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体现着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对休闲生存方式的追求过程是使人成为人、丰富人的过

①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08.
②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20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29.
③ 马惠娣，刘耳．西方休闲学研究评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5）.

程，是人逐渐占有其本质的过程。人都具有超越意识，人的内在本质决定了人总是要不断地超越当下的生活现实，不断进行创造实践，在连续不断的、反复进行的实践活动中，人的能力以及各种潜能、禀赋和整体素质不断趋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的自由发展中，人不断充实发展着自己的本质，但这并不等于说人全面地占有了自己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伴随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因而人的自我发展也就有着无限的可能，对休闲的追求与意义的体认因而也是无穷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休闲是一个不断创造、生成的状态，“休闲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成为状态’（state of becoming），也就是说，休闲并不仅是当前的现实，而是动态的；它包含许多面向未来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现状的形式、情境和意义。因此，应该通过其行为取向而不应以时空、形式或结果来对休闲加以界定”①。也即说，休闲只有从人的不断发展状态中去理解，在“成为”和“去生存”（海德格尔）的意义上去理解才能获得其最本质的含义。

（2）休闲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状态有密切的关系，休闲的理想就是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共同发展。“休闲是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② 马克思在其自由时间理论基础上，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这样的描绘：“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③“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④ 人的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不能脱离社会。休闲不是清静无为、简单的娱乐，而是积极的创造，所以，休闲是一种在自由时间中人的自由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人的活动和活动的时间、空间，通过这一过程人的精神得到提升，潜力得以实现，从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休闲不是指人在解决温饱以后的放松与娱乐，而是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诉求就是和谐，追求的是个体生命与自然、社会的整体协调与共存。总之，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是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

---

① ［美］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赵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22.

② 陆彦明，马惠娣．马克思休闲思想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是永无止境的历史提高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3）休闲既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的状态，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状态，休闲的获得是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创造与观照的统一。休闲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性的需要，它的实现虽然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单纯依靠物质基础仍不可能达到休闲之境，它还需要主体自身的意识体验，需要有超越物欲享受的文化修养以及一种审美的情怀。如果说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揭示了休闲作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所依赖的物质资料及其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的休闲思想则从精神生活的角度揭示了休闲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依赖的主体自我的内在情感与体验。我们可能在物质上并不特别富有，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心灵的自我调节与提升，获得自由的心灵空间与健康的心灵状态，体验到“无所往而不乐”“无人而不自得”的境界，在这里，人的情感系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情感体验式的休闲智慧对于提高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品质，尤其是提升人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休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给中国走向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休闲在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休闲问题的研究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实践意义。

（一）理论价值

在理论价值上，对人的休闲状态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是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市场经济与人、马克思主义人学体系等问题之后一个新的研究维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主要是指人的素质和能力的相对地全面提高，即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以及其他素质的提高。休闲作为人所追求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与人密切相关，对人产生重大影响，理应纳入人学研究的视野。对休闲价值和意义的研究是对人的价值研究的深入，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定位人的文化精神坐标，去思索人生的意义，厘清人的真正追求所在，这使得对人的思考更具有针对性。另外，休闲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衡量社会财富、社会文明的尺度。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就提出了衡量社会财富的两个尺度，即劳动时间尺度和自由时间尺度。而自由时间尺度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关系根本变革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奠定在自由时间基础之上的休闲在本质上也是符合社会

发展目标的社会存在方式，反映社会的根本特征，对休闲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能够认识社会发展的本真，是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二）现实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一个崭新的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课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休闲内涵的多元性特征，决定了发展休闲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1. 休闲思想内具的重视人的发展、人的自由的理念可以引导人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需要、人的幸福、人的自由放在首位，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与物质生活的富裕，确实为休闲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但现实的情况是，物质生活的进步与精神文明的提升并不总是一致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但人们的精神追求反而倒退了；人们的生活富裕了，但精神生活异常空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其中，与人们没有确立一种理想的生活信念与理想的生活方式具有极大的关系。休闲的发展则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提升人的生活品味与高远的精神境界。同时，休闲引导人思考生命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可以促进人类自身的反省——我们到底追求什么？什么才是我所必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从而引导人们确立理想的生活信念。休闲还是一种愉悦的心灵体验与审美情怀，它可以坚定人追求真、善、美的信念，培养豁达、真诚的品格，促进人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思想品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对休闲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要让休闲真正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就应该休而不俗、休而不闲，从而达到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和谐。

2. 休闲思想内具的和谐气质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今人类面临着种种冲突与困境，其中，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构成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究其原因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傲视万物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作祟。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在工业文明的早期确实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与自然的恩赐，不断地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但随着人类文明的提高，人们也日益感受到了环境恶化给人的生存带来的严重威胁，为了人类自身的长远生存，就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深入的反思，反思的目的就是重新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休闲哲学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智慧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摆脱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条出路，并且指出了一种可取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休闲让人们回

归自我身心、回归和谐的社会关系、回归优美的自然，这一系列的回归意味着人的价值追求的根本转向：从物质转向精神、从对自然的索取转向与自然的平等共生、从主客对立转向主客交融、从片面发展的人转向全面发展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休闲所内具的人文精神必然使得休闲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物质产业和经济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产业，它不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不是依靠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而是依靠科技进步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利用最少的资源，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形成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资源这样的循环经济。休闲理念的深入、休闲价值追求的转向、休闲经济的发展必会促使人们去思考应该如何合理使用有限的资源并付诸实践。

3. 休闲的载体是丰富的产业类型，发展休闲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提升

休闲思想内具的现实品格以及它的实践性、建设性促使休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思辨的阐述和理性的论证，它必须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引导和创造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休闲的合理性还要依赖于经济性质。事实也是如此，休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正是缘于改革开放后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方式的悄然改变以及伴随而来的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休闲产业。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不断涌现的社会财富作支撑，而社会财富的涌现是以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基础的。在这方面，休闲和休闲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一，大力发展健康的休闲经济，不仅在刺激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分有利。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旅游业总产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4%，旅游消费将占国民总消费的6.79%，旅游投资将占国内投资总额的8.16%，接近世界平均水平。[①] 旅游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休闲经济的崛起，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助于形成新的就业增长点。根据国际经验，旅游业每增加一个直接就业人员，就可间接带动相关行业增加5~6人就业。[②] 休闲产业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实现劳动就业的权利，这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可谓影响深远。据西方学者的预测，休闲业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席卷世界各国，休闲产业会成为世界支柱产业，休闲在促进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休闲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也不会例外。

四、发展休闲、引导休闲的途径

休闲虽已成为群众生活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诸多原因，人们的休闲生活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缺乏休闲的理念指导、存在不健康休闲行为、科学的休闲消费观

① 李永周，魏静．论城镇居民休闲消费力的培育［J］．消费经济，2006（1）．

② 马惠娣．大旅游视野中的休闲产业［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2）．

尚未形成；休闲产业规模不足、项目单一；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农民休闲权利落实不力；休闲教育几近空白，等等，这些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制约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发展休闲、引导休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一）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它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条件，构成人的发展的现实基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保证人们享有更加充裕的闲暇时间，拥有能够充分发展自己和发挥自己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①。人是生产的主体，人的生产能力是真正财富的源泉，“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②。可见，生产力决不是外在于人的单纯的物的增长，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展现，是人的潜能、个性、价值的发挥和发展。社会应该给人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其才能的舞台。

（二）建立公平公正的休闲制度与休闲政策，营造良好的社会休闲环境

从社会角度来说，发展休闲、引导休闲，就是要不断地给每一个人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自身的环境，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宁静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包括建立公平民主的社会制度，给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发展的现实空间；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关注弱势群体，使劳动与休闲在社会成员中能够较公正地分配；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提供农村休闲福利，在农村开展休闲资源和公共设施建设，等等。现今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推行“素质教育”“假日经济”“中小学生减负”“自由择业”等都是对休闲价值的积极回应。政府在休闲制度的运行、构建、具体设置方面应该更具人性化和公正性，既维护人们正当休闲的权利，同时又能保证人们拥有健康文明的休闲环境。

（三）提倡休闲教育，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休闲观

如何发挥休闲对现代人生的指导意义，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进行休闲教育。从词源来看，休闲在英文中相对应的词汇是“leisure”，它源于希腊语中的“sc-hole”，意为休闲和教育，所以休闲本身和教育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休闲与教育的联系也表明，健康的休闲观是可以通过教育而被塑造和培养的，甚至可以当做生存价值观而被建构。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如此定义休闲教育（闲暇教育）：“闲暇教育旨在让学习者通过利用闲暇时间而获得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7～10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4.

种变化。这些变化会表现在信念、情感、态度、知识、技能和行为方面，并且它通常发生在儿童、青年和成人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环境或娱乐环境之中。”它的目标是：“① 对闲暇行为价值判断的能力的发展；② 选择和评估闲暇活动的能力的发展；③ 决定个体目标和闲暇行为标准的能力的发展；④ 对合理运用闲暇时间的重要性的意识和理解的发展。”[①] 通过休闲教育可以使人们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真正需要什么，如何选择休闲活动，如何在休闲中更好地提高自身的素质，从而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但休闲教育在我国至今还是一个盲点，在休闲观念上，还存在着科学与愚昧、文明与野蛮、健康与陈腐等矛盾和斗争，实施休闲教育应该被视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领域、新视角。政府应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研究对策、制定方针、予以引导，通过多种途径在全民普及休闲教育，把消遣与提高、娱乐与学习、休闲与创造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国民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休闲观，以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以“诗意地栖居”表达了休闲作为人类生活品质的理想，人类对休闲生活方式的追求正是对诗意地栖居的向往，我想，没有什么能比休闲所内具的文化气质更为美丽、更为诗意了，它表征的是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人的和谐、人的超越。休闲的这种内在要求和目的指向，与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完全解放、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观点相一致。可以说，没有休闲就不是理想的生存状态。“诗意地栖居”是根植于现实的，正是人的有限性、不完整性才使人不断追求完美和诗意，不断地为自然而诗意地生存而付出努力。

① 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第5卷［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0：654.

第六章
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问题怎么办

——一元化指导思想对多元化社会思潮的统领与应对

社会思潮是一定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是重要的社会意识现象，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不仅异常活跃，而且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存在于主流意识和主流文化之外，反映着社会现实以及社会现状，同时又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大潮，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如何探索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进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社会思潮的本质及传播机制

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它由社会存在决定，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不同阶段的社会存在状况不同，社会思潮呈现出不同特点。社会思潮以时代为背景，以社会为场所，以社会群体为主体，不同社会思潮并存、继起、冲撞和消长，构成一定时期社会思想变动的宏观图像。透视社会思潮的波澜起伏、潮起潮落，可以洞察到社会历史的状况及其走向。

（一）社会思潮的内涵及特点

所谓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它从一个

层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信念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①

社会思潮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变化发展着的思想群。社会思潮离不开思想，但不等于思想理论本身，单纯的理论或思想形态并不能形成社会思潮，但思潮总是由各种各样具有相同或相近实质和形式的思想所构成的群体。社会思潮一般都有其代表人物，但它并不是某个个人的创造，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不是少数理论家或思想家的思想。社会思潮的形成必须以一定的理论形态为先导，以得到一定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同为基础。虽然每一种社会思潮一般都有其代表人物，但它之所以能成为社会思潮并且发挥广泛的影响，是因为在一定的领域、范围内为一定阶级、阶层或团体的群众所掌握或认同，亦即社会思潮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或群众性。构成社会思潮的多元思想之间的差异，决定了社会思潮内部的各种思想之间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与人们的需要和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体现出一种强大的共同思想情感。矛盾和冲突的具体思想进而构成一个变化发展的社会思潮整体。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意识现象，社会思潮具有以下特征。

1. 社会思潮具有时代性的特点

任何社会思潮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受到该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因而都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它总是反映一定时代、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社会思潮是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经济利益所引起的社会生活中突出矛盾的反映；社会思潮是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和愿望的反映。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既具有理论形态，又具有心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

2. 社会思潮具有现实性的特点

社会思潮反映的是社会中最现实的问题，常常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因而才使人们热烈地关注它，并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此外，也有某些过去的思想因为能反映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因而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重新流行，成为思潮。

3. 社会思潮具有群体性的特点

社会思潮是以特定的社会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它是一种群体意识，反映了一定群体中多数成员的共同意愿，并总是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人群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

4. 社会思潮具有社会共鸣性

由于它以一定的思想理论为主导，又与人们的社会心理相结合来表达一定人群的情感和愿望，因此在一定领域、范围内能为社会一定阶层或集团所认同和接

① 赵曜．当代中国社会思潮透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1）．

受。社会思潮的这种直接理论效应与自身价值取向的目标性有关，因为一种思想只有和相当数量社会成员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从而引起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们的注意时，才可能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思潮，即使是消极的乃至反动的思潮也会因它的某种迷惑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

5. 社会思潮具有社会影响力

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社会思潮绝不仅仅积极或消极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现象，其共鸣性特征决定它能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消极的社会思潮可以扰乱人们思想，破坏社会安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进步的社会思潮则能增强思想凝聚力，引导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在观察社会思潮时，我们一定要分清社会思潮的性质。

6. 社会思潮具有明显的变动性

由于社会思潮与社会现实生活是紧密联系的，所以随着社会热点和焦点的变化，旧的社会思潮会被新的社会思潮取代。

（二）社会思潮的传播机制

社会思潮的传播是一个由发送者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发送，然后由接收者接收或接受，最后又被传至次级接收者以至以下多级接收者或接受者的多级网状传播过程。社会思潮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这两种传播形式对社会思潮都有重要意义。人际传播在社会思潮的早期传播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个阶段，人既是传播者又是媒介。思潮在其产生初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情感的沟通，传播者以自己的观点、见解、主张说服、教导信息的接收者，以期与之达成共识。通过人际传播，思潮获得了最早接受自己的核心成员，这些成员又作为火种继续撒播他们所掌握的某种思潮的核心思想。在大众传播空前繁荣的今天，人际传播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传播媒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也日益发达和普及，已经成为每一个现代人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的影响因此越来越大，对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传播学家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在谈到社会与大众传播的相互作用时，用'革命'这个词并不是偶然的。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① 大众传播媒介在思潮传播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使得思潮之间的斗争往往表现在传播力度上的较量。先进的社会思潮更应关注传播工作，不能因其自身科学性而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传播上的潜在优势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充分发挥，而应当看到，如果忽视宣传、传播工作，这种优势就很难成为现实。马克思就曾称赞自由出版物"无所

① ［美］施拉姆·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9.

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现出来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①。

把握社会思潮的传播机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有效引领社会思潮的关键一环。社会思潮的传播机制符合一般信息事物的传播，遵循传播学的原理与规律。一般的传播机制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传播过程，即传播者→传播媒介→接收（受）者→次级接收（受）者；二是信息反馈过程，即次级接收（受）者→接收（受）者→传播媒介→传播者。我们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思潮进一步研究这个传播机制的过程与环节，以获得更加丰富的关于社会思潮传播机制方面的认知，从而给予引领方法更多的可操作性启示。

1. 谁是传播者

传播者之所以成为传播者至少要具备掌握、调动或影响一定社会资源的能力，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媒介资源等。因此，能够成为某种社会思潮传播者的绝不是普通人，而是诸如著名学者、社会精英和其他社会名流等，这些人凭借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成为了一定社会思潮的传播者。传播的阶段不同决定了对传播者的要求不同，也决定了控制传播的对象不同。

2. 传播的动机

动机引发传播行为。从实践中看，传播的动机主要存在 3 种：一是利益驱动。社会思潮本质上是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反映和表达，包括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多个方面，这是传播者最重要的传播动机。二是所谓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一些传播者以一种自认为应该铁肩担道义的精神进行某种社会思潮的研究和宣传，如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新“左”派思潮等。三是对党和社会的严重不满。一些人充当反动势力和腐朽势力的先锋，否定现状和成绩，欺骗群众，以期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西方多党制思潮等。

3. 传播的媒介

一套思想理论如果得不到传播，不能被一定的群体所接受和散布，那么，社会思潮就无法产生。因此，传播的媒介问题是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关键问题。从当前来看，传播的媒介纷繁复杂，但可基本归纳为两种：一是传统媒介，如报纸、广播电影电视、书籍杂志等；二是新兴媒介，如网络、手机和数码产品等。传统媒介的威力和影响力并未因信息社会的来临而消解，依然在城市的各类群体中发挥着巨大的宣传作用；新兴媒介则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中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一种传播媒介重要或关键，而是要综合社会思潮的性质、具体特征以及接受者的社会生活环境等因素来确定。

4. 思潮的载体

社会思潮的接受者就是思潮的载体。社会思潮反映了一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5.

和要求，因此，接受者必然属于一定的阶层和群体。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样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成了多样的社会思潮的直接载体。在经济社会的不断往前发展中，阶层或群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呈现出不断地分化与重新组合状态。因此，对社会思潮载体的考察，要紧密结合实践的进展，以动态的眼光跟踪观察与界定。

5. 接收者接受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影响接收者是否接受传播内容的主要因素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也有的学者认为，传播者和接收者的阶级属性、政治倾向、文化水平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立场、覆盖面、权威性对接收者是否接受一定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们认为，除了这些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外，还应当充分考虑接收者的心理接受规律。

第一是团体压力导致的从众心理。人天然有合群的愿望。每一个群体都有维持自己群体标准和价值观的固有倾向，群体的存在，对于个人而言往往成为一种真实的或想象的压力存在，个人为了维持心理的平衡，消除心理的紧张，往往会下意识地接受他人的思想和观点。而且团体的规模越大，从众的心理现象越明显。

第二是模仿。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不断被塑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不断从思想观点和行为上靠拢和模仿别人的过程。人是社会的人，周围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无形巨大影响致使绝大多数人无法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选择，而只是在既有的选择中进行选择，表面上的理性自主，最终变成被动地无意识模仿。通过模仿，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不断实现世俗化和“合理化”，不断消除自我与周围世界的对立，以期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

第三是解释。一个人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或观点意味着打破固有的认知结构，建立了新的认知体系。其中转换的关键在于对新的思想和观点的解释，如果新的思想或观点能够获得合理性解释，那么，这种思想或观点就容易被接受。每一个人都存在着对万事万物进行自认为是合理性解释的欲望和倾向，这是精神的安然感赖以产生的根据，也是外在肯定的行为得以产生的根据。而且如果预期在接受这种思想和观点后能够维护和促进自己某方面利益和需求的实现，那么，无疑会大大增强接受的可能性。

6. 接收（受）者的传播

接收虽然并不意味着最终接受，但无论接收者还是接受者，二者都有继续传播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接收者的传播主要体现为人际传播，且多为无意传播。接受者的传播主要体现为大众传播，而且往往呈现出有意传播的特点。一个人在接受了某种社会思潮后，便具备了3种可能：一是渴望与他人共同分享这份精神财富，从而产生征服他人思想的欲望和愿望；二是希望更多的人赞同和支持

该社会思潮，否则，成为思想的少数派易产生精神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三是在同其他人思想的对立斗争中，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从而扩大社会思潮传播的空间。

以上分析了社会思潮的传播机制，但在现实中，社会思潮的传播过程会更复杂，传播的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受众也不只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会主动选择、反馈信息，因此传播过程不是源于传播者、止于受传者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双向甚至是多向的过程。在信息的反馈过程中，接受者把反映传递到传播者，传播者据此对思潮传播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修正。社会思潮传播过程中充满了反馈，如果没有公众的积极参与，社会思潮的形成和传播都会受到影响。

（三）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存在

社会结构反映了个人或集团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广义上讲，社会结构表现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基本范畴之间的稳定联系，是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方式有序排列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社会结构这一术语所表示的是不同社会集团和各集团之间稳定联系的体系，揭示的是不同社会的内部结构构成。社会结构是运动变化的，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结构不断变迁、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人类迄今为止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5种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包含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且对应着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结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社会结构既是人们行动的前提和条件，也是人们社会行动的结果与创造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转型，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推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其基本特征是：政治领域向民主化、法治化转变；经济领域向市场化、自动化发展；文化领域向理性化、多元化转变；社会领域向城市化、分层化转型，等等。显然，社会结构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社会进步，这是主要方面。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原先是在同质性极强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展开的，一些滞后的结构要素和功能尚保留着旧体制下的惯性和余温，新旧结构要素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了社会失范、社会整合能力降低等问题，如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农民工”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下岗失业以及医疗保险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带来的腐败问题、新旧观念的冲突造成的信仰出现真空问题等。物质决定意识，这些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存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异常活跃。从社会思潮的内容上说，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各种社会思潮彼此交织、相互激荡。既有正确科学的思想，又有偏颇谬误的思想；既有进步向上的思想，又有反动落后的思想；既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又有消极腐朽的思想；既有高尚文明的思想，又有低级庸俗的思想。社会思潮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涉及领域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每一个领域的社会思潮又因具体观点的差异，甚至对立而划分为具体的思潮，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动，不断地发生变化并反作用于社会生活。

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多样性

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需要的社会思潮，尤其是在一个发生着剧烈变化、进行着复杂变革的时代，当下的中国即处于这种复杂和多变的过程当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前人未曾预料和经历过的新现象，全球化的大背景使得各种情况更加敏感和复杂。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也呈现出“中国特色”。

（一）当代值得关注的几种思潮

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出发，当前有以下社会思潮特别需要注意和研究，并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1. 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发展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前，西方多数国家都奉行古典自由主义政策。在大危机来临之后，凯恩斯主义就提出加强国家干预、加强宏观调控，罗斯福新政也出现了。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凯恩斯主义代替了新自由主义，成为当时主导的政治理念。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陷入经济萧条和危机，凯恩斯主义提不出克服危机的有效对策，于是新自由主义就大行其道。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从此，新自由主义便上升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对内对外的政策。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以鼓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潮。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全面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它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资本主义全球化。从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和特征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很强的阶级性，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建立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全球

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扩张政策服务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鼓吹极端个人主义，推崇个人权利而限制公共权利，贬低和否定集体主义，这与我国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提倡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背道而驰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前苏联、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家蔓延开来，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危机，并进一步演化为政治动乱。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政治政策，它已经给广大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意识形态终结”理论得以传播。新自由主义者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秉承的政治信念和道义基础；宣称“苏联解体”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的胜利。90年代以后，“淡化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的观点则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攻的新武器，成为弱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手段。

第二，个人主义不断泛滥。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根基在于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个人主义不断泛滥，冲击着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

第三，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强烈的冲击。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产权神圣”、“公有制是罪恶根源”的论断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适当的产权改革是改革必需的内容，但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产权改革实质上是要对我国根本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进行修改。

2. 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首先出现在美国政治、经济、历史等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理论流派和思潮。1959年，美国学者威廉·威廉斯出版《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标志新“左”派的诞生。新“左”派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是自称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诸问题。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对外政策，认为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因素是国内经济体制、经济基础，至于他国的行为、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只是对美国外交政策起调节作用。美国外交的传统是不择手段地无限扩张，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而造成扩张政策的主要祸首是美国军事工业，是贪婪的垄断资产阶级。新“左”派思潮在西方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弗莱明的《冷战及其起因》、霍布里茨的《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等。

新“左”派运动在西方包括女权主义运动、绿党运动、同性恋者权利激进

主义分子运动和民权运动等。但是国际上新“左”派运动有不同的特征，如英国新“左”派的学生们为了和平、裁军和全球公正或其他重要问题，发动了裁减核武器运动；而拉美的新“左”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又区别于美国和西欧的新“左”派运动。

新“左”派思潮在中国则有特定的含义。我们可以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新“左”派思潮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

第二，新“左”派强调公平分配，主张用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第三，新“左”派认为“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

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不切合中国实际。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随着继续的进步发展而得到解决，而不是拒绝继续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就是‘左’。”同时，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① 因此，新时期我们必须警惕新“左”派思潮的干扰。

3.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先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社会，20 世纪 80 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大肆泛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极力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即“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也就是他们通常宣扬的“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污蔑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号称真

① 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

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因此，其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论的“改头换面”。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极具虚幻性、煽动性和迷惑性，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发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动乱，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

受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也出现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有人主张并鼓吹建立中国社会民主党或者把中国共产党改造为社会民主党。总结前苏联和匈牙利剧变和演变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滋生和泛滥。有人认为，在世界性的改革潮流下，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在缩小并且模糊起来。这并不符合实际。必须认清，二者有质的区别。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科学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元化的指导思想。二是在如何对待革命和改良的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坚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止境的价值追求目标，即不主张超越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主张政治多元化。

第二，反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法兰克福宣言》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甚至把主张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反伦理的，认为资本主义是永存的。它从理论上否定规律性、否定决定论、否定制度的选择，认为主张必然性和规律性就是一种宿命论。

第三，否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也主张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就更加明确地抛弃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原则，认为公有制并不是抑制资本主义弊病的特效药。在他们的纲领中，用经济民主监督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纲领中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规定。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的纲领中就不再提及所有制问题，在这一点上最清楚地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根本的区别。

第四，主张通过社会福利制度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社会民主党人看到了搞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所以，他们主张在搞市场经济的同时实行福利制度。当今世界有三种市场经济：一种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种是民主社会党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一种是我们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党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改良，他们看到市场经济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也会带来很多的社会弊病，主张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这种改良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的范围里解决了一些问题，在一段时间里缓和了社会矛盾，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它只局限于分配领域，并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严重脱离了我国的具体国情，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锐利武器揭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包含的政治观和价值观本质，避免陷入民主社会主义陷阱。

4. 保守主义思潮

作为一种思潮，保守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悄悄来到中国。中国的保守主义很复杂，可以分为文化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保守的自由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日本、“四小龙”的影响，我国学术界所出现的面向中国、面向古典的一种纯学术文化潮流。部分知识分子由“西学”转向了“中学”，由“全盘西化”、“西体中用”转向“新儒家”，退回到民族本位文化，崇尚国学研究，他们埋头于传统经典古籍，对传统经典作现代解释。90年代，新儒学在我国开始复兴。

20世纪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是80年代权威主义的更名和继续，反对激进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和民主政体，肯定传统与权威，强调加强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权威。90年代初，经过对当代改革中出现的激进“西化”思潮的批判和反省，以利益衡量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原则逐渐上升，中国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对改革的目标和战略的认识趋于现实主义化。于是，新权威主义的观点为许多人所接受，并演化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的目标取向虽然是现代市场经济和中国未来民主，但它将自己与浪漫的“西化”的自由主义和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相对立，肯定传统文化价值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强调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重视加强国家的权威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论证“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新保守主义不是从理论原则的层面，而是从实际效用的层面，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改革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渐进的改良方式进行了论证。上述两种保守主义思潮，都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种是保守的自由主义，它以“告别革命”为标志，反对“左”的和“右”的一切激进主义。它不仅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还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甚至反对世界上一切革命。这种否定一切革命的错误思潮，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如果蔓延开来，后患无穷。

5. 民粹主义思潮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它以人民崇拜为核心理念，主张大众民主、追求道德至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粹主义最初建立在民本主义的传统基础上，受俄国民粹主义影响，生成于五四时期。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阶层分化的加快，阶层之间充满了隔阂和敌意，仇富心理成为典型的社会心理。草根或者底层以及受其影响的下层知识分子借助网络表达其政治立场，并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行为，而民粹主义思潮就在网络论坛中的声讨、谩骂等语言暴力中不断兴盛。声讨富人的奢侈生活与骄横跋扈以及官员的腐败行为充斥网络。民粹主义情绪下，以仇富"济"贫心理为代表的道德专制论将不断激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进而影响民众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知与认同。

总的来看，当前充斥着话语暴力的民粹主义思潮有日益蔓延的趋势，并影响了民众的现实政治行为。尽管民粹主义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其对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的批判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其"一边倒"的网络语言暴力下对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的批判与渲染，很容易导致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降低。应当采取各种方式，淡化民粹主义思潮的暴力、非理性倾向，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力，确保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

6.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以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产生和蔓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冲击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并不否定以往所有历史，而是从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出发，否定某一阶段或某几个阶段的历史。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内涵是：否定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一切革命（从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直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全盘西化"；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全盘否定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的功绩。显而易见，这种社会思潮的政治倾向是十分鲜明的，是一种违反历史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透过个别现象而否认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中的阶段错误而否定整体过程，其一个明显的代表就是中国全盘西化的造势者，通过对我国一些阶段性错误发展的分析，而想全面抹杀我们先辈的革命，抹杀我们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专家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义是：其根本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经逐渐从学术领域向普通民众传播，大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定中华文明，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内在机制存在严重问题，不存在自我更新的可能，唯有将上溯到希腊文明的西方文化中的一些

基本理念引入中国，普及民间，中国文化才能充分世界化。

二是借“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历史。以“重新评价”为名，肆意歪曲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意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途；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

三是歪曲历史英雄，为历史负面人物翻案，戏仿、恶搞经典文化。把农民起义中的民族英雄和新中国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歪曲成“野心家”、“政客”，把革命运动解读为争权夺利。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抹杀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否定了近代革命史的主线，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模糊了价值判断标准，消解了文化认同、瓦解了共同理想信念，虚弱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消融了民族精神。其最终后果是必将削弱党的执政合法性，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深刻而长久的挑战。

7.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1987 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的公共知识分子出现。之后，法国学者利奥塔、布尔迪厄，美国学者萨义德等进一步论述了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从而形成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话语对象是公众，话语立场是公共利益，话语内容是重大公共事务。其基本特征是：自我标榜“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与国家意识形态绝缘；挑战一切传统和权威的“批判”姿态，极力倡导以知识为信托，自我描绘成代表公平与正义的“意见领袖”，是“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其主体主要是一些体制内活跃的具有国外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一些从体制内脱离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自由文化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是其主要影响对象。其主要活动载体是报纸专栏、电视访谈、大众讲座、论坛、博客、播客等。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一批当代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的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一些学者和文化人并不满足于在理论上介绍和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而是以这种理论介入现实。借助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强力渗透和影响，一些具有一定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学者和文化人纷纷投奔媒介，标榜中立态度或公正的立场，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批判，形成了一股影响力日甚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它极力强调知识分子为超阶级的、代表社会良知的、理所当然的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人”。这样的知识分子观，与我们党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要论断，与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显然是不相符的。

近年来，围绕着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公共知识分子总会在“合适”的时机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其批判的立场，以正义、良知、民主、自由等话语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指责，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表达出“不同看法”。有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借助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成就和影响，获得了话语的权威性，又由于其名气和权威，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往往获得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舆论导向。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公共知识分子批判、关注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具体；更加注重相互之间的沟通联系，对批判的时机选择、观点、力度把握上趋于统一集中，以期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一些活跃分子在群体性事件、法律维权、社会弱势群体等问题上的表现日趋激进，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8. 拜金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在我国的滋生和蔓延是近 30 年的事情。所谓拜金主义，就是盲目崇拜金钱、把金钱价值看作最高价值、一切价值都要服从于金钱价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拜金主义在当前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都有所表现。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拜金主义思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滋长起来、甚至泛滥开来。比如，有的人割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一些地区和部门为了部门和单位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更有甚者，无视社会公德、践踏市场准则，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利益。在政治领域，拜金主义的思想观念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也逐渐滋长起来。少数领导干部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钱财的手段，从而出现不少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在文化领域，拜金主义也渗入了这片净土，一些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文化领域过度商业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拜金主义表面上是对金钱的崇拜，但这种崇拜的背后实际上是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作祟。拜金主义危害严重：从人的发展来看，拜金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背离，把人降低为金钱的奴隶；从社会来看，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物欲横流、人情冷漠、尔虞我诈、人人自危的社会，是一个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社会；经济领域如果任由拜金主义泛滥，就会使经济秩序陷入混乱，诚信丧失，就会使诚实劳动得不到回报，使坑蒙拐骗、敲诈勒索者大行其道；政治领域如果盛行拜金主义，党和政府的威信就会受损；文化领域如果一切唯金钱至上，整个社会就没有了精神支柱，没有了凝聚力，社会发展就失去意义和价值。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因此，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引导人们抵御拜金主义思潮，使这种思潮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9. 利己主义思潮

利己主义是指把利己看做人的天性，把个人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其特征是：从极端自私的个人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地位和享受。追逐个人名利，历来是一切利己主义者的人生目的。

利己主义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对社会有害无利的社会思潮。自从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也就产生了个人主义倾向。但是，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兴起于14—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旗帜，以反对封建神权统治为目标登上历史舞台，具有一种社会进步性。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个人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实践上表现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倾向和特点。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利己主义也出现滋长势头。有些人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信条，个人主义恶性发展，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为谋取私利不择手段。利己主义如得不到抵制，泛滥成灾，就会瓦解人们的共同理想，干扰社会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对社会的危害将是巨大的。

（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基本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潮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样化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变幻万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发展态势。

第一，社会思潮由少到多，由简到繁，在冲突中体现矛盾，在争论中促进交流，形成多样并存的思想图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分化程度很小、特别单一的社会结构，社会的思想道德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信仰体系是社会的最主要的凝聚力量。随着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和推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近年来，各种社会思潮在改革进程中纷纷登场，在政治和社会各领域表达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理想和实践路径，并竞相争夺着话语权和合法性，在社会思想领域形成了此起彼伏、激烈竞争、充满矛盾的态势。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主要社会思潮影响广泛而深入，在制度安排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上激烈论争。生态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在社会发展措施及实践原则方面阐述着各自的主张。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思潮等则在社会心理和个人观念等领域乘虚而入，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复杂影响。

第二，社会思潮的性质复杂，社会功能参差不齐，不同思潮之间和思潮内部存在着矛盾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境遇中，各种社会思潮既有吸引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争、既有渗透又有抵御，正确的与错误的彼此交织，积极的和消极的相互激荡。它们的社会功能与影响在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都有不同表现，不宜用单一价值标准进行考量和界定。在社会思潮中存在着历史的和现实的、本土的

和外来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思想文化，基本立场矛盾对立，价值导向多样分化，社会影响扑朔迷离。

第三，不同社会思潮在社会思想领域的变迁具有历时性，在话语权的竞争和较量中不断变动和更替，呈现为动态发展状态。社会思潮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传播，也随着社会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和具体条件的改变经历着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社会思潮具有一种变动性，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和人们认识的改变，一种社会思潮将为另一种社会思潮所取代，显现出潮来潮往、潮起潮落的现象。例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盘西化”理论大势已去，新儒学思想又开始大行其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了人们讨论的视野。而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全球主义”也先后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对于个人思想观念产生着重要影响。

第四，本土思潮和外来思潮在我国竞争激荡并不断转化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思想领域的重要变量。根据生成和传播的发源地，社会思潮可以分成本土思潮和外来思潮。我国的本土思潮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积淀，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外来思潮作为社会思潮领域的舶来品，在我国传播的速度、广度、深度都在不同程度地加大，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一度成为社会思想领域的热点话题，并对我国社会发展走向产生过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激荡，相互碰撞，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得复杂多样。而且国外思潮和国内思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起伏变幻，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现实动因，主要表现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现实社会主义遭受挫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冲击，不同社会思潮在价值失范和信仰真空的历史境遇中兴起；我国社会处于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我国改革内容和方向的核心要素，一些功利主义和实用导向的社会思潮纷纷涌现；传统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已经解体，社会阶层关系不断分化并趋于复杂，不同利益取向和价值追求的社会思潮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国际范围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斗争一直持续，西方国家始终推进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我国社会思潮的变迁有着复杂的国际境遇；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信息来源及其传播途径日益多元化，社会思潮在信息开放性状态下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当前我国社会思潮多元涌现、错综复杂，体现了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在人们主观世界的客观反映。

（三）当前我国主要社会思潮呈现的突出特征

当代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当代的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在这一背景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的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思潮动荡起伏，异常活跃，呈现出如下特征：

1. 更加关注现实利益问题

以往社会思潮主要集中在抽象层面的学术思想领域，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大多比较间接。当前一些社会思潮则直接与现实相关，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度有所提高，更加重视制度层面的、可操作的问题，往往针对某些社会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2. 更加注重争夺话语权并试图影响现实

为争夺话语权，抢占思想舆论阵地的主导权，社会思潮之间的争论、交锋更加激烈。一些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通过写文章、作讲演等各种机会，积极介入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力图使自己的声音最响亮、最动听，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比如，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针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的成因和解决途径，分别持不同意见。同时，一些社会思潮不满足于取得话语权，而是积极介入现实，试图影响现实。

3. 传播更加多样化、立体化、平民化

第一是继续借助书、报刊、大学讲坛等传统渠道进行传播，抢占舆论阵地。电视、报刊是人民群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大学作为社会思潮的发酵升温地，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是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技术手段，扩大传播渠道和范围。社会思潮的传播进入集声音、文字、图像于一体的时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互联网逐渐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重要工具。第三是更贴近平民百姓的生活。无论传播的内容还是方式，社会思潮与普通百姓的距离更近。

4. 群体基础逐渐从精英向大众扩展

以往社会思潮仅仅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而当前思潮的参与者已日趋大众化。知识分子依然是社会思潮的主要力量，在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传播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思潮的程度加深，尤其是高校学生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青年记者、编辑人员，在一些社会思潮的传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些社会思潮往往以群众利益“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善于抓住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发表见解，对人们的思想困惑给出看似合理的解答，容易满足一些普通群众的心理需求。

5. 各种社会思潮更注重吸收其他思潮的思想

社会思潮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相互撞击、相互影响的趋势在加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社会思潮在有限度地坚持自己传统的、特定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吸收其他社会思潮对自己有利的思想内容。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对社会经济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应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

三、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往往有一定的理论或思想作主导。可以说，社会思潮是理论形态与人们的社会心理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会不会阻碍人们的创新精神，造成社会思想的单调和窒息？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的。用一元引领多元，并不是用一元化代替多样化。一个社会不应有多元化的指导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但并不是反对和否定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然而，面对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去引导，而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就必须积极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所谓“引领”，从根本上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给整个社会以正确的导向，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从而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①]“引领”的这种内涵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发展，对健康有益文化的支持，对落后文化的改造，对腐朽文化的批判和抵制。“引领”过程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将各种社会思想包容、整合在马克思主义统领下的社会意识之中，在尊重差异中扩大认同，在包容多样中谋求共识。这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前提确定，就是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目的明确，就是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清楚，就是尊重包容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尊重包容科学上的不同学派，文化艺术上的不同风格，绚丽多姿的思想“百花”等，绝不包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更不容许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②]

（一）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

1. 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迫切需要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有主流意识形态或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与引领。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发

① 梅荣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J］．高校理论战线，2007（3）．
②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12－19．

展，都内在地要求社会成员具有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质、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广泛认同的共同价值标准，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思想根基。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增强，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从总体上说，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是，在主旋律高扬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些人在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利益调整面前无所适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思想困惑和信仰动摇。在社会生活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受到一些人的追捧，原有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受到了严峻挑战。一些原本十分清楚的价值观受到了质疑，一些人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无所适从。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与落后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同时存在、意识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与引导上的滞后性同时存在的态势。现实告诉我们，多样化社会思潮是必须积极加以引领的。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整合；社会思潮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目标取向，甚至会动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这就迫切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对群众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疑惑给予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解答，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2. 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是整合社会各层次思想意识的需要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而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同时，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都处在动态发展中，对未来既充满了担忧又充满了期待，担忧在改革中受到冲击，期待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社会成员认同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社会具有统一的符合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才能形成社会发展所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调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积极性，整合社会资源，统领社会思想，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是主流意识形态发挥其作用的基本方式。

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进步，使社会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认同性整合措施相互协调，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成员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认同，使社会各个阶层在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

归属感。

3. 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

维护社会和谐需要持续不断地协调经济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使人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而马克思主义反映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愿望与要求，可以引导人们超越具体利益关系，求同存异，消除冲突，以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以和谐的办法解决矛盾，以和谐的理念平衡心态，以和谐的方式表达诉求，在团结协作中化解矛盾，使和谐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一种社会心理、处事态度，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把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理性、道德、法治的轨道，和睦相处，和衷共济，营造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谐共进的社会人文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是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中流砥柱，在不同文化相互竞争与冲突的现实中构建了和谐文化格局，在全球化进程中确保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进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实践标准和创新原则，不断推进和实现对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科学引领和有效引领，形成了丰富的科学经验。

1.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增加对社会思潮的主导力

在当代中国，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为全人类的最后解放，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人运动中，是指导工人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内在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决定了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旗帜的必然性。在社会思想多元纷呈、竞争对立的情况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和谐发展，抵制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维护人们的思想统一和社会稳定。

在当今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坚持和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确保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是增强全国人民凝聚力、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和主动权，最大程度上排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和不良企图，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统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

2. 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依靠科学的理论品质和时代精神，掌握引领社会思潮的主动权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 毛泽东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只有马克思主义，并且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给予正确的导向。

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正确实践经验上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才能科学地回答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解除了人们的思想困惑，对于社会思想进行了有力的规范和引领，从而也减弱了其他社会思潮的不良影响。马克思主义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开放机制和发展机制，凝结成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保持鲜明的时代活力，始终能够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沿，掌握着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主动权。

3. 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主题。从现实来看，马克思主义要能够更加有效地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就必须紧紧把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和价值目标，更好地反映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人们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马克思主义能否成功地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最终要看能否不断增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能否增强自己满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能力。要把引领社会思潮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增强其引领的亲和力与吸引力。必须重视从解决群众利益问题和各种利益矛盾入手，凸显人文关怀，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结合起来，把人文关怀送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价值追求，时刻牢记人民的疾苦冷暖，时刻增强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刻推进人民向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同人民生活保持着血肉联系，只有集中关注和真正解答现实问题，认真倾听和努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心声与要求，它才会变得生机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

勃，就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就会显示出强大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雄辩地证明了自身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同时也强有力地回击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于自身的进攻。

4. 尊重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规律，正确处理一元化指导思想和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

党在文化领域坚持“两为”方向、“双百”的方针和“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政策，为各种思想文化带来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 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民主的方式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为不同社会思潮共存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并在自身理论发展的进程中，善于汲取不同思潮的积极因素和有利资源，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感和代表性。马克思主义以其开放性理论机制在辩证地对待其他社会思潮的合理资源的同时，既有效地维护了“一元化”指导地位，也形成了其他社会思潮无与伦比的共性优势，保持了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

5. 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底线，坚决反对、批判和抵制错误思潮，维护和强化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进入21世纪，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改革开放进程中党对错误思潮的斗争经验表明，对于错误思潮的泛滥不能作壁上观，无所作为，更不能随声附和，放任自流，如果对错误的社会思潮放任自流，思想道德混乱就难以避免，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就无从谈起。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坚持正确方向和价值尺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考察各种社会思潮的性质和动机，提高批判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有力地抵制和清除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通过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可以帮助群众澄清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误解和偏见，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使其引领作用进一步得到加强与巩固。

6. 建构多途径综合型的思想教育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凝聚全国人民的认同和信仰

思想政治教育是团结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是一切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形势下，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通过习惯性机制化的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使人们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意义，防止和克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侵蚀，从而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凝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99.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加强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必要性。我们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途径，卓有成效地开展引领工作。

（三）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

积极探索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和任务，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路径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展开。

1. 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理论路径

尽管多种意识形态可能同时存在，但各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必然有主有次，必然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元社会意识，形成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下多元社会思想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格局。

第一，引导群众全面认识社会思潮。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精神，加强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只有认清社会思潮，才能牢牢把握引领社会思潮的主动权。

首先，深入研究社会思潮的一般性质、特点和影响广泛的具体思潮。从理论上把握社会思潮的一般性质和基本特点，是研究社会思潮的基础性工作，有助于深入了解社会思潮的总体状况，有利于增强引领社会思潮的灵活性，提高对社会思潮的预判能力，最大限度地防止错误思潮的形成，对研究具体社会思潮也有指导作用。在研究社会思潮一般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各种具体思潮，从而进行分类引领，把握重点，增强引领的针对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就某种社会思潮所反映的层面和领域进行针对性的引导，而不是空泛地、空洞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要针对社会思潮所主张的思想和观点，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对社会现实问题及其相关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宣传，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其次，客观评判社会思潮的社会作用，与错误思潮作斗争。社会思潮因为自身属性与历史发展存在着正向和负向关系，往往会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或不良的破坏作用。应当肯定其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阻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负面影响，要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其社会作用，以便能正确引领社会思潮。同时，应批判、抵制错误思潮，及时澄清人们思想中的认识误区和模糊地带，引领社会思潮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要把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一条最根本的政治原则，并在不断

实践中对其进行不断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故步自封的学说，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科学体系。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发展的，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进步而不断丰富的。[①]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自我封闭和自我固化，否则，只能走向僵化而遭到历史的淘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原因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中繁荣和活跃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开放机制整合不同的社会思想，确立明确的目标取向，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当代中国面临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差异性逐渐突出，社会价值呈现出色彩纷繁的过渡态势。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大潮，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将各种社会思想有益因素吸收和整合在马克思主义统领下的社会意识之中，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总目标是，“在多样化思潮中确立主导地位，在多样化观念中寻求最大共识；以主导扩大共识，以共识巩固主导”[②] 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对于其他社会思潮的有力引领，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弘扬主旋律，最大限度地尊重多样化，最大限度地形成和扩大社会思想共识。只有将我们的思想统一于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也就是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团结奋进、共创和谐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社会思想共识，才能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要求，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凝聚起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将始终是一个动态过程。这就要求在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过程中，牢牢抓住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这个目标取向不放。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不仅仅是个教育引导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与社会思潮相关的利益问题。因此，必须从解决群众利益问题和各种利益矛盾入手，把引领社会思潮、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效。

2. 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规律，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6.

② 张国祚．论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J］．求是，2007（14）.

创造性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践思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社会思潮有序发展和科学发展，建设主旋律和多样化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思想格局。

第一，通过制度安排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完善制度建设，构建引领的有效机制。

首先是分析预测机制。社会思潮的预测，是指对某种社会思潮产生的可能性、发展条件、蔓延速度及其社会后果等进行的全面分析与评估。预测机制是现代国家运行机制的基本内容之一，广泛存在于现代国家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思潮进行预测是社会预测的先导，为社会预测提供重要的知识信息和观念信息，这是由对社会思潮进行的预测具有超前性的特点决定的。预测是一种超前的研究和分析，着眼于将来的发展趋势和状况。对社会思潮进行的预测还具有综合性的特点。社会思潮预测的对象具有广泛性，内容具有复杂性，因而它是一项客观的、全面的、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工程。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错误思潮的形成，减少因工作被动而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必须对可能出现的社会思潮作出前瞻性的预测，以防患于未然。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有关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预知可能出现的不良思潮，善于根据某种潜在的思潮苗头来觉察其未来的变化。同时也要把收集的思想理论信息与外在环境和形势联系起来，综合运用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注意研究发现不同思潮的共同因素和相似现象，预测其相似的发展趋势，为做好引导工作提供正确的判断。

其次是疏通引导机制。对社会思潮的疏导是解决人们在社会意识领域中思想上、理论上不同认识的基本方针或方法。它包括疏通与引导两个方面。疏通就是要创造勇于探索的民主讨论、自由争鸣、畅所欲言及和谐活泼的宽松学术环境，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相互切磋，不同意见充分发表，不压制，不阻塞，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论、商榷，分清良莠，明辨是非。引导就是指引、导向，引领社会思潮健康、正确发展。社会思潮就主要方面，或对大多数群众来说，多属学术性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宜采取宣传教育和帮助的办法和方式，对正确的思想观点和意见要予以肯定、采纳和支持，对不正确的思想、观点和意见给予客观的分析、解释、教育和批评。对事关政治方向、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分清是非。特别应注意严格区分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坚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的问题。

再次是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诉求机制的建立能够为各社会阶层群众提供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使多元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供决策者调控、整合、汲取，制定出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如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协商谈判制度、公民投

票制度，等等，扩大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全方位拓宽社情民意表达的渠道。另外，要引导公众以合法和理性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把引领社会思潮的工作纳入民主化、规范化和经常化的轨道。

最后是反馈反应机制。密切关注社会思潮的起落，通过设立专门的研究监测机构，建立起社会思潮的动态调查和数据系统，及时把握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思想状况、价值取向及其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和反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做好引导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扬蕴含在特定社会思潮中的积极向上的方面，防止某些可能发展的消极方面任意滋长。特别是在国内外重大事件时有发生、网络日益成为思想信息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的条件下，建立迅捷高效的社会思潮动态掌控和反馈反应机制，已成为在重大关键时刻能否及时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引领社会思潮，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

实践经验表明，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必须多方面、多渠道、多路径地发挥各种引领机制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把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要求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就要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所必需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形成各种引领机制的良性互动。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要按照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原则，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思潮的引领机制。

第二，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引领的良好环境。

社会舆论关系社会稳定，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国家的软实力。2008 年 6 月 20 日，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①]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的重要条件。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思想文化的主阵地。一方面，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为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规范和发展社会思潮传播载体。目前，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的社会思潮传播载体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互联网等新型的传播载体不断出现，影响迅速扩大。对于前者，主要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效规范；对于后者，主要集中于功能拓展，以便宣传马克思主义，达到有效引领社会思潮的目的。

首先，增强主流媒体传播主流思想舆论的魅力。

我们要充分发挥好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中的主导功能，不断扩大

①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08－06－21.

主流舆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提供有力的主流舆论环境。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城市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①社会思潮传播载体即媒体（包含网络信息）是现代人获取信息的基本手段。中国是一个传媒大国，拥有数千家报纸和期刊，拥有数百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拥有数量极其庞大的网站。因此，对于社会思潮传播载体的规范和发展十分必要，方式和手法也应当与时俱进、努力创新。当前，需要进一步提高媒体传播主流思想舆论的能力，在坚持主导价值观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又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既着眼于树立正确的、社会认同的主导价值观，又将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重要的内容，以理性的观察、独特的见解、建设性探讨和权威性解读，立于社会舆论之巅，做大众的时事资讯的提供者、社会信息的传递者、党群联络的沟通者和舆情民意的引领者，使主流媒体的新闻舆论、百姓的"口头舆论"与互联网络的网上舆论共同构筑起强势的主流思想舆论传播阵地。

其次，拓展平台，增强主流思想舆论的引导力。

在提高主流媒体传播主流思想舆论能力的同时，认真总结我党做好思想舆论工作的经验和方法，把舆论引导融合到为民办实事中去，不断拓展渠道，提高对社会思潮引导的实效。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通过确立指导思想、坚定共同信念、弘扬先进精神，引导和帮助人们约束自我、提升境界，进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坚持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行业等一系列活动，提高全体公民明辨是非、区分善恶、识别美丑的能力，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积极利用各种重大活动的开展，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增强热爱祖国的自豪感和建设家乡的自信心，使老百姓真切感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打牢思想舆论最广泛的群体基础。同时，要加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关切基层群众、困难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积极实施文化共享工程，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的投入，通过开展乡镇建设等活动，使公益性文化活动进社区、进工地、进农村，丰富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用主流社会舆论占领和巩固马克思主义舆论阵地。

再次，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引领网络思潮。

网络时代是一个传媒全球化的时代，发达的传媒打破了特定社会阶层、社会

①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08－06－21.

集团对信息的垄断。网络信息平台交互性、开放性、虚拟性的特点，使得人们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消费者，还是信息的创造者、发布者。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络具有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无法比拟的突出优点，如超越时空界限、快捷及时方便、大量的信息传输、互动功能强大等。在互联网上，各种社会信息裹挟着多元的价值观念，而网络的“无中心”状态为各种利益集团在网上传播其政治主张、道德信仰、价值观念和处世准则等创造了条件。因此，为了防止危害社会安全的信息散布，抵制不良社会思潮，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必须建立和完善网络审查机制。同时，通过行业组织的形式，增强互联网络网站的自律性，使境内外中文网站能够自觉地配合政府的要求，遵守法律法规，在向中国播发的网页上，不刊登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对各种有害的消息进行过滤。

第三，切实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

应切实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实际上是要把引领社会思潮这项工程融入到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

“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到大中小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课等课程中，体现在学校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真正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使学生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学习马克思主义。“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中心、主导地位，并用它来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统领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生活的高度敏感，对中国社会结构变革过程中的矛盾和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的认识、评价和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社会思潮具有的影响力和灵活的传播性，不仅能使抽象的学术观点深入传播到社会生活诸领域，而且能使人们的感性意识、情感体验抽象表达为各种理论形态。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迁条件下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准确而具体地把握社会思潮的本质和特征，努力建构和完善社会思潮的引领机制，才能继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凝聚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思想，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问题怎么办

——直面挑战与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却随着跨越欧洲的传播影响了全世界；创立于19世纪，却因为实践中的运用和创新而持久地焕发出活力。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实践，引导了20世纪的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将中华民族带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近些年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遭遇严峻挑战，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大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领域一项极为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广泛传播、实践应用、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长久影响社会发展，不断焕发强大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传播普及工作，不仅事关如何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创新的良好互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问题，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如何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的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内容涵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与自

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一个完整科学体系，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前无古人的不朽丰碑。①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内容体系看，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历史命运；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利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发现，阐明了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进而争取全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指导。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它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证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找到了建立未来理想社会的途径和力量，成为千百万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行动指南。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进入到快速发展而又矛盾激化的阶段，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这是一个需要通过理论创新解释社会现实、需要通过理论指导为工人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在批判继承人类思想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满足时代需要的革命性的理论体系。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创造仅仅局限于学术创新的范围，而是将理论创造与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他们向工人阶级积极传播，指导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为无产阶级打造的一个思想武器，它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帮助无产阶级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指导了 19 世纪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实践。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引导了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革命者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将拥有悠

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编写课题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久文明的中华民族带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纵观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播、应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在被压迫阶级中的广泛传播，没有被压迫阶级在斗争实践中的应用，马克思创立的理论体系也许会像人类思想史上许许多多思想学说一样，只是在学者圈子里散播，供学者们研究欣赏。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得到了实践的应用，最终才成为了指导被压迫阶级对旧制度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随着广泛的传播和实践的应用，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成为了一个随时代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出使西方国家的一些外交官员、随从翻译，以及国内一些尝试从西方思想探寻救国良方的知识分子曾向国人简单介绍过马克思及其主张，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入20世纪之后，面对日渐严重的内忧外患与民族危机，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如孙中山、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等）基于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曾非常热心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文和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我国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加速传播，也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领悟到要救中国唯有按马克思的学说、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中实现了彻底的思想解放，也直接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五四运动的斗争实践加速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促使部分先进分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诞生的，自诞生之日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此实现了由一种社会思想学说到革命指导理论的历史性转变，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在书斋中被研究讨论的学术理论，也不再被视为医治社会的备用良方，而是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指导变革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纲领，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武器。

正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之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经过不断探索，建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不仅已经成为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当代中国正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无论从改造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需要，还是从发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抑或从确立社会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看，都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广泛地传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让更多社会成员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一种思想学说要成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依赖于它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依赖于社会大多数人对它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依赖于执政党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成员进行宣传与灌输，并使之逐渐成为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同思想。在当代中国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例外。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普及工作也遇到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从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与渠道的利用情况看，大众媒体传播不力、教育传播效果不佳、组织传播手段不实已是不争的事实；从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方法与管理模式看，传播方式方法单一、管理模式僵硬滞后的问题多年来也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面向社会公众的大众媒体曾是意识形态传播与教化的主渠道、主媒体和党的喉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社会舆论、抵御西方意识渗透等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职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近些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推进，媒体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大众媒体的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需求”成了媒体追求的核心目标，“市场规则”也成了制约媒体的基本规则。面向市场的媒体运行模式发展了媒体的信息与娱乐功能，但意识形态传播与教化功能却受到直接影响，不少媒体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漠然的态度。

学校的政治理论教育曾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遇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越来越呈现出效果不佳的状况。不少政治理论课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仍然是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空洞的说教、原理加实例的内容、照本宣科式的灌输；不少学生兴趣不浓、热情不高、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人到心不到。内容枯燥空洞，教学缺乏创新，教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学，[①] 已成为目前学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政治理论课教学亟待解决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党员的理论学习工作，近些年来也先后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重要主题组织了一系列学习活动，但在不少部门、机构、单位组织这类理论学习活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式化、表面化的问题，理论学习结合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不够，对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的研讨不够，揭露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不够，学习活动对提高理论水平、政治素质、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比较有限，而且理论学习缺乏持续性的提高效果，缺乏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效能。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从整体上看呈现出传播不力、效果不佳的状况，没有能够起到更强的意识形态传播作用，未能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价值观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和示范，这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出现所谓信仰危机、道德失范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并没有根据时代的发展提升传播理念、变革传播机制、改革管理体制，内容体系、传播策略、传播方式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未能适应时代要求建立一个以传播实效为目标的有效运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伴随着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当代中国的经济运行与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特别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建立，社会出现了更为复杂化的分层现象，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利益关

① 李诺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研究［D］．长安大学，2009.

系。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带来了思想文化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追求、价值选择、思维方式和行为目标，个人本位主义思想更容易在更大范围内泛滥，重实际利益轻道德理想的价值观也更容易在更大范围内流行。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背景中，以强调集体主义、整体大局观念为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遇到了更多更大的困难。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国际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信息获取的更加便捷，影响思想观念变化的因素也在迅速增加，社会文化环境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也遇到更多挑战。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文化环境也给西方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导致各种思想观念交织碰撞，甚至使消极错误的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蔓延，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动摇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伴随着社会运行机制的不断调整，人民群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社会越来越进入一个“平民化”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呈现出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发展特征，在社会稳定基础上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在这样一种社会运行机制下、在这样一种社会运行模式中，人们的政治意识往往比较淡漠，人们会更多关注涉及自身的实际利益，更加关注自我的成长、自我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会表现出更多的务实风格，部分社会成员甚至会对比较生硬的、“教科书”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比较反感。

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这样一系列重大变化，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形势，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的体制与机制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要破除对思想政治教育“灌输论”的简单化理解，改变“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单向灌输式教育，通过对社会发展要求和社会成员心理的深入分析，围绕社会受众这一中心和传而致通、致用、致效这些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以提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实际效果。

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建设中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涉及在多元文化冲击和平民化社会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如何解决公民信仰危机的问题、如何建构主导意识形态的问题、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也涉及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西方文化不断渗透、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激烈的社会发展环境中如何确保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当代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中国亦不例外，我们不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

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构建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将其确立为公民信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成员的行动指南，促进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应用、发展的良好互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性质及目标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部分，其基本目标是利用一切可能的传播途径和手段，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人民，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和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基本性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性重大成果是促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旦登上历史的舞台，中国社会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面临的现实任务，探索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道路，最终带领工农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此实现了另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坚持的指导思想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意识形式了，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完成了制度化的建设任务。马克思主义现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反映着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经可以在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更为方便地利用各种制度性资源进行宣传和传播，并服务于指导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伴随着这种重要的历史性转变，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传播的性质和任务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如何通过宣传和传播吸引更多的信仰者，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转变为现在如何通过宣传和传播，更好地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灌输，从而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并能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从其根本性质上说不仅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与基础。

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毫无例外给予意识形态建设以高度的重视，特别是会在社会既有的政治构架中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其主导意识形态。这种主导意识形态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求，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追求，并被建构为统治阶级建立社会制度、规划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为了让主导意识形态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指导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统治阶级也会毫无例外地动用各种制度性资源、利用各种传播途径对社会成员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灌输。

意识形态传播不同于通常的知识传播，而是属于政治传播的一部分，其核心任务是进行价值观传播。知识的传播依赖于知识的正确性，依赖于知识能被人理解。不正确的知识没有用，人们不会接受；难于理解的知识（即使正确），也很难被接受。但意识形态的传播及其效果并不一定依赖于意识形态本身是否正确，而是首先依赖于它能否为社会成员提供精神寄托，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会诉求，依赖于能否激发社会成员的价值共鸣，促进社会成员对既有制度架构和社会关系的认同与支持。①

意识形态传播可以通过提供精神寄托促进社会成员在精神上有明确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形成为之奋斗的信念或信仰，产生精神上的动力和塑造自我的愿望；也可以通过社会理想的建构、价值观的表达，满足社会成员对社会愿景和人生理想的企盼，给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提供心理支持，促使社会成员接受与信奉其思想观念和社会主张，对依据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制度架构和社会关系给予认同与支持。意识形态传播可以对社会成员的心理、思想、意识、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引导作用。

意识形态传播在社会的正常运行中亦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功能，有助于引导社会成员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使社会形成相对统一的思想观念基础，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从而保证社会关系相对和谐，社会结构相对有序，并防止和抵制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能够使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策得到更好的解释，合理性得到更多民众的理解，从而唤起民众的激情，鼓舞民众的斗志，维护社会的团结，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减少发展的阻力。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遵循意识形态传播的一般规律，但也有区别于一般意识形态传播的不同特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同时拥有知识传播的特性，并以知识传播为基础。②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关

---

① 朱兆中．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研究——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接受［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4）．

② 朱兆中．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研究——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接受［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4）．

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也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在价值与真理方面实现了最完美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为基础，为无产阶级明确利益诉求并进行价值指导的意识形态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巩固和加强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政治领导、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手段，其基本目标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与传播，促进社会成员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树立社会主义信心，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这种意识形态传播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灌输论的基本原则。意识形态传播属于政治灌输与政治传播的范畴，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重在国家主导和思想引导。列宁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一般规律和人的正确思想形成的一般规律出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灌输教育，明确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①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能够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社会主义如何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自身解放并进而争取全人类解放的系统学说。人民群众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可以得到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个别观点，形成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朴素看法，但并不能自发地建立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完全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也只有通过宣传和传播的途径灌输给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最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变成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给予宣传工作以高度重视，在创立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要求参加党的每一个成员“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③ 作为马克思主义产生重要标志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以警句格式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的，这种利于传播的语言表达方式与其内含的光辉思想一起使《共产党宣

①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7.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72.

言》成为了世界上传播最广的政治文献。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武装人民群众，保证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能始终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

在我们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今天，尤其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灌输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人民，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为形成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提供保障，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而健康地发展，并在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环境中确保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必须坚持灌输的基本原则，灌输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始终，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和方法起重要指导作用。但我们不能对灌输原则进行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理解，灌输本身并不直接就是意识形态传播或政治思想教育的具体方法，更不意味着意识形态传播或政治思想教育只能是单向的和强制的“填鸭式”或“注入式”灌输。将意识形态传播的灌输原则进行简单的和直接的方法化，理论上错误、实践上有害，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实际效果。

在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域，不少人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灌输原则的丰富内涵，片面地将灌输原则理解为传播宣传和教育教学的具体方式方法，将灌输变成了传者可以强制“注入”、受众只能被动接受的单向灌输过程，不考虑面对的受众群体的思想状况和传播内容的实际特点，不是根据受众群体的实际情况、传播内容的实际特点和传播效果的实际需要，具体设计传播的方式方法和过程手段，而是“一刀切”、“一锅煮”、“一般粗”，照本宣科，坐而论道，空洞说教，脱离实际，极大地降低了意识形态传播的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在坚持灌输原则的同时，要以受众为中心、以实效为目的，对传播的方式方法进行灵活多样的策略设计，将传播者的思想引导和对受众思考学习的有效激励、理论学说和思想观念的灌输与实践问题和思想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甚至要将意识形态传播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极探索和尝试启发式、讨论式、疏导式、说理式、辩论式等方式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原则落到实处，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对受众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更为实际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具体目标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基本任务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具体目标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社会化、中国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

代中国的传播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普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促进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最终通过群众的社会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要实现传播、应用、发展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渠道，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传播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理解和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包括超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信仰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等界限，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的普及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般平民共知共有的文化。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接受、所理解、所掌握、所运用，才能真正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特别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群众。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联系起来的原则，让马克思主义走进大众生活，关照现实问题，指导人们的思想言行，成为社会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要求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理论需求，借助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传播媒介，利用各种灵活多样的传播手段，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使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促进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认同与理解，使人民群众能够真信、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①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础目标，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的社会化，也就是促进社会各阶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给予思想的认同，对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路线方针给予行动的支持，热心参与党和国家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执政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政治路线的社会化过程对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执政党的基本理

① 周奇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4）．

念、政治纲领、思想路线和各项政策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获得最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为了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执政党也总是会利用各种途径向社会成员宣传和传播其主张的意识形态，解释其纲领和路线，推行有利于巩固执政地位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以便让其信奉的基本理念、执行的政治纲领、坚持的思想路线以及采取的各项政策得到更多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政治路线尽管是为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这不意味着它能天然地为全体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也不意味着人民群众都能天然地理解和支持，更不意味着人民群众都能积极主动地实践和执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党政治路线的执行者，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政治路线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接受和理解，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仍然需要利用各种途径和手段，传播到人民群众中间，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使党的政治路线深入人心，引导人民群众前进。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负有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不断推进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社会化，通过持续不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以及路线政策的说明解释工作，让人民群众相信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的科学性，相信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从思想和信念上乐于接受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与党和国家的步调保持一致，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对于确保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得到真正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得到切实执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中国具体问题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成果。胡锦涛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实现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② 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利用各种宣传和传播的手段，促进人民群众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分析世界发展大势，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①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6－10－22.

② 陆福兴，李爱国.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和政党的政治路线社会化［J］.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的基本国情，并通过实践解决改革发展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需要不断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经验，用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以及升华的新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社会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三个具体目标。当然，如果从广义上理解，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社会化和中国化具有“三位一体”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社会化，内含着面向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化，没有社会化和中国化，大众化的目标最终无法实现；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的社会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必须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没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基础，广大人民群众不能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

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内容与对象群体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基本内容。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重点内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要通过针对干部党员、青年学生、社会公众等对象群体的传播工作，帮助人民群众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的信心，促进人民群众更好地认同和接受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基本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认同、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在基本内容上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个基本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重点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普遍规律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基本组成部分，内容涵盖自然、社会和人类认识三大领域，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内容极其丰富，思想博大精深，既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也为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首先就要利用各种传播途径和传播手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传播给社会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掌握这一思想武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现实问题，科学地认识世界，有效地改造世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增强社会主义信心，在社会实践中积极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面对的具体问题，指导、总结、概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经验，依据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的理论体系，基本内容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已成为党和国家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部宏著的第一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等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内容上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过程中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内容丰富，时代特征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达到了新境界，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走向成熟。

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体制、模式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了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发展了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的理论，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系统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新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最重要的内容。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必须持续不断地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宣传和传播，特别是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普及与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掌握和积极实践，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化。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①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是实现大众化和中国化的过程，对当代中国而言则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凝聚社会力量，促进价值认同，确立共同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对象群体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属于意识形态的传播，需要面对社会的全体成员，也就是说传播受众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但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的受众分为两大群体和三大重点对象。两个群体分别由党内对象和党外对象构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首先应该促进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实践马克

①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3－12－27.

思主义，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而面对党外普通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则更多的是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普及，促进更多的普通群众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三个重点对象分别是：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群体，青年学生群体，普通公众群体。之所以要区分这样三个群体并列为重点对象，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发展中所处的社会角色不同、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面向这三个重点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需要针对他们特殊的社会角色，提出不同的传播要求，规划不同的传播内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策略的特殊设计。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应采取区分重点、分层传播的原则，不能“一刀切”、“一锅煮”、“一般粗”。

我们之所以将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合为一个重点群体，是因为对这几类对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内容、要求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尽管也存在不少具体差异）。领导干部是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担负着领导本行业、本地区、本部门群众实践的重要职责。公务员是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实施者，普通党员是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并直接影响到周围的普通群众。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既是党和国家对这一群体的基本要求，也是这一群体做好具体工作、实现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

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代表着国家和党的形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直接影响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执行水平与实施效果，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对社会公众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政治素质、思想观念也会产生巨大示范效应。针对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党的理论教育和思想建设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其效果如何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工作。

社会正处于一个深刻变化而又快速发展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综合实力竞争更加激烈，软实力建设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异常复杂，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更是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对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的理论水平、政治素质和执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党也为此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都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策传播工作的重要性。

对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属于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更多地利用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理论结合实际的工作研讨、围绕某些重大专题的主题学习活动等各种组织传播的途径和手段，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系统灌输，促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深入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

实践践行结合起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推动马克思主义实践创新结合起来。

对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首先要在普及、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下工夫，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只有系统全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理论素养，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思考实际问题，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做出表率。

其次要促进政治素质的提高。江泽民同志曾在建党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提高干部素质，关键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素质。"对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与使命的理论、结合党在新时期对干部和党员思想政治素质的基本要求、结合目前党风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针对干部和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以及信仰、信念、服务意识、工作作风、道德修养存在的问题进行传播，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再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应用。对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方法、政治素质和思想修养的层面，还要特别通过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宣传教育，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促进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群体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实践，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武器。

最后是要结合不断发展的现实实际进行传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①]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干部和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增强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勇气与意识，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党员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担负的职责、波及的影响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决定了针对这一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针对这一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既要强调理论与方法、提升政治素质，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要强调面向社会实践、联系实际、促进践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8.

青年学生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群体。青年学生正处于知识能力不断增长、思想观念不断成熟、生活阅历不断丰富的关键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和综合素质逐步提高的关键时期，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促进青年学生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提高青年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既关系到青年学生群体本身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更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

目前青年学生群体正处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和复杂多变的环境，改革推动了社会全面转型，推进了利益关系调整，导致社会出现利益多元、思想多元的特征，也使人们面临更多涉及切身利益的竞争问题；而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更快融入国际体系、中外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的同时，也使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更容易传进国内，西方势力更容易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这对当代青年学生群体的思想成长产生了很大冲击，也给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当代青年学生群体的思想主流是好的，但不容否认在部分青年学生中也存在着政治意识淡漠、理想信仰迷茫、是非观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的问题，辨识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观念的能力较差，这决定了有必要特别加强对青年学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通过对青年学生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灌输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他们的头脑，促进他们更快地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

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多的是要利用媒体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团体组织的理论学习等途径来进行。由学校组织和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对青年学生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途径，这种有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各种重要资源，对青年学生施加意识形态影响，让青年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观察分析问题，从而帮助青年学生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社会主义信心。

基于青年学生群体的实际情况及青年学生未来发展需要，针对青年学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应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主渠道，以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为基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重点，以服务理想信念教育、促进全面发展为目标，结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革命历史和建设的经验、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的宣传与教育，重在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解决青年学生实际的思想认识问题，促进他们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和自己的社会责任。

普通公众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所要面对的最庞大的一个受众群体。普通公众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对公众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充分的社会化，

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接受，也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在思想上得到科学理论的武装，在实践中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面向普通社会公众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同时也涉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西方社会思潮不断渗透、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激烈以及国内利益诉求多元化和文化价值多样化不断发展、改革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的今天，面对社会上存在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范问题以及许多认识误区、思想分歧、错误言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积极开展面向公众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借此在公众群体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面向公众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是利用包括报纸、电视、广播、图书在内的大众媒体，主要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发展与成果、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成就的普及性宣传，帮助公众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认同和接受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树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并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面向公众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还要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与国民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承担提高公众思想政治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促进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重要职责，同时激发公众的思想创新，活跃社会的思想交流，并通过交流和碰撞达成更多的共识，促进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为社会发展培育共同的思想基础。

四、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

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国内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不断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不断加深，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也依然激烈，这决定了我们在认识上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必须提升传播理念、创新传播策略、加强传播管理、强化传播支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途径，整合各种传播资源，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

（一）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

1. 利用大众媒体传播优势

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而言，最基础的工作之一是发挥现有传播手段的优势，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手段，整合多样化的传播途径，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传播范围的广泛化、传播

内容的全面化，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学校、进工厂、进村庄、进军营、进社区，深入头脑、扎根人心，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行动。

整合多样化的传播途径首先是要充分利用大众传播渠道，发挥大众媒体的传播优势，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看，大众传媒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转变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也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励群众斗志、发动组织群众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传播结构中，大众媒体拥有一系列特殊的传播优势，面向数量庞大的社会公众，熟悉面向公众的传播语言，也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和来源之一。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传达，向社会成员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对社会成员的认识、判断和行为产生着重要影响。大众媒体具有很强的议题设置功能，可以通过议题设置，引导社会舆论、促进公众思考、活跃社会的思想交流，不仅可以促进公众在更多方面形成共识，而且对示范社会的主流文化、引导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近些年来我国传媒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传媒产业化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传媒运行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传媒较此前更加关注面向市场的操作。但传媒具有引导社会文化、传播意识形态的特殊功能，我们在积极推进传媒管理改革和传媒产业化发展的时候，不能削弱传媒应承担的这些功能，传媒在面向市场的操作过程中也不能放弃自己所承担的相应职责。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传媒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意识形态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需要高度重视对传媒的利用，让传媒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渠道。

国家和政府在深化大众传媒管理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分层分类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模式，首先是重点建设一批有影响的专业媒体，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导媒体，让马克思主义占领媒体传播的制高点；其次是建立相应的激励制度，积极引导媒体的传播方向，让媒体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维护主流的意识形态；再次是制定和完善媒体管理法规，强化制度规范建设，加强传播内容管理，抵制错误思想观念的散播。

大众媒体本身也需要高度重视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当代社会结构中，大众媒体不仅承担着汇集、传播社会信息的重要功能，而且可以通过信息的选择加工与传递产生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引导人们的问题关注方向，影响到社会的舆论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舆论时代，“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但只有进步的舆论才

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①] 因此，利用大众媒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要充分研究和尊重传播规律，坚持正确导向，注意引导社会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促进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积极思考。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注意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结合起来，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满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有共同兴趣的、欲知未知、应知未知的信息需求。[②] 同时要注意宣传艺术和传播技巧的运用，拒绝肤浅生硬的“说教”，利用受众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提高传播的实际效果。

2. 占领网络传播阵地

网络传播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基于计算机异地通信网络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传播渠道，其传播平台和载体是现已得到广泛普及的互联网。互联网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综合运用于人类信息传播领域的一个最新成果，集中代表了现代传播技术的最新进展。互联网拥有强大的信息集散功能和信息传播功能，实现了对信息的多媒体和超文本传送、大容量和高速度传输、即时性和远程化传播，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交互性，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方式。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在人类社会传播领域产生了网站、论坛、博客以及网络知识库、数字图书馆、在线知识建构、在线私人交流等新的传播载体与传播手段，极大地方便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活跃了社会的信息传播，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网络传播新体系和新平台。随着将来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网络传播将会变得更加便捷和更加开放，不仅会对社会的信息传播产生更大影响，甚至会改变传统的社会传播生态，深刻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和网络传播渠道的发展，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传播提出了挑战。网络平台的无边界性和高度开放性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为西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提供了方便的手段，也为社会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和价值观念传播提供了平台和空间。各种不良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不仅可能会误导人们的判断，扰乱人们的思想，而且可能会直接削弱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接受。

但网络传播渠道的出现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手段，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传播提供的新机遇，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扩展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让网络传播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传播。利用网络传播渠道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就是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特有优势，整合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资源，建立一批有影响力的马克

①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书店，1993：166～200.

② 李诺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研究［D］．长安大学，2009.

思主义专业网站，让马克思主义占领网络传播的阵地。拥有丰富学术研究资源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高等学校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尤其需要在这一工作中做出贡献。

目前在我国已有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网站，如全国党校数字图书馆、清华大学的“红色网站”等。但就全国的整体情况而言，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的发展还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有广泛影响的网站并不多，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网站内容不够丰富，网页形式比较单一，甚至网站速度较慢，也缺少比较重要的相关链接。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建设总体上还滞后于实际的需要，多媒体、超文本、大容量、高速度、即时性、远程化、交互性的网络传播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建设、构筑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阵地的过程中，首先要利用网络传播的大容量、超文本、高速度特性，利用数字图书馆、e印本文库等形式，汇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著作与期刊论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文本材料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影视资料等多种内容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体系。内容资源的丰富程度是决定网站传播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的建设要将内容资源规划与建设列为重中之重的一项工作。

其次要利用网络传播的多媒体传播优势，在高度重视内容资源的信息质量、理论水平、思想高度的基础上，高度关注资源的呈现形式、内容的表达方式和网页的艺术设计，利用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传播要素，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艺术感染力，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变得更加生动、形象、鲜活，特别是要让那些严肃的内容变得轻松活泼，让那些枯燥的理论变得丰富多彩，让那些抽象的概念变得生动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理论灌输方式，让受众能在一个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再次是利用网络传播的互动性和交流性优势，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宣传，设置有关理论与实践议题，引导人们的思考和讨论。例如，利用现已得到良好发展的“维基”技术，[①] 吸收国内外有志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共同建立基于网络传播的、内容动态更新的在线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最新研究成果的正面宣传；利用网络传播可以方便组织异地讨论的功能，设置讨论议题，建立网络论坛，组织专家学者发表个人博客，引导人们的思考方向，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最后是坚持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强化网络传播的内容管理，对网络传播进

① 维基技术是由“维基百科”（Wikipedia，WP）所开创的一种互动式知识构建技术，它包括一组支持网上异地协同写作的辅助工具，可以很方便地吸收不同学者共同参与基于网络传播的、内容动态更新的百科全书的创建。

行综合治理，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网络环境。特别是针对互动性较强的网络论坛、个人博客，强化内容管理，注重正确的舆论引导；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纠正各种错误的思想认识，抵制各种不良信息的消极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建立一个良好的网络传播环境。

在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渠道的建设中，要强化大传播观念，依托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机构网站、马克思主义专业媒体网站、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网站、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社团网站、党校系统网站、政府网站、大众传播媒体网站等网络媒体，整合现有网络资源，建立相关网站链接，建设一个以权威专业网站为核心、以其他专业网站为支点的网络传播体系，[①] 构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传播阵地。

3. 加强教育传播渠道建设

整合多样化的传播途径也包括利用教育传播渠道，积极开展面向青年学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青年学生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的重点群体之一，教育传播渠道是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渠道，利用的基本载体包括专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内容的政治理论课、渗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其他课程（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类或素质教育类课程）以及在学校内开展的各类思想教育活动。我国目前针对青年学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属于针对青年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②] 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本阶级、本政党或本集团总是会用他们所信奉尊崇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塑造其成员人格，指导其成员行为，并在社会范围内积极推行，以图对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施加更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说属于信息传播过程，以信息传播为基础并利用信息传播达成教育效果。

按照中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关指示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应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服务于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青年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并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目前我国针对青年学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虽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

① 李诺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研究［D］．长安大学，2009.

② 张耀灿，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5.

要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佳，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中渗透不够，开展的一些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形式主义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效果，亟需围绕提高效果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全面改革，尤其是要针对作为必修课程的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目前的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灌输原则方法化的情况依然比较严重；教学内容概念化和空洞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容变成了空洞的理论说教；教学方式单一化和演绎化，教学过程变成了纯理论的演绎，既没有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又不能很好地联系鲜活的社会现实，极大地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如果说面向社会公众群体、利用大众传媒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影响的是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理解、认同、接受，面向青年学生群体、利用教育传播途径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则可以说涉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其实际效果如何、作用大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应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加强对这一传播渠道的建设。

青年学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社会群体，思维较为活跃，思想较为开放，对世界充满好奇，易于接受新理论和新知识，但情绪化或情感化的思维倾向比较明显，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尚未成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不甚成熟，面向这一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要充分考虑他们在思想、认识及接受行为方面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设计传播过程和传播策略，特别是要贴近他们的思想实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通过积极引导逐渐提升他们的思想认识。

面向青年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首先要强调理论传播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通过系统全面地传播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让青年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充分感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在当前要特别强调讲清讲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阐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线索，总结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格，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感染力。

面向青年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还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提升青年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力，面向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要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合理的分析，让青年学生逐渐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

法分析现实问题，这样的传播才能不断增强吸引力和说服力，不断入耳入脑并逐步成为青年学生认识问题的理论框架。

面向青年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同时要在传播方式方法上进行创新，拒绝生硬僵化的理论灌输和高高在上的空洞说教，大力推进启发式、参与式、讨论式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青年学生思维活跃的特点，运用充分的信息、典型的事例、通俗易懂的语言启发青年学生积极思考，引导青年学生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正确回答。这样的传播方式才能更有利于把理论传播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与自主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从而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 增强组织传播实效

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中的组织传播渠道主要针对的是领导干部、公务员、党员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利用组织传播渠道对干部、党员和社会优秀分子进行有组织的理论培训，近些年来也先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学习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教育效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宣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组织传播渠道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渠道。

利用组织传播渠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包括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培训、理论结合实际的工作研讨、围绕某种重要专题的主题学习活动等。这类培训、研讨和学习活动对新时期强化党的思想建设、推动干部党员的理论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也有助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统一干部党员的思想认识，巩固和维护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社会各民族和各阶层的力量，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

但从近些年来一些部门机构组织的这类培训、研讨和学习活动的实际情况看，也还存在着形式主义严重、整体效果不佳的问题，一些干部、党员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态度不认真，学习过程走形式，不能很好地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更不能有意识地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严重影响到学习培训的实际效果。随着国内国际形势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无论数量庞大的公务员还是社会各界的优秀分子，都会面临更为艰巨的学习任务，都需要通过系统学习提高理论认识水平，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学会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复杂问题。

利用组织传播渠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要特别强调理论灌输与自主学习的结合，注重调动学习者参与培训、研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化理论联系实际，关注培训、研讨、学习的实际效果。2008 年 9 月以来中共中央按照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分

批次组织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活动的目标是加深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在一些有关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

中共中央对各单位的学习实践活动在内容、过程上有明确要求，不仅强调对科学发展观的集中培训、理论学习和思想讨论，提高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认识，还特别强调了转变思想观念、结合发展实际、解决发展问题，要求干部深入基层和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开展案例分析，找准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理清科学发展思路，制定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建立健全保护和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的学习要求、科学的组织设计保证了整个学习活动的实效。

5. 发挥图书传播的传统优势

图书是非常传统的一种传播载体，基本上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但图书传播有其特殊的传播优势。例如，图书可以拥有较大的信息量，利于对复杂理论的系统、深入和全面的传播，图书传播也比较切合许多人的阅读习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上，图书曾发挥过重要的传播作用，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国内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通俗读物曾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利用图书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贡献的人物，毛泽东、李达、艾思奇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同志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而且凭借对中国文化的深厚造诣以及对中国语言的娴熟运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至今仍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典范之作。毛泽东善于根据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生动朴实的民族语言通俗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哲理，贴近生活，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易于理解。

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终生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家。他不仅在早期翻译过《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在国内引起过强烈反响，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重要著作，也在广大革命军人和进步学生中广为流传。毛泽东同志曾称《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前后整整看了十遍，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

艾思奇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其代表作《大众哲学》体裁新颖，文笔优美，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联系实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运动，

也在当时吸引了许多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①] 著名作家刘白羽曾说："对《大众哲学》的评价，不能只限于它把哲学通俗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把哲学推向人民中间去的一个重大突破。《大众哲学》点燃了无数人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②]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仍然需要利用图书传播这一重要途径，利用生动优美的文笔，通俗易懂的语言，撰写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读物，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联系实际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帮助人民群众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用图书传播渠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要注意转换话语方式，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利用能让普通群众听得进、听得懂的语言，生动形象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促进马克思主义走出机关、走出文件，走向民间、走向群众。

（二）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工作

1. 提升传播理念

近些年来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快速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特征也日渐明显。而随着对外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外来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对我国的不断渗透，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某些冲击，导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出现思想混乱、认识模糊的问题，甚至有些人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

面对这样一种严峻形势，针对某些群体出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社会主义信心危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人生价值观在某些范围内滋长的现状，提升传播理念、整合传播途径、创新传播策略、加强传播管理、强化传播支撑，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体系，不断改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已成为我国思想文化建设领域中一项极为紧迫、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

这一任务不仅直接影响到如何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大众化、中国化，如何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教育人民群众，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在全社会确立共同的思想基础，如何凝聚各阶层的智慧和力量，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主流文化发展的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顺利建立，能否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确保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能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发

① 周奇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4）．

② 刘白羽．一个哲学家的道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展等诸多重大问题。

在国内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激烈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利用各种传播途径，整合各种传播资源，不遗余力地持续加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建设工作，这对于确保我国在国际综合实力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代代相传、长治久安，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2. 放低传播姿态

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之所以整体效果不佳，关键的原因是在传播方式方法方面缺乏有效创新，内容空洞，形式老套，未能很好地融知识性、思想性、指导性于一体，既不能让人获得新的知识，又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人们从自身的实践经验中很难建立系统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传播需要坚持灌输原则，但灌输原则不能简单化为传播方法，更不能作为一种传播的策略，高高在上的硬性灌输，不尊重受众需要的空洞说教，不可能产生较好的传播效果。

放低传播姿态并不是仅仅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目标的客观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不是供人们信仰的教义，马克思主义要面向现实、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负有给群众提供理论武装、指导群众实践、动员组织群众的重要职责。毛泽东同志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 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任何政策如果……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②

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在放低传播姿态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紧密结合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紧密结合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联系我国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科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当今时代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对历史发展做出科学解释，对现实问题做出合理说明，对未来趋势做出新的结论和新的预测。

其次要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传播要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及遇到的思想认识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传播才会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感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839.

② 邓小平文选. 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5.

召力和吸引力，人民群众才会给予马克思主义更多的认同，才会更为主动地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再次是要注意运用“亲近性”策略，提高传播的实际效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也包含着不少比较抽象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要注意传播方式的亲近性、文本的亲近性、语言的亲近性，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这些人民群众容易接触的媒体，利用出版通俗读物、组织报告会、建立宣传教育基地等形式，使用人民群众易于理解的语言，通俗易懂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解答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感染力。

当然，放低姿态不等于放弃应该承担的职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要强化议程设置、价值引领功能，通过设置相关议题引导人们的思考和讨论，引导社会思想的方向，引导社会舆论的发展，提高受众的理论认识水平，提升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实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领功能。在当前尤其要注意通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3. 加强传播管理

随着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信息获取的不断便捷化和获得途径的不断多样化，社会思想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传播遇到了更多的冲击和更大的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我们不仅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当代中国的重大意义，更要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管理体制、模式、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强大合力；积极推进大众传媒、学校教育、党团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创新，调动大众传媒、学校教育、党团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促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学校、进工厂、进社区、进媒体、进网络。

在大众媒体的管理改革方面，要坚持政事分开、分类分层、灵活柔性的原则，改革比较僵化的传统管理模式，在推进大众媒体面向市场发展的同时，培育一批热心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媒体，促进大众媒体的分层发展；通过不断规范和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让主流媒体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在媒体操作运作上减少行政干预，下放技术职能，扩大传媒自主权，提高面向市场的灵活性。

在针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目前的管理模式仍然比较僵化，计划经济烙印依然存在，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特点比较突出，总体上处于统一过度而柔性不足的状态。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该在统一基本要求

（例如学分、学时和教学大纲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校、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切实落实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原则，以提高教学效果为核心推进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4. 强化传播支撑

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良好发展，需要得到理论研究、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传播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支撑。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会随着不断回答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遇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而实现理论上的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需要得到强有力的理论研究支撑，只有有了强有力的理论研究作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才会有与时俱进的传播内容，才能会更好地联系社会发展的现实，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近些年来还专门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和国家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这一工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工程的实施将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提供强有力的理论研究支撑。

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工作，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培养大批高水平专门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需要的另一个重要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也明确了学科建设的指导原则、基本思路和具体目标。随着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不断实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将会得到有力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也会获得有力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已经成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复杂工作，需要为之建立一支专门的队伍、培养一批专门的人才。目前在我国党政机关、大众媒体、高等学校虽已储备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人才，但相对于实际需要而言数量仍然不足，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制定激励政策、加大培养力度，培养一大批理论水平较高、熟悉传播规律、掌握传播技能、勇于开拓创新、善于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专门人才，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

而在社会思想文化建设领域，要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旋律文化，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地位，加强对主流思想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反对错误的思想观点，抵制消极的价值观念，并积极用主流思想文化引导各种“亚文化”形态（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群体文化、地方文化等）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主旋律文化同时也要具备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气度和能力，吸纳其他意识形态中有益、合理的成分，从而发展壮大自己，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①]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旋律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反过来主旋律文化建设也会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有力的文化环境支撑。

① 王邦佐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50.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42、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1、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4]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 列宁选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7] 列宁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8] 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 毛泽东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 邓小平文选．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4]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
[2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2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7] 臧立．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28]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9] 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崔建霞．公民环境教育新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31] 徐艳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2] 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3] ［加］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4]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5]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6]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7]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修订版）［M］．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38]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9] ［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0]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1] 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2]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3]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4] 韩庆祥，邹诗鹏．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5] 刘福森．社会发展的哲学探索［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46]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47] 庞元正，丁冬红．发展理论论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48]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49] 孙正聿．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0] 吴倬．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51]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52] 邹广文．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53]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5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5]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6] 陈东琪，李茂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57]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2006.
[58] 白暴力．让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9] 杨强．中国个人收入的公平分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0] 宁德业．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61] 张作云，陆燕春．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62] ［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63] ［美］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赵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6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6] 刘福州，柴志明．网络信息化与社会思潮引领机制构建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67] 洪晓楠．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8] 梅荣政．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69] 吴成．社会思潮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70] 孙一先．当代中国非主流社会思潮评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
[7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2]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3] 姚君喜．社会转型传播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74] 黄传新，吴兆雪．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75] 田改伟．挑战与应对：邓小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6] 王邦佐．执政党与社会整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7] 张耀灿，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二、论文类

[1] 高清海．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化趋向及其面临的问题［J］．哲学动态，1994（8）.
[2] 郭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理论［J］．哲学研究，2006（7）.
[3] 高清海．中国需要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十年改革的消化和理解［J］．天津社会科学，1989（1）.
[4] 何中华．从哲学层面上确立新发展观［J］．哲学动态，1991（11）.
[5] 赵甲明．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树立的文明观［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6] 刘新刚．中国社会发展范式的转换：普遍性与特殊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7] 魏军．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8] 孙居涛．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J］．经济评论，1999（2）.
[9] 马惠娣，刘耳．西方休闲学研究评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5）.
[10] 陆彦明，马惠娣．马克思休闲思想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
[11] 许斗斗．马克思休闲价值思想探析［J］．学术研究，2006（5）.
[12] 卿前龙．什么是休闲？——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休闲的理解［J］．国外社会科学，2006（4）.
[13] 李军林．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14] 李军林．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J］．当代传播，2007（5）.
[15] 李军林．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角色定位［J］．社会科学辑刊，2007（3）.
[16] 陆士桢．从青年发展的视角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J］．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学报，2007（1）.

[17] 李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7）.

后　记

继2009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理论问题聚焦》的出版之后，《七个怎么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是集体智慧的又一结晶。一年一本书，一是来自于服务于课程发展的探索勇气，二是源自为学科建设添一块砖、加一片瓦的学术激情。

集团作战检验了队伍，凝聚了力量。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组，秉持“集体至上，弘扬个性，团结协作，共铸师魂”的团队精神，每位成员从“我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以“公有性”和“无私利性”的团队规范共勉，克服授课忙碌而来的疲惫，忍受过度劳累而起的不适，排除家事带来的心焦，保证了任务的完成。同时，每位教师又从“我”的角度出发，在集体至上的前提下，根据自己已有知识结构和专业背景，找到个性自由与集体利益对接的结合点，使个体的发展与集体的目标捆绑在一起。这是团队实现总体目标的机制保障。

《七个怎么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的编写与出版，得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领导和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的鼎力支持；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在此，向他们和所有支持、帮助这一工作的同仁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尽管我们本着高度的政治意识和求真的学术精神竭力将事情做好，但学海无涯，每拓展一个理论视阈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辐射都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和认知能力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恳请业内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不足乃至错误之处，帮助我们匡正思路，有所超越。另外，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理论界前辈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

本书的编写工作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崔建霞；第二章刘新刚；第三章张亚彬；第四章李常青；第五章孙利；第六章张峰；第七章翟杰全。

全书由崔建霞统稿定稿。翟杰全参加统稿工作。

崔建霞

2010年2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陈　竑
封面设计：庚辰年代

ISBN 978-7-5640-3079-7

定价：36.00元